



甘肅文史

甘肅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 张议潮起义时间考
- 豫师生平及其《青海奏疏》
- 第一位出使俄国觐见女皇的中国外交官托时
- 在邓宝珊身边工作的日子
- 杨立强和他的画(二)
- 天籁化逸气 纤真写新风
- 《人物志译注》前言
- 风雅撷珍·张文轩、焦玉洁等

双月刊 2019-2

段兼善国画作品欣赏



段兼善，1955年生于四川绵阳，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画院艺术顾问、甘肃省美协顾问。曾任甘肃画院副院长、甘肃省美协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常委。

作品曾参加第四、六、八、九届全国美展，全国首届少数民族美展，全国首届体育美展，全国第三届新人新作美展，全国首届壁画大展，全国丝绸之路美术大展，全国画院双年展等。多幅作品在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泰国、菲律宾等国展出。1996年、1998年分别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段兼善画选》《段兼善创作画集》等。作品载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中国美术全集现代壁画画集》《中国壁画百年》《当代中国画院》等。作品曾获甘肃省人民政府“敦煌文艺奖”，甘肃省美展特别奖、一、二、三等奖，并获得过加拿大、泰国和中国香港的多项奖项。

卷首语： 家乡风物： 亥韭

文 / 刘长江



我认为亥韭就是韭菜，是野生的韭菜。

早春，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在那些土很薄的贫瘠的干旱的荒山野岭上，它不动声色地萌发了，出土了。它的根好像不死，很粗，而且肥大，应该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亥韭的根系比较发达，能够紧紧地把握有限的那一点点土抓住，抓牢，即使牛羊吃了它，也只能吃掉叶子，它的根还在。只要根还在，叶子也就会很快地再一次长出来，在风中招展，摇摆。亥韭的叶子跟韭菜比起来，叶面较宽，较厚，颜色较深，要更“肉”一些，更嫩一些，也更加碧绿。韭菜让人们精心地“饲养”着，为什么还常常是那么一副穷酸相呢？亥韭自己养活着自己，反而比韭菜更加精神，更加饱满，实在令人深思。亥韭经常成片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但它们是单株的，株与株之间，一般都有几寸到半尺的距离。甚至更远些。它们保持着必须要保持的距离，似乎为了不抢，不争，也是为了不互相影响，互相妨碍。它们是有距离的，却又是一起的，它们能够看见，但不依靠对方，它们是一个并不拥挤的团体，也是一个不能分开的整体。这样的状态，是理想的，和谐的，因而也是好的。人也应该这样。这样的道理人当然是知道的，但人做不到，或者，人不容易做到。

亥韭有蒜的味道，但比大蒜淡得多了。藏在亥韭骨子里的，更多的，还是韭菜的味道。整整一个冬天，吃够了干菜，亥韭是第一份送到我们嘴边的新鲜的绿色点心。它只能是小菜一碟，但它让我首先尝到了春天，尝到了新来的这一年。也还是它，让我们对新来的这一年，满怀期待着。

亥韭是调味的野菜，属于菜里边的“小吃”。和它配合着出现的，是家常便饭，不是宴席。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它更像我们乡下人。亥韭仿佛就是种在园子里的蔬菜，而不是野菜。掐亥韭来吃，很容易，很快，也很方便。它的“家”离我们家一般都比较近，它好像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也愿意被我们吃掉。因此，我们掐它的时候，总是比较细心的，怕一旦不留神，伤害了它。我们掐掉它的叶子，留着它的根，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再去掐它来吃了。它长得格外努力，也格外卖力，似乎害怕供养不了我们。什么地方有亥韭，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尽量不让牲畜到有亥韭的地方去，怕它们踩坏了它，糟蹋了它。

在春夏两季，我们经常掐亥韭来吃。到了盛夏，亥韭就长出蒜薹状的茎，但比蒜薹细得多了，它还在顶端，开出一束细小的花来，花围成圆球的样子，看上去，菜薹是在努力地挺举着花，很吃力，也很危险。风吹来，圆球就左右剧烈地晃动，似乎摇摇欲坠，却怎么也倒不下去。开花以后的韭菜，叶子好像用完了全身的力气，老了，我们也就不吃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它已经精疲力竭，似乎为了开花，它把自己掏空了一般。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亥韭就是野生的韭菜。那么，我们培育着韭菜，浇灌着韭菜，呵护着韭菜，为什么韭菜长得还不如亥韭那么好呢？这是养尊处优的环境造成的，还是，韭菜缺乏积极健康的心态，缺乏努力进取的精神？我不知道。一看见韭菜的“黄毛”模样，就忍不住想起亥韭来。

无论人还是植物，养着，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自自然然地成长，哪怕吃些苦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认为，这比成长在花盆似的环境里，还要更好一些。能增加生活的阅历，多一些见识，更主要的是锻炼了它，增加了它的耐受能力。这不是为以后的生活和人生道路，积累了更多更坚强的保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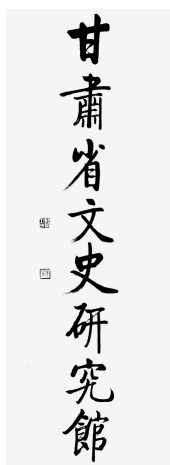
目 录

GAN SU WEN SHI MU LU

2019年第2期

(总第95期)

2019年6月出版



启功题

主办单位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编辑发行

《甘肃文史》编辑部

准印证编号: NO13号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寇明春

编委会副主任

李佩芬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希隆 陈天铀 陈自仁

李正宇 李并成 张改琴

张崇琛 杨国光 林家英

赵逵夫 莫建成 漆子扬

(04) 张振兴

梦中的四合院

(08) 李正宇

张议潮起义时间考

(12) 汪受宽

豫师生平及其《青海奏疏》

(17) 王希隆

第一位出使俄国觐见女皇的中国外交官托时

(24) 李维仓

庄浪古堡遗迹流域分布延伸考察

(30) 杨世明

定西拉扎节内涵和成因探析

(35) 师 纶

说家

(39) 郝洪涛

墨子的政治主张(上篇)

(44) 阳 颢

天下第一雄关

(49) 张继刚

董其昌与南北宗论

(51) 张正锋

在邓宝珊身边工作的日子

(57) 柳 栋

文史笔记二则

(63) 张克复 何延忠

关于建设祁连山高寒冷水鱼养殖带

发展冷水鱼产业的建议

(67) 沈 奇 杨立强

杨立强和他的画(二)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丝路论坛】

【文史论坛】

【人文视野】

【历史回眸】

【咨政建言】

【艺术笔谈】

对工笔花鸟画创作的几点思考

郭向雷(73)

【文艺评谭】

天籁化逸气 纤真写新风

雒青之(76)

【序与跋】

《未是斋吟稿》跋

刘可通(80)

《古代文化论丛》前言

张崇琛(82)

《人物志译注》前言

伏俊琏(86)

序言二则

杜擢升(90)

【风雅撷珍】

张文轩 焦玉洁 陶劲涛

(93)

马天彩 薛林荣

(95)

【美术书法】

卷首插图 崔鸿文国画二幅

封 二 段兼善国画作品欣赏

彩插 1 钱墨君陇上石窟系列新作选

彩插 2 王文本书法作品欣赏

彩插 3 赵玉华国画作品欣赏

彩插 4 王怀罡书法作品欣赏

封 三 张惠中书法作品欣赏

封 底 崔鸿文国画

《甘肃文史》编辑部

主 编 寇明春

副 主 编 李佩芬

责任编辑:

王处机 尚建荣

朱黎明 贺 芳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雁宁路239号

邮 编:730010

电 话:0931-8581061

0931-8581065

e-mail:

www.gswws@163.com

《甘肃文史》博客:http://

bolg.sina.com.cn/u/2554760417

【作者简介】

张振兴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梦中的四合院

张振兴

过去常听人说,人过四十就进入了怀旧的时代,我当然也不能免俗,已经有过二十年怀旧的经历了,特别是去年退休以后,眼前的事情老记不住,而过去的那些陈糠烂谷子却像电影镜头一样,不时地冒出来在脑海中清晰地呈现,搅扰得你寝食难安。近来一段时间,又添了一个新的毛病,时不时总想到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走走,好像是要找回一些匆匆旅途中失落了的什么东西,抑或是要透过历史遗留的痕迹再回窥一下早已淡去了的儿时的记忆。

兰州解放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的记忆只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我上小学之前,家住在兰州市静宁路一个靠近黄河边的老式四合院里,就是现在静宁路北口公交车站背后。那时的静宁路不长,北起滨河路,南抵庆阳路,不足一公里。路面也不宽,还不及现在路面的一半。我家刚搬到这里时,还是土路,后来才铺了柏油。街道两边是一个个规格不一的四合院,可以这么说,这条小街虽然不长也不宽,但在当时,它不仅是市区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也代表着兰州民居的基本风貌。

我家住的那个院子始建于什么时期我不知道,只知道解放前是兰州接骨名医金钟奎的宅邸。院子在路西,坐西朝东,院门东开。临街是木结构青砖外包的二层楼,墙面上有竖排砖雕的“金钟奎宅”字样。院子高出街道许多,进大门是八九级青石台阶,拾阶而上跨进二门,迎面是北屋的山墙,墙上嵌有佛龛,以替代影壁。往左一拐,进入正院。院呈矩形,由上房、南北两厢和下房构成四合,各房皆为木质前脸,出檐较深,足有半间房子,檐下皆有一尺来高的檐台。上房的出檐尤深,应该有两米左右,由四根带鼓型石础的柱子支撑着宽大的房檐,檐台也高于其他各房许多,有近一米。满院子青石筑台,方砖覆地,上房的檐台前有四五级两米多宽的台阶,两旁各有一个小花坛,种着两棵枝条很高的四季丁香,我家就住在上房三间敞亮的屋子里。

当时院子里好像住着八户人家,由于年代久远,加之那时候还小,各家的情景已记不太清,只记得各家都有一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女孩,这一群无拘无束的孩子,整天像一群麻雀,把个院子折腾得天翻地覆。我就是在这种大杂院的环境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孩童时期。不过,临街木阁楼上的两户人家,我还是印象很深。楼上靠南的

那家姓黄，男主人好像在广播电台工作，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孩比我大一点，常和我们一起玩，男孩大我四五岁，不常见到。听大人说，黄家的儿子从小跟着姥姥在北京生活，来兰州后不适应父母的管教，动不动就跑了，让他父母满世界的找。我之所以对这家印象深，是因为我们平时只能听到声音的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如景春、林丽等当时兰州的明星们时常造访他家，于是这个四合院里，就时常能见到明星的身影，能听到纯正普通话音的荡漾。有一回景春喝高了，穿过院子到后院上完茅房后，竟然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满院子扯着嗓子喊老黄，那个大胖子酒后的憨态，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楼上靠北的那家姓赵，男主人是个卡车司机，常年在外奔波，回到家只要看到我，就要摸我的鸡鸡，然后往我口袋里塞一些好吃的，我很喜欢他，叫他赵伯伯。他家有二个女儿，都二十岁上下，与我二姐年龄相仿，我叫她们楼上大姐、楼上二姐。姐妹俩长得都很好看，但性格差异很大，正应了“大姑娘刁，小姑娘娇”的说法。大姐常跟她妈干仗，还敢骂她妈婊子，于是常被她妈拎着笤帚疙瘩追得满院子跑。二姐性格很温顺，见人就是一笑，话很少。二姐喜欢我，常叫我去她家看她的集邮册，还送给我许多好看的邮票和一个笔记本，教我把透明塑料带一条一条粘在笔记本上，再把邮票一张张插上去。于是，我在上学之前就有了一本很像样的集邮册，时常拿出来给人炫耀。有一回我在院子里疯跑，把膝盖摔破了，二姐把我领到家里，一边埋怨着我的不小心，一边给我擦洗包扎伤口，顺便把我的两条黑腿也给洗了。回到家，父亲看了我腿上的纱布，跟我母亲说，楼上的老二真是干护士的料。

上学前一天，我去楼上找二姐玩，顺便告诉她我要上学的消息。当我轻轻推开房门时，看到二姐坐在沙发上（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低着头，双手捧着脸，茶几对面坐着两个男人，正说着什么。我感觉他们在欺负二姐，就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再去看看，要是他们真欺负你二姐，你就回来叫我。等我再去时，两个男人已经走了，屋里只有二姐一人，二姐仰靠在沙发上，哭得很伤心。我没敢进屋，悄悄地回家了。之后不久我就上学了，再就很少与二姐见面，听大人们说二姐失恋了。

院里二门内有一棵很大的香椿树，每到春天椿树发芽时，院里的几个小伙子就爬到树上掰香椿芽，然后分成多份，每家一份，或炒或腌各家自便。巨大的树冠遮蔽了半个院子，到了夏天浓荫匝地，整个院子都感觉到凉爽。我家台檐前的两棵丁香也在年年长高，父亲就用竹棍在台阶前搭起了一个拱门，再把丁香树枝盘在拱门上，就成了一座花门，穿花门、上台阶就到了我家。于是，春夏秋三季，满院子都有浓荫与花香，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夏季炎热的印象。

那时候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一个院里就有四五十口人，除了下房那家与我家有隙不相往来，其余各家都是其乐融融。孩子多就难免打架，可不管谁打了谁，大人们呵呼两句就完了，没有因为孩子打架大人闹红脸的。小孩子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别人家的饭总是比自家的香。所以我们这群孩子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总是不愿在自己家里待着，常常拿个碗周游各家，谁家有好吃点儿的就蹭一口。虽然那时粮食是定量供应，各家的口粮都很紧张，但是各家的大人不会吝啬锅里的那点汤饭，让孩子拿着个空碗倚在门边吸嘴。于是我的童年时期虽不能说是吃百家饭，但吃十家饭是那时的常态。那时没有电视，人们在茶余饭后就是以串门聊天为乐。我家屋前台阶高屋檐大，很是宽敞，于是就成了全院人聚会聊天的场所，特别是傍晚吃饭的时候，几个男人端着碗聚在一起，一边海阔

天空地聊着天，一边大快朵颐，一直聊到相互看不清模样了还意犹未尽，我们一帮孩子也就在大人们谈天说地的声浪中玩我们的捉迷藏，直玩到大人们喊了，才极不情愿地回家睡觉。

那时候的我们，虽然物质生活不及现在的孩子，但精神生活却远比现在的孩子丰富。我们不仅玩捉迷藏，那是晚上玩的；白天，女孩子踢毽子、跳皮筋、打沙包，男孩子弹弹儿、扇洋画片、玩三角板，玩腻了的时候也干点儿坏事。有一回挑粪的进了后院的茅房，我们把通往后院的给插上，就跑到街上玩去了，那会儿正是下午，上班上学的走了以后，院子里除了我们这帮孩子，就只剩两个老太太。结果挑粪的怎么也弄不开门，溜溜在茅房院里呆了一下午。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每人都被家长臭揍了一顿。

在我的记忆中，在静宁路生活的那几年，或许是我此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那时候父亲在兰州已经有了一定的医名，每天都有许多人登门排队请父亲看病，于是父亲固定的每天上午只放二十个号，看完为止，看一个号收取五毛钱诊费，这在当时可是高收入了，所以，我们一家六口，过的是很舒心的日子。每天晚上吃过晚饭，父亲就领着我去滨河路散步，我便背上我的小挎包，跟父亲沿滨河路往东经过三辆水车，从广武门绕回来。路上或大豆、或花生、或板栗买一挎包，或是买一兜时令水果，回到家一家人在灯下分享。那时候家里总是其乐融融的。当然也有不舒心的时候。我小时候特顽皮，时不时就要整出点事来，母亲是从老家农村出来的，没有文化，做得一手好饭，揍得一手好人。我的顽皮和母亲的好揍凑在一起，我的皮肉就时常要遭点罪了，哥哥姐姐经常笑话我，一天挨三顿还等不到天黑。有一天哥哥放学带回家一支竹箫，通体油黄，很是好看，哥哥像看护宝贝一样地护着不让我玩。晚上父亲吃完饭吹了一会儿，曲调我听不懂，只是觉得幽幽的，像深夜月下的感觉。父亲吹完后把箫放在桌上就看书去了，我便顺手牵羊拿到院里，当剑耍了一通，一不留神箫头甩到了廊柱上，喀嚓一声裂开了一道长纹。我正在慌乱时，母亲已到了跟前，那一顿臭揍，生生把一支箫打成了一把笤帚。

有一回过年，我闯了一个祸，把一个年都搅和了。好像是我上学前一年的春节，年三十下午，我们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放炮。那时孩子们不放鞭炮，都是把鞭炮拆开了装在口袋里，点一根香，就着香头一个一个地放。我也是点了香在院里放的。不知谁家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当间，一群孩子就围上去观赏，我一手把燃着的香背在背后，一手把玩着车铃。正玩得高兴，忽听身后一声尖叫，转身一看，下房的那小子在我身后弯着腰，捂着脸叫唤。大家忙围过来问是怎么回事，问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这小子见我们玩得高兴，也跑过来凑热闹，跑得急了，没留神眼睛碰到了我身后的香头上，眼角那儿烫了个黑点儿。他父母听到叫声也跑过来了。这原本不干我的事，是他自己不小心碰上的，可他父母一来，这小子立马说是我拿香戳他。他父母这就不干了，根本不听其他孩子的证明，拉着他到我家闹腾。父亲说先给弄点药抹上，他父母不干，非要让去医院。幸好那天父亲的两个学生在家里帮着弄年货，就带他去医院看了急诊，第二天又去了省人民医院，一直到初三，这事才算消停了。那个年我家没过好，他家没过好，满院子里的人家都没过好。

孩子的好奇心是关不住的。好在那时的孩子基本都是自由人，家长只要喂饱了你，一般是不再管你的，于是我那几个五六岁的小伙伴，在院子里玩得不耐烦了，就会跑到

街上,跑到河边去撒野。那时的河边有几十米宽的浅黄色沙滩,是附近居住的人们散步休闲的地方,每天下午都有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练摔跤,那是我们喜欢看的常规节目。当然有时候也能看到更热闹的,比如两口子打架假装跳河的女人哭天喊地的表演,抑或也能看到被人捞起的溺水者的尸体。有一回,我们几个小伙伴怀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想要去探寻更大的世界。于是在一个阴天的上午,我们溜出院子,沿着河堤的护栏,顺着河流的方向漫无目的地走去。感觉是走了好远好远,经过了三辆水车,前面竟是一片寂静的世界,河堤上排列着一行粗大的柳树,有几头牛在那里吃草,空气中弥漫着很浓的牛粪味,空旷的滨河路竟然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我们害怕啦,不敢再往前走,按照原路回到家里。这一次远足让我们得出一个重大结论:原来这个城市大得没边。

那时候市里街道都很窄,汽车也很少,所以汽车在我们心里是很稀罕也很神秘的。于是我们就经常议论,到底是小轿车跑得快还是公共汽车跑得快?经过反复的观察和探讨,得出了结论:公共汽车比小轿车跑得快。因为我们在街上经常看到小轿车跟在公共汽车后面跑,却从来没见过公共汽车跟在小轿车后面跑的。后来长大了,每每想起那时候认真的讨论,就觉得幼稚可笑,然而回想得多了,也就悟出了一个道理,阅历、经验、知识、学养决定着思想的高度与广度。不信你与蚂蚱说说冬天的事儿看是个什么结果。

1966年春天,我们六七个一般大的孩子上学之后,院子里的情景有了一些改观,过去麻雀般的吵闹变成了朗朗的读书声。然而好景不长,刚到夏天,父亲在郊外偏僻的排洪沟边上找下一处房子,我们举家搬离了那个温馨雅致的四合院,自此再没回去看望过。

儿时的回忆总是那么美好,然而,之后少时至青年的生活却是十分艰辛的。别的不说,仅就居住环境与条件,就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就在40年前,兰州还没有几栋高楼,从山上往下看是一片土黄的屋顶,市区里纵横着“扬灰水泥”马路,春夏浮尘,冬季污染,一年四季好像没有多少好天气。那时候每户人家的门框上,都悬挂着一把由布条或细绳绑扎成的如道家拂尘一样的东西,俗名叫做“抽打子”,这是专门用来进门前拂拍身上尘土的。这种东西如今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即便还有,那也已成为了藏品级的文物。兰州旧式的住房多数进深浅,且以木板为前墙,一层木板、一扇门帘、一张窗户纸阻挡着冬季的严寒,夏日的酷暑。夏天还好说,冬天一只火炉就是一家采暖设施,因而在我的记忆中,冬季每晚的钻被窝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平房的面积都不大,三间房也就三四十个平方,一家五六口人住两间房就已十分可观了。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建设,道路拓展,旧房改造,将过去的面貌彻底地归于了过去,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抹去了过去旧城的痕迹,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城市建设的大力发展,不仅成倍地扩大了城市的外延,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儿时记忆中滨河路的清寂早已不复存在,市内无处不彰显着都市的繁华和生活的喧嚣,互联网、云计算、微信群、支付宝,现代化的高科技早已颠覆了传统生活,那温馨雅致的四合院,也就只能退隐到记忆的深处,偶尔在梦中出现,重温一下远去的往事。

张议潮起义时间考

李正宇

【作者简介】

李正宇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①《新唐书·吐蕃传下》：“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晨入诣，辞行，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让，射沙奴即死，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绌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它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赞普以绮心儿代守。后，疑（阎）朝谋变，置毒靴中而死。”

②李正宇《沙州贞元四年陷蕃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2期。

唐大历年代，吐蕃渐次攻占肃、瓜、伊等州，沙州成为孤岛。大历十二年(777)前后，吐蕃发动围攻沙州的战役，沙州节度使阎朝率军民顽强抵御。此后，沙州军民坚持抗战，长达十一年^①。至贞元四年春(788)，终因“粮械皆竭”而降^②，沙州从此改隶吐蕃统治，长达六十年。自晚唐大中二年(848)沙州豪杰张议潮率众起义，吐蕃官员逃走，张议潮自领州事，遣使十辈赍表归唐。因路途屡遭阻难，迟至大中五年(851)春，沙州使团高进达一辈始抵唐天德城，天德军防御使李丕遣使护送高进达一行始得入奏长安。《新唐书·吐蕃传下》曾略记张议潮起事及回归唐朝经过云：“始，义潮〔据敦煌遗书及莫高窟供养人题名，“义潮”当校作“议潮”。下同〕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虜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纳)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义〔议〕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

但唐代史料记载沙州光复之年则为“大中四年”“大中五年”两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独取大中五年说，并为此特加考证云：“《唐年补录》《旧纪》(此指《旧唐书·宣宗纪》)，义〔议〕潮降在(大中)五年八月；《献祖纪年录》及《新纪》(此指《新唐书·宣宗纪》，下同)在(大中五)十月。按《实录》(此指《唐宣宗实录》，下同)：“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义〔议〕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十月，义〔议〕潮遣兄义泽〔据敦煌遗书及莫高窟供养人题名，“义泽”当校作“议潭”。下同〕，以本道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十一月，建沙州为归义军，以张义〔议〕潮为节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观察营田处置等使。”《新纪》：“(大中)五年十月，沙州人张义〔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新传》(此指《新唐书·吐蕃传》)：“三州七关降之明年，沙州首领张义〔议〕潮奉十一州地图以献，擢义〔议〕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参考诸书，盖(大中五)二月义〔议〕潮使者，始以得沙州来告，除防御使；十月又遣义泽〔议潭〕以十一州图籍来上，除节度使也，今从《实录》。《新传》云“三州降之明年”，误也。”^③

自司马光以来，大中五年沙州光复之说遂成共识。清末，敦煌遗书出土，其中四处言

及沙州光复实为大中二年(848):

其一,敦煌出土文书《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淮深)德政之碑》(翟里斯、藤支晃、荣新江据 S.3329+S.11564+P.2762+S.6161+S.6973 诸卷缀合)载:“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笈修表,纾道驰函,上达天闻。”

其二,上文原注亦云:“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年遂差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已〔以〕献天子。”

其三,S.788《沙州志》寿昌县条载,寿昌县“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唐代寿昌县本为沙州属县,吐蕃占领时期,寿昌、敦煌二县皆废,其地合并为沙州。则寿昌、敦煌同属一体。此云寿昌县“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也就意味着敦煌同为大中二年收复。

其四,P.2762 背《圣鸟庚申降此间》诗云:“从□(此)弃蕃归大化,经管河陇献唐天。”在“从□(此)弃蕃归大化”句下原注:“大中二年也。”意谓敦煌于大中二年推翻吐蕃统治,恢复唐朝治化。此为又一次记述敦煌光复于“大中二年”。

据上引述,可知沙州光复确为大中二年(848),唐代官方史料所谓“大中五年”之说方得纠正。

此后,虽知沙州光复在大中二年,却不知张议潮发动起事、率众“擐甲噪州门”发生在大中二年之某季某月。故学界每述及沙州光复之时限,只好泛言“大中二年”。

笔者每思敦煌遗书中会有沙州光复时限之相关信息透露,故在阅读敦煌遗书时,常留意于此。此后,从敦煌遗诗中陆续发现几条线索,今引录并探讨如下:

(1)P.3967《阙题》诗云:

危山崖峒潜龙虎,流沙忽震如鞞鼓。
松竹虽坚不寄生,四时但见愁云吐。

敦煌易主镇天涯,梅杏逢春旧地花。
归期应限羝羊乳,收取神驹养渥洼。

“危山崖峒潜龙虎,流沙忽震如鞞鼓”:“危山”“流沙”,代指敦煌。“峒(zuò)峒(è):山峦参差貌。《玉篇·山部》,“峒峒,山貌。”《龙龕手鑑·山部》释作“山貌,又,山高貌”。二句谓敦煌地灵人杰,有潜龙伏虎忽然奋起,大地为之震动。点明敦煌忽然爆发起义,声势浩大,惊天动地。《新唐书·吐蕃传下》记张议潮“阴结豪英”,“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此诗彼史,可互为注脚。

“松竹虽坚不寄生,四时但见愁云吐”:此言有志之士,如松竹固有其不可改易的安身立命之所,不甘心屈辱寄生于吐蕃统治之下,其恢复之志,无时而忘。这两句谓揭示沙州起义的必然性。

“敦煌易主镇天涯,梅杏逢春旧地花”:上句言张议潮起义成功,敦煌换帜易主;下句言复苏重光,大地回春,以此表达起义胜利、欢欣鼓舞之情。

“归期应限羝羊乳,收取神驹养渥洼”:“羝羊”,即公羊。“乳”,谓产奶,《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主人方乳”,东汉高诱注:“乳,产。”《广雅·释诂下》“乳,生也。”“羝羊乳”,谓公羊产羊羔,言不可能之事。按《汉书·苏武传》载:匈奴单于“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颜师古注曰:“羝,牡羊也。羝不当产乳,故设此言示绝其事,若燕太子丹‘乌白头,马生角’之比也。”“归期应限羝羊乳”句,谓吐蕃统治者欲使敦煌汉人永为

④《新唐书·吐蕃传下》载，沙州反蕃起义胜利后，即遣使赴唐告捷，先后遣“部校十辈，操楫内（纳）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赍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未言沙州所遣使为谁，何时到达天德城。据前引敦煌遗书《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淮深）德政之碑》载，沙州所遣诸使，最先抵达长安献捷者应即押牙高进达一行。又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春正月壬戌（引者按：“正月壬戌”为正月二十五日），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此天德军于大中五年（851）正月二十五日上奏“张义潮遣使来降”，却未明言张义潮遣使何时抵达天德军。敦煌遗书发现P.2748背《大中四年七月廿日残状》，透漏出沙州使节高进达一行抵达天德军的时间可能是大中四年七月廿日。

⑤饶宗颐：《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第五册，P3967《唐诗六首》解说。

吐蕃奴隶，无望解脱；“神驹”，此指天马；“渥洼”，汉代敦煌泉流名，即今敦煌市阳关镇阳关水库之上源。《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颜师古注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羣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鞞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收取神驹养渥洼”谓敦煌神马虽一时未得驰贡京师，只好权留敦煌，暂潜渥洼，伺机而贡。按，张议潮大中二年（848）起义成功后，连续派出赴唐使节十个班次，其中九使皆因东路艰阻屡屡，无法抵京，至大中四年七月，沙州“押牙高进达等”，才有幸抵达唐土天德军，天德军防御使李丕予以接待，并被护送沙州使节“驰表函入长安城，已〔以〕献天子”^④。此诗既云“归期应限羝羊乳，收取神驹养渥洼。”度其写作之时，当在大中二年敦煌起义胜利之初。是时，张议潮正致力于巩固胜利、建始新政，尚未派遣赴唐使团之前。

诗中“梅杏逢春旧地花”以梅杏发花点明时际值得玩味。盖梅、杏为同类，陆机云：“梅，杏类也，树及叶皆如杏而黑耳。”（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摽有梅》条）北方有杏无梅，故北方人不知二者之别，每以“梅杏”称杏。贾思勰云：“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为一物。”（《齐民要术·种梅杏第三十六》）“梅杏逢春旧地花”句中的“梅杏”，乃谓杏，言杏花逢春而开。

中原地区，清明节前后（阴历二月末、三月初）杏花开放。敦煌季节稍晚，杏花于阴历三月中旬开。诗云“敦煌易主镇天涯，梅杏逢春旧地花”，由此知“敦煌易主”之时，正当杏花开放的三月中旬。联系敦煌文献大中二年光复敦煌的记述，可知敦煌光复之日当在大中二年三月中旬杏花开放之时。这一信息，弥补了史志群籍所失载，具有补史之缺的特殊价值。

饶宗颐先生据“敦煌易主镇天涯，梅杏逢春旧地花”的诗句，判断此诗“必是归唐后之作品。”^⑤是则是矣，但需进一步揭示的是，此诗虽作于沙州反蕃起义之后，却尚未与唐朝沟通，大唐朝廷也还未知沙州起义之举，“收取神驹养渥洼”之句，可以窥知其意矣。

（2）同号又有《初夏登金光明寺钟楼有怀奉呈》一首，云：

律移当仲吕，攀陟届兹楼。

边树花开□（晚），危山状似秋。

孤城新化理，月殿旧□（曾）游。（下略）

此诗写初夏四月登金光明寺钟楼所见所感。金光明寺是从佛经《金光明经》而取的寺名，各地多有以“金光明”为名的佛寺。而此诗所写的金光明寺，从“边树”“危山”之语判断，可知为敦煌金光明寺。敦煌之金光明寺，在沙州城西北，为敦煌名刹之一，敦煌名僧金曜、利济、义辩、永隆等均出家于该寺^⑥。

“律移当仲吕，攀陟届兹楼”：“仲吕”：《淮南子·天文训》[汉]高诱注云：“仲吕，四月也。”以上两句，点明登临金光明寺钟楼之时为初夏四月。

“边树花开□（晚），危山状似秋”：二句写登临所见近处及远处之景。首先映入作者眼帘的是近处的一片繁花，而举目遥视，远山仍然萧条似秋。流露出春光未普的慨叹。

“孤城新化理，月殿旧□（曾）游”：言金光明寺钟楼虽是旧所曾游，而此次登临，却是边城敦煌获得新生之时，与吐蕃占领时之登高念远迥然不同。“孤城新化理”一句，饱含着作者对敦煌光复新生的庆幸与喜悦。作者此刻（初夏四月）登临金光明寺钟楼，联想起

“孤城新化理”是很自然的事。而“孤城新化理”的“新”与“月殿旧□(曾)游”的“旧”，一前一后，紧密相衔。由此不难悟出敦煌光复必在初夏四月(“律移当仲吕”)之前不久。参照前揭“敦煌易主镇天涯，梅杏逢春旧地花”所示敦煌光复于三月中旬，而此诗虽未明言敦煌光复于某时，却可以借助“敦煌易主镇天涯，梅杏逢春旧地花”之所示，作出敦煌光复于三月中旬的理解。

(3)P.5007《敦煌》诗云：

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壘属蕃家。
 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杨柳花。
 仕女上(尚)梳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
 雄军往往施鞞鼓，斗将何劳狡狴誇。

“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杨柳花。”是说敦煌起义成功，路边杨柳也欢欣鼓舞、乘风飘絮。按：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是说寒食节时唐代长安城到处柳絮飘舞。寒食节在清明节前三天，而清明节多在阴历二月末。敦煌季节较晚，杨柳飘絮迟至阴历三月中旬。由此可知敦煌反蕃起义在阴历三月中旬，与上举《阙题》诗“梅杏逢春旧地花”所示敦煌光复于大中二年三月中旬相合。可以进一步印证敦煌起义光复的时间在大中二年三月中旬。

沙州光复于大中二年三月中旬之说，尽管未能指实在三月某日，却得以聚焦在大中二年三月之内，消除了过去在大中二年内四季莫定的遗憾，认识又得推进一步。

《张淮深德政碑》(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 诸卷缀合)载，张议潮“观荧或(惑)而芒衰，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意无疑，盘桓卧龙，候时而起。”

荧惑，火星别名。《史记·天官书》：“荧惑……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此云“荧惑芒衰”，意谓天象预示吐蕃内政将乱而外有兵祸。议潮以为“吐蕃之运尽”，而“誓心归国”之意遂由此而决。

《旧唐书·天文志下·灾异》载：会昌“二年(842)六月乙丑(六月二日)荧惑犯岁星。丙寅(六月三日)，太白犯东井。其夜，荧惑舍赤色，动摇于井中，至八月十六日犯舆鬼。”据此，知所谓“荧惑芒衰”乃指(会昌)二年六至八月荧惑连生变故。吐蕃达磨赞普亦于是年十月被刺杀。(见新旧两《唐书·吐蕃传》)

据此度之，张议潮“观荧或(惑)而芒衰，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意无疑”，似缘于会昌二年(842)。碑文又云议潮“盘桓卧龙，候时而起”，则其密谋策划、组织力量、准备起事，亦始于会昌二年。至大中二年(848)三月某日，起义的有利时机终于到来，张议潮遂发动起事，率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则议潮起义的准备工作，暗中进行了五年有余，亦所谓图谋有日矣。

⑥详见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收入拙著《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版。77页。

豫师生平及其《青海奏疏》

汪受宽

【作者简介】

汪受宽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
兰州大学教授

《青海奏疏》是清朝豫师任西宁办事大臣期间的奏疏集。辑录了清同治九年至光绪四年(1870-1878)间,豫师处理西宁回民起事军务和青海蒙藏事务的奏折、附片与相关谕旨,内容丰富,资料完备,史料价值极高。鉴于青海历来地方史书很缺,而西宁回民起事是咸同西北回民起事的首发者和重要方面军,青海蒙藏民族此段的历史资料遗留很少,作为皇帝钦派地方处理民族事务的大员写给朝廷报告结集的《青海奏疏》显得尤为珍贵。

一、豫师历史勾沉

诸种清代人物传记中,曾官至一品的豫师,只在《清史稿·徐桐传》中有附传。云:“有豫师者,字锡之,内务府汉军。进士,官至乌鲁木齐都统,以讲学为(徐)桐所倾服。方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儒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实皆豫师本谋也。”^①我们通过多方面资料的查考,构建了以下豫师的生平。

^①《清史稿》卷465《徐桐传附豫师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50页。

^②王昱校注《西宁府续志》卷6《官师志·命使·钦差办理青海蒙番事务大臣官员》,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8页。

^③《积劳成疾请开缺调养片》,吴丰培编《豫师青海奏稿》,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7页。

豫师,字锡之,号锡叟。对豫师的籍贯,《西宁府续志》言为“满洲镶黄旗人”^②,刘十枝《苕楚斋三笔》卷六称“满洲豫习之都护师”。然而,在《明清进士题名录》咸丰二年榜和钱维福《清秘述闻续》卷六称其为“汉军镶黄旗人”,上引《清史稿》附传称其为“内务府汉军”。在《青海奏疏》中豫师两次自述其为“汉军世仆”,则其可定为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豫师用为内阁汉本堂中书,后升内阁侍读、山东道监察御史、陕西道监察御史、甘肃平凉府知府。不久,地方官处理诸门宦教争不当,青海回族、撒拉族群众在回民总约马桂源、阿訇马文义率领下造反。署陕甘总督沈兆麟前往镇压,豫师随其为幕,“或率孤军于数十万豺狼之藪,或筹糈务于千余里瓦砾之场。”^③同治元年(1862)初,与回撒军大战于巴燕戎格厅(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一带。此时,陕西渭南回民起事,随之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狄道(今甘肃临洮)、肃州(今甘肃酒泉),宁夏及新疆乌桓回民造反,形成巨大势力。同治二年,回撒军包围西宁半年,西宁办事大臣玉通被迫达成抚局,以其首领马桂源、马本源弟兄署西宁府知府和西宁镇总篆务。同治三年(1864),署兰州知府豫师因其随署陕甘总督恩麟收复狄道城立功。同治五年八月,清廷

以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湘军镇压西北回民起事。在巩秦阶道任上的豫师，全力筹办和运送大军粮草军实，会剿回军时他“探踪会督各队，驰往追击，力行压退，克保州城”^④，先后赏加按察使、布政使銜。

同治八年(1870)十二月，被困府城的玉通忧惧而卒。随后，豫师以副都统銜接任西宁办事大臣。豫师不愿重蹈玉通覆辙，上疏提出：西宁抚局难恃，请在平番(今甘肃永登)一带招募五营兵勇，扼要驻防，同时疏通道路，以待前往西宁任所。平番为各支回军联络支援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在左宗棠、穆图善等人支援下，豫师军与陕回、河狄回及西宁回在此反复争夺，并组织沿途士绅、藏族举办团练，一再打击、清剿碾伯(今青海乐都)、平戎(今青海平安)、威远(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沿线诸回军据点。在宁夏回军首领马化龙投诚被处死的同治十年(1871)中，左宗棠抵安定(今定西市安定区)，部署围攻河州回军。同治十一年初，畏惧左大帅的铁拳，马桂源先后晋见豫师和左宗棠求抚，并到太子寺(今甘肃广河县)向河州回军首领马占鳌传达左宗棠“尽缴马械自赎”的要求。三月，河州回军在太子寺重创清军后，马占鳌等缴马械，向左宗棠真心投诚。马桂源回西宁后与其兄马本源加筑城墙，摊派款物，加强防御。七月，左宗棠进驻兰州。八月，刘锦棠湘军与宁回、陕回军大战西宁东之小峡，回军兵败，马桂源兄弟逃至巴燕戎格，陕回禹得彦、白彦虎等向河西、新疆逃亡。同治十二年二月，马占鳌欺骗马桂源兄弟至巴燕东山会面，将其俘虏，押往兰州枭首。威远、大通向阳堡等回军据点相继被拔除。至此，西宁回民起事失败。其间始终策应配合左宗棠大军行动的豫师以“会同左宗棠办理西宁招抚事宜，复在平番防剿得力，着赏给头品顶带。”^⑤

事后，豫师一方面报请奖赏部下立功官兵、地方团练和蒙番武装，遣撤防军，招徕民众，恢复生计；同时致力处理因兵燹延误的蒙番事务，设法解决青海诸王公欠俸，重修海神庙，恢复祭海神之礼，与蒙番会盟、处理诉讼事务。由于多年来过于劳累，豫师心疾复发。光绪四年(1878)正月，以豫师署理乌鲁木齐都统事务。九月其离西宁赴乌鲁木齐任，途中目疾加剧，不能视事，被批准开缺回旗调理。

从此，豫师居住京师，潜心治学授业著述。豫师早年从倭仁问学，致力于钻研宋儒心性义理之学。当时，学界极力排斥汉学，提倡宋学，豫师亦撰《汉学商兑赘言》多卷，为宋明理学推波助澜。同时，创设会辅堂，亲临讲学，听者踴跃。当时，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军事和文化侵略日益严重，和他的老师倭仁、同年李鸿藻一样，豫师是坚决的抵制派。记载说，豫师最恶洋字，抵制洋货，其家中无一物来自泰西，洋布亦屏去不用，炕垫、椅垫等，皆以北京土布为之。他认为：“若使中国之人人如此，家家如此，泰西之教，传授何人？泰西通商，买卖何人？”^⑥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国战败，袁世凯畏惧追责，遂在家招致幕僚，为其译撰兵书十二卷，倡以西法创建陆军。袁氏通过豫师得以晋见荣禄，执贄为门生，从而成就小站练兵，创建新军之举^⑦。光绪二十四年，光绪皇帝用康有为进行变法，下诏废除八股文，豫师对人言：“生平最好时文，今废之，崇尚西学，言之痛心。”^⑧ 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与近臣商议废其帝位，豫师向大学士徐桐建议，以端郡王载漪子溥继立。次年十二月慈禧太后立溥儒为“大阿哥”，并于元旦在大高殿、奉先殿由其代替光绪皇帝行礼。豫师在会辅堂主讲时，出试题《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为废除光绪帝位造舆论。时人因豫师官至乌鲁木齐都统，而以都统称之，言：“本朝理学名儒，都统为最后一人。”^⑨ 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豫师逝世，享年约84岁。

④《清毅宗实录》卷229，同治七年四月甲午。

⑤《蒙赏头品顶戴谢恩折》，吴丰培编《豫师青海奏稿》，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

⑥刘十枝《菴楚斋三笔》卷6“豫师等深恶洋字”。

⑦刘禹生《世载堂杂议》“87.沈小沂评袁世凯”。

⑧刘十枝《菴楚斋三笔》卷6“豫师等深恶洋字”。

⑨《异辞录》卷3“豫师出试题”。

⑩《自序》，吴丰培编《豫师青海奏稿》，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页。

⑪《豫师青海奏疏序》，吴丰培编《豫师青海奏稿》，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页。

可知的豫师著作，一是《汉学商兑赘言》多卷。二是《险易录》，又作《险易图说》，有光绪十四年石印本，记载其咸丰九年（1860）至同治八年（1869）间在甘肃为宦的经历。有人赞其所记“惊魂动魄，颇为快睹”，翁同龢却斥“其笔墨太俗”。三是《青海奏疏》。另外《西宁府续志·艺文志》中收有其碑记和诗各一。

二、《青海奏疏》的撰集、内容及价值

豫师《青海奏疏自序》在述及其所撰《险易录》后，称“爰捡先后奏疏，集录成册，异日览之”^⑩云云。显然，结集奏疏的是豫师本人。其同年好友曾任军机大臣的李鸿藻《序》中言，豫师辞官居京后，李鸿藻正亦“奉讳家居，重话旧事，其恂恂安雅犹昔也。每咨以西事，辄归美湘军，笑曰：‘吾不知兵，直以意突耳。无已，请在官奏议志所职，可乎？’受而读之，窃有慨也。”^⑪由此，我们知道：编辑该书的起因是李鸿藻向他询问参与平定西北回民起事的情况，时间是李鸿藻因事居家期间，即光绪十四年（1888）前后。通过对李序内容及所署官衔的分析，我们以为，李氏为之作序的时间，应该在光绪二十二年。故而，豫师编纂《青海奏疏》是在光绪十四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88—1896）间。

豫师任西宁办事大臣的九年（1870—1878），正是清政权内外交困、一蹶不振之际，西北地区更是诸事丛脞。陕西起事回民转战甘肃，使甘省的各支回民队伍如虎添翼，迅速壮大。被清廷派来镇压的左宗棠遭受重大损失，湘军老将刘松山被马化龙回军枪杀。清军经过艰苦的战争，迫使宁夏、河州回军投降，消灭了马桂源、马本源统帅的青海回撒军，再挺进河西和开向新疆。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两宫皇太后扶持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湫继位为光绪皇帝。湘军将领刘锦棠等陆续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各地。清廷任命豫师为乌鲁木齐都统，想借助其辅佐左宗棠安定新疆，并压迫俄军交还所占伊犁地区。可是豫师却激流勇退，以病重为借口，辞官回旗当他的学者。豫师以文人入仕，终至独当一面，其间的经历可谓惊心动魄。他不仅要步步为营，逼迫狡猾至极的西宁回军首领马桂源就范，还要与腐朽的晚清官场精心周旋。为了得到必须的饷银，他上书十数次，派员到几个省坐地催款，最终结算还拖欠一百四十余万两。难怪他心灰意懒，辞官以讲学治学为业。

《青海奏疏》辑录了豫师自同治九年二月至光绪四年九月的公务奏折、附片总共121篇，并附相关谕旨37篇。奏折中包括部分与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宁夏将军穆图善等联署的折子，内容多为与回军作战情况的报告及为立功者荐请奖赏的折片。

阅读这些奏疏，我们不禁为豫师精心筹算，牢牢控扼西北战略要地平番多年的眼光折服，也被青海这一多民族地区政务的艰辛凶险复杂震撼，更因左宗棠、豫师等清后期大员明知事之难为却勉力为之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平番（今永登）既控制着由河东向河西走廊、新疆的东西交通，又控制着由河套、陇西向河湟、青海的南北交通。豫师接任西宁办事大臣后，即死死扼住平番这一战略要地，从而也就控制了陕回、河狄回、西宁回和肃州回的相互支持，为保障王朝西部军政信息交通运输畅通，以及为左宗棠军步步西进、各个击破、终获全胜争取了时间。另外，每当社会动荡、中央政权危殆之时，总有一些怀抱理想的“志士”站出来，从某种大局出发，试图挽大厦于将倾，而且也确实取得成效。同治、光绪间，西方各国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愈演愈烈，英国和沙俄对西北边疆的侵蚀更是猖狂，而西北回民起事又燃成熊熊焰火，眼看帝国大厦难保。这时候，左宗棠、豫师

等人站出来,毅然在西北镇压起事回民,阻遏俄人东侵,其精神与勇气实在可嘉。我们后来的历史家,可以批评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屠杀起事人民,为腐朽旧政权陪葬。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身上体现的那种精神岂不也值得钦佩吗?

阅读奏疏,我们对同治、光绪间的西北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作为多民族杂居的西北,自古以来就是国家追求长治久安的关键地区。平时,各族之间相安无事,但一旦出事,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巨祸。以清代甘肃及其所辖海东地区为例,无论是乾隆间的苏四十三起事,还是咸同间的回民起事,乃至光绪中(1895~1896)的河湟事变,每一次都是从宗教磨擦、民族对立开始,以造反的民族被镇压、对立双方人口的剧减告终。以巴燕戎格厅(今青海化隆县)为例,《西宁府续志》卷四记载,咸丰三年(1853)人口为27565人,后两次事变,到宣统元年(1909)《巴燕戎格厅地理调查表》统计人口为16645人,人口的损失不为不大。光绪十六年杨昌濬、张国常等主撰的《甘肃忠义录》,记录甘肃全省死于同治回变者162360余人,算上被杀和战死的造反者人数,岂不是要在30万人以上了?这种造成民族不和、诸族俱伤的悲剧,难道不能避免吗?这可能是我们阅读本书要深思的一个大问题。

古代的青海地区,历来文化欠彰、载籍稀缺。我们要感谢豫师将其任西宁办事大臣期间的奏疏汇编成册,流传下来。虽然在豫师本人,无非是要借以炫耀其老谋深算、为“国”建勋的业绩。但因为被镇压的回民一方,绝少留下相关的文献资料,借助豫师的记载,我们能看到马桂源、马文义等人在清朝压迫与盘剥面前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和对付统治者的灵活策略^⑩,更能补充青海回民起事资料。要知道,光绪中期以后,关于西北回民起事的记载,多为随左宗棠到西北的将领们所写。这些人对起事的原因以及以前的西北历史缺乏了解,所叙难免片面。直到现在,一般写回民起事的著作还据以称起事首先于同治元年(1862)在陕西爆发,然后才延及甘肃、新疆。从豫师的著作和《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中,我们知道,西宁回撒反清起事早在咸丰十年(1860)十月就已经爆发,有资料证明是甘青回民起事影响陕西起事,而不是相反。我将此观点写入《1860-1873年西宁回族撒拉族大起义》一文,揭载于《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30多年了,为什么有的历史研究者还抱残守缺,不改正误说呢?

西宁办事大臣主要负责管理青海蒙番(藏)事务。从豫师奏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9世纪后期清廷对青海蒙藏政策的细节,祭海和与西海蒙古王公头人会盟的仪礼,办事大臣衙门专员赴玉树番族会盟、处理纠纷案件、收纳贡马、赏给物件的情况,蒙藏部落与起事西宁回撒军的矛盾及其对抗过程,朝廷对蒙藏首领以及宗教上层的怀柔、加封、俸饷、继承和活佛转世认定,对途经青海的活佛和藏区使节的迎送和保护等等。此类资料,实在是太珍贵了。

三、版本考察和新做校注本

据我们所知,《青海奏疏》有三个抄本和一个刊本。

第一个抄本是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青海奏疏》。该本四眼线装为十册一函,函脊以素纸签题“青海奏疏十册全”,全书总计五百六十七页。全书内页皆系书口上端印有“青海奏疏”书名的朱丝栏专用纸,半页七行,行十六字,“宁”字讳书为“甯”。第一册内文首叶钤有朱色“豫之”篆文印,序末署“锡叟自序”,知该本为作者手订的清稿本。

^⑩笔者撰有《试论清代同治年间西宁回族撒拉族起义的原因和性质》论文,发表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1期。

⑬吴丰培编《豫师青海奏稿·写在前面》，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页。

第二个抄本是首都图书馆藏《青海奏疏》。线装四册一函，以无边框及界栏的素色毛边纸抄成。每叶书口写有《青海奏疏》书名，总计三百二十七叶，内容齐全。半叶二十行，行二十字，“宁”字讳书为“甯”。首都图书馆定该书为“民国(1912-1949)”抄本，其实从书中讳字及遇尊上字提行顶格看，当为清末所抄。

第三个抄本是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青海奏疏》，线装12册两函，蓝格，每半叶七行，行十四字。吴丰培(1909-1996)言：“昔年余得见旧抄本《青海奏稿》十二卷，不著撰人，细审内容，知为清同治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之奏稿，前后完备，极可珍贵，曾录副以存。”^⑬吴丰培长期在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图书管理和民族边疆图书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中央民大1960年入藏的豫师著《青海奏疏》(稿本)，应该就是吴先生所言“昔年得见”的本子，但吴先生显然将书名写错了。

刊本是吴丰培先生整理于1981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豫师青海奏稿》。吴先生系以上述抄本《青海奏疏》为底本，拟定新名，整理标点，纠正错讹，并用《清实录》《东华录》等增补原抄本缺佚之文。笔者当时正从事青海回民起事研究，故于发行不久就购得该书，因事前已有首都图书馆藏抄本的复印件，遂两相对照，并查阅《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左文襄公奏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等书，对《豫师青海奏稿》进行考查，撰成《〈豫师青海奏稿〉补校》一文，带给西宁李文实先生，请其指正。李先生旋将此稿荐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于1983年第3期。1993年5月，在苏州参加“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经李文实先生介绍，曾与穿着图书馆蓝布工装的吴丰培先生交谈，告诉他我发表有《〈豫师青海奏稿〉补校》之事，吴先生很感兴趣，表示将来该书重印时要参照该文予以改正。

近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委托笔者对豫师《青海奏稿》重新校注该书，以予出版。鉴于吴先生将作者与书名合二为一的《豫师青海奏稿》书名，不合乎当今古籍整理的范例，故而这次仍恢复作者亲定的《青海奏疏》书名。此次点校，以刊本《豫师青海奏稿》为底本，采用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青海奏疏》豫师原清稿本和首都图书馆藏《青海奏疏》抄本予以整理校勘。由于几种版本都有个别共同的缺篇和缺页现象，故而，我们首先做的是寻找各种文献，尤其是《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左宗棠全集》《清穆宗实录》《清德宗实录》等对缺篇和缺页进行增补。诸本所收奏折原皆无篇名，亦无上奏时间，吴丰培先生给每篇折片皆据奏题拟有篇名，且为少数奏折署以上奏时间。本次校注，对各折片篇名进行了规范，所补充折片另拟篇名。并对诸奏折上奏时间进行考订，尽可能予以注出。且据以对原奏折及附片的排序进行了必要调整。

古人言“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⑭笔者虽勉力于此书之校注，因知识有限、年老懒散，难免瑕疵。但笔者主观愿望，是勉力做出一本尽可能质量高的西北历史文献的整理本。

⑭沈括《梦溪笔谈》卷25引宋绶言。

第一位出使俄国觐见女皇的 中国外交官托时

王希隆

1730年(清雍正八年),清朝理藩院侍郎托时奉命率团出使俄国,至俄国旧都莫斯科,觐见了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并与俄国枢密院(Санат 萨纳特衙门)官员进行了会谈,于1732年(雍正十年)返回国内。托时是清代最早派往俄国觐见俄皇的使臣,也是我国最早派往欧洲国家并到达其首都从事外交活动的使臣。托时之身世活动,《清史稿》不载,相关研究也少^①。笔者曾撰有《托时、德新奉使俄国及其相关问题》一文。本文拟进一步对托时的身世与宦途、出使俄国及相关问题作一述论,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

一、身世与奉使俄国前之宦途

托时,满洲正黄旗人,姓佟佳氏。佟佳氏为满洲望族^②,名人辈出。太祖时,佟养正、佟养性举族归附,著有劳绩,为开国功臣。太宗时编设汉军八旗,其族为中坚骨干。从龙入关后,佟图赖、佟国纲父子等为一代名臣。顺治帝之佟妃,即佟图赖之女,佟妃所生子即康熙帝。

托时祖、父之名不传。其祖父之兄舜古迺岱,1646年(顺治三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汉文作骑都尉,满语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同年,舜古迺岱卒,其子鍾古尔岱袭牛录章京,恩诏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汉文改为二等轻车都尉)。1655年(顺治十二年),鍾古尔岱获罪,销去恩诏,由其弟西尔门袭骑都尉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西尔门卒,1681年(康熙二十年),其子哲尔本袭骑都尉世职^③。哲尔本之后,骑都尉世职为托时承袭。《满洲名臣传》载:“(雍正)八年,袭其祖舜古迺岱所遗骑都尉。”^④似托时为舜古迺岱之孙。但《八旗通志》中列表记载了舜古迺岱获得骑都尉世职及其子鍾古尔岱和西尔门、其孙哲尔本袭此世职之经过,并明确记云:“四次袭托时,哲尔本叔祖之孙,雍正八年袭。”^⑤据此,托时之祖父乃舜古迺岱之弟。

托时初任笔帖式。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由笔帖式授理藩院主事,累迁至工部郎

【作者简介】

王希隆

甘肃省府文史馆研究员
兰州大学教授

①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有:陈复光《18世纪初叶清廷进攻准噶尔期间第一次到俄属及俄京的中国使节》,载《云南大学学报》1957年2期;野见山温《清雍正朝对俄遣使考》,载《俄清外交史研究》东京酒井书店1977年。笔者曾撰有《托时、德新奉使俄国及其相关问题》,载《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4期。

文史论坛

②关于佟佳氏之族属，一般多认为是辽东汉人。其实，早在康熙二十七年，佟国纲曾疏言：“臣先世因在抚顺，倡率明人归来，故隶汉军。其初实系满洲，曾蒙太祖高皇帝谕令，与佟佳氏之巴都哩、蒙阿图诸大臣考订支派，叙明族谱。今请仍归满洲。”《清史列传》卷十，《佟国纲传》。

③见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卷八十六，《世职表四·骑都尉舜古迹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869页。

④《满洲名臣传》卷四十，《托时列传》。清刻本。

⑤《八旗通志》卷八十六，《世职表四·骑都尉舜古迹岱》。

⑥《满洲名臣传》卷四十，《托时列传》。

⑦《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一，雍正四年十二月辛巳。

⑧《满洲名臣传》卷四十，《托时列传》。

⑨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译本，第194页。

中。1723年（雍正元年）春，迁内阁侍读学士。夏，擢户部右侍郎。1725年（雍正三年）夏，调任仓场侍郎。到任伊始，托时体察仓场及漕运情形，多有建言。《满洲名臣传》载：

三年五月，调仓场侍郎。六月，上念直隶被水灾，民乏食，命托时解截留漕米二十万石贮天津仓备赈。托时奏地势卑湿，恐溢烂。诏往勘建……十一月，奏请于万年仓开东门二，增造船，由水运入仓，每年疏浚河道，部议从之。十二月，奏言通州大酉、中南两仓所储稷粟米足敷数十年用，致廩座不敷，新粮露积，请嗣后间年全放稷粟米一次，待支用将完，仍旧兼放。又言向来押运旗丁每帮留一人住通州，名曰守候，需索分肥，弊由斯起。嗣后粮艘到通，运官造本管旗丁花名册投坐粮厅，交毕立押回南，违者治官弁以疏纵之罪。再各仓例有折价给丁三升八合之项，往往勒索迟延，希图舞弊，仓场侍郎察出题参。其应行南追给者，坐粮厅行各粮道照数追给，取领状申报。如粮道有勒索情弊，总漕查参。又各漕帮非失风而报失者，不得依报失风之例，止收平米，应照当年起运数于次年搭运。均下部议行。是月命兼理户部侍郎。⑥

任职不过半年，所上奏言六事，皆得议行，可知托时乃一务实任事之满员。1726年（雍正四年）底，受命兼理礼部侍郎事⑦。但两年后，因失察，宦途遭一起跌。先是托时与陈守创等负责修建京通各仓，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帝遣大臣前往检查，发现“仓廩损坏渗漏处至九百二十九座，米粟竟有霉烂者。”雍正帝以“仓场米石乃国计民命所关……托时、陈守创身任仓场，全不实心料理……甚为溺职。⑧”谕令将二人革职，并分赔损失米石。

托时被革职后，在家闲居了两年。大概正是在这段闲居中他认真反省了宦途起伏的原因并吸取了教训，以后复出任职则更加谨慎务实任事，故此后之仕途顺利，直至休致，终成一代满洲名臣。

二、奉使俄国

1729年（雍正七年），托时再次被起用，作为理藩院派出使臣，“赏侍郎衔出使俄罗斯。”并令“袭其祖舜古迹岱所遗骑都尉世职。”故在俄罗斯文献中称其为“理藩院的第三号要员阿思哈尼昂邦托时。⑨”

顺治、康熙年间，清朝先后接待了俄国不同级别的使臣巴伊科夫（Байков Федор Нсакович）、阿勃林（Аблин Сеиткул）、米洛瓦诺夫（Милованов Игнатий）、斯帕法里（Спафар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维纽科夫（Венюков Никифор）、伊兹勃兰特（Избрант Елизарий Елизариевич）、伊兹玛依洛夫（Измайлов Лев）等。1726年（雍正四年），俄国使臣萨瓦（Владиславич Савва Лукич）伯爵奉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Екатерина I）之命，出使中国。萨瓦此行负有与清朝签订包括中俄中部边界、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之全面条约及祝贺雍正帝登基与宣布女皇即位之使命。1728年（雍正六年）夏，《恰克图条约》正式签订。条约签订之前，女皇已经逝世（1727年5月6日），正在恰克图一带勘界的萨瓦将“俄罗斯女皇业已崩殂”的消息告知了清朝官员。是年初，清朝正式收到以彼得大帝之孙、新即位的彼得二世名义给雍正帝的国书⑩，告以“本察罕汗已继承我祖母之位等语。”鉴于萨瓦赴京祝贺雍正帝登基，雍正帝传谕理藩院：“俄罗斯国与我国友好会盟多年，接连两次派使前来。今至其孙费奥多尔即位庆典之时，著派使臣前往致贺。”1729年（雍正七年）初夏，理藩院决定派托时为使臣率团赴俄国祝贺彼

得二世即位,另派使臣往伏尔加河流域报聘土尔扈特部,并将这一决定行文告知俄国枢密院^⑩。

由于清朝未向俄国派出过使臣,也未向其他欧洲国家派出过使臣。因此,俄国政府接到理藩院的行文后,对清朝的这一举动十分重视。枢密院复文称:大君主已谕令在边界接待中国使团,充分供应他们粮秣、车马,并护送至莫斯科。为此,由宫廷特派一位要员专程前往色楞格斯克,负责护送照料中国使团事务^⑪。枢密院随即任命文官伊万·格拉祖诺夫负责接待与护送中国使团,要求沿途各地都要盛宴款待,在经过色楞格斯克、伊尔库茨克、托博尔斯克等城市时鸣放礼炮,表示应有的尊重。

1730年2月7日(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托时与副使原副都统广西、原护军参领宰三,以及前往报聘土尔扈特部的使臣满泰等及随从跟役共计54人,从恰克图出境。俄方官兵在边境列队欢迎,发礼炮10响,以示隆重。然而,中国使团的使命是前往莫斯科祝贺彼得二世即位,但就在他们进入俄境之前19天(1730年1月19日),14岁的彼得二世却因患天花逝世,由其姑母、彼得大帝的侄女安娜·伊万诺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继承皇位。女皇不愿因皇位交替影响中国使团的到来,故未将此情况及时通报清朝。8个多月后,俄国首席大臣才签发了“为通报彼得去世及女皇即位事致清议政王大臣咨文,”清朝收到此文已经是是年年底了^⑫。

托时一行在俄国护送差官格拉祖诺夫的陪同下,取道西西伯利亚向莫斯科进发。当时格拉祖诺夫已得到了来自俄国宫廷的指示,“……让他将此事告知中国使臣,劝说他们继续登程前往莫斯科,不要让他们等待北京就此事发来别的什么命令。”^⑬按照常规,如果得到俄国方面的正式通知,托时等应原地停留,向朝廷禀报,等待下一步指示。格拉祖诺夫担心告知后托时等会按常规行事,故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让使臣得知彼得二世已经逝世的消息。但没有不透风的墙,5月底开始从色楞格斯克换乘木船取道水路行进时,托时从俄国差役处已得知此讯。但他审时度势后,采取了灵活处理办法。据俄方记载:

中国使臣私下对格拉祖诺夫说,倘若大君主逝世的消息公开向他们——中国使臣宣布,就会立即迫使他们停下来向博格德汗禀报此事,并等待皇上的谕旨,这就需要很长时间。倘若在使团抵达或临近莫斯科时再向他们宣布,他们就可继续前往俄国的路程而不停留。于是,就这样办了^⑭。

这一记载表明,托时坦诚地与格拉祖诺夫交换了意见,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格拉祖诺夫暂不将彼得二世逝世的消息正式通报中国使臣;中国使团以未得到俄方正式通知为由,继续行进。这一建议对于格拉祖诺夫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而对于托时来说,他更多的是在考虑保证完成转交理藩院致俄国枢密院咨文的使命,尤其是同行还有奉命前往报聘土尔扈特部的满泰率领的使团,根据俄国的安排,满泰等也须到达莫斯科后再转道赴伏尔加河下游。因此,身处国外无法与清廷联系的情况下,断然作出这一决定,予以灵活处置,充分显示出托时在非常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和务实作风。

8月11日,托时一行到达托博尔斯克。11月30日,乘坐181辆大车继续西行。进入欧俄地区后,城市渐多,“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盛宴款待和隆重护送。”1731年1月9日(雍正九年十二月二日),行抵莫斯科郊外的阿列克谢耶夫斯科耶村暂歇。俄国政府办公厅参事彼得·库尔巴托夫至住所祝贺托时一行顺利抵达,送来各种葡萄酒和蔬菜。

^⑩此国书于雍正六年二月十九日由俄使伊凡转交赛音诺颜部郡王额駙策凌。见满文朱折《策凌遵旨收递俄皇书折》,载中国第一历史的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23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⑪满文俄罗斯档《理藩院为派使往贺俄皇即位及派大臣前往土尔扈特事致俄萨纳特衙门咨文》,载《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27、528页。

^⑫《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93页。

^⑬见满文俄罗斯档译件《俄首席办事大臣为通报彼得去世及女皇即位事致清议政王大臣咨文》俄历1730年8月14日,《理藩院为俄女皇即位事复俄萨纳特衙门咨文》雍正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载《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37、538页。另据俄人记载,送咨文的俄国专差于是年12月24日到达北京。见《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98页注释1。

^⑭《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99页。

⑮《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99页。

⑯《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03页。

13日,使团移住城郊官邸,为盛宴款待使团,专门从宫廷运来了丰盛的食物、饮料、糖果,并派来了乐队。14日,俄国政府举行盛大仪式,欢迎中国使团。托时等分乘9辆轿式马车,在31发礼炮声、鼓声和布置在两个地方的四个野战兵团的乐队的奏乐声中隆重地进入莫斯科。欢迎仪式之盛大,使托时等深感意外。次日,三等文官斯捷潘诺夫至中国使团下榻处,代表女皇前来祝贺中国使团顺利到达莫斯科,托时等表示了谢意,说“他们对昨天的欢迎和护送感到非常满意。由于不了解俄国,他们未料到会受到如此盛情地接待和敬重。”^⑯此后,斯捷潘诺夫又三次与托时会见,确定了在克里姆林宫觐见女皇的礼仪程序。

1月26日,按照俄国政府安排,托时等分乘9辆轿式马车,马车前面是士兵抬着的18只中国漆木箱和木匣,内装雍正帝赠送给俄皇彼得二世的礼品,包括带金鞘的宝剑1把、锦缎数幅、瓷器、漆箱、柜子等物。托时等进入克里姆林宫时,俄国军乐队击鼓奏乐,以示欢迎致敬。托时与副使广西等在女皇的宫殿前下车。进入宫殿后,托时在女皇面前向俄国首席大臣戈洛夫金伯爵呈递了理藩院致俄国枢密院的公函,并向女皇致词:

最英明最有威力的伟大君主、女皇、全俄罗斯的女独裁统治者! 博格德汗陛下派遣我等,他自己的使臣,前来恭贺女皇陛下继承俄国皇位,转达博格德汗陛下对女皇陛下的永恒友谊并向女皇陛下呈献国产之礼物一宗。博格德汗陛下还谕令我等向女皇陛下问安。博格德汗陛下祝愿女皇陛下永远顺遂,如同太阳永放光芒。

致词由斯捷潘诺夫翻译为俄语。首席大臣代表女皇致答词说:“女皇陛下把贵使团前来庆贺视为博格德汗陛下的特别友好的标志,同样请博格德汗陛下深信,女皇陛下自己也将维护永恒不渝的友谊与和睦关系。”托时又以使团的名义致词说:“我等使臣,阿思哈尼昂邦托时及同僚,谨向女皇陛下伏地恭贺。我等此次受博格德汗陛下派遣,出使俄国,蒙恩见到女皇陛下,亲睹懿容,实为万幸。”戈洛夫金伯爵走近他们致词说:“女皇陛下仁慈接受你等的祝愿,并谕令要赐给你等陛下本人的恩典。”并向托时等宣布,女皇要设宴款待他们。觐见仪式至此结束,托时自宫殿退出,仍由迎接他们的那些人陪送着,走到原来的地方坐上轿式马车,照来时的仪式返回了自己的住所。随后,宫廷礼宾官舍佩列夫就给他们送来了筵席。

托时等自1月9日抵达莫斯科城郊,至3月8日离开莫斯科,在莫斯科共计逗留了两个月时间。其间,1月26日赴克里姆林宫觐见后,1月28日为女皇诞辰,托时等受到邀请,入宫赴宴。此后,托时就清朝出军平定准噶尔的原因以及军事行动期间涉及的逃人引渡等问题与俄国枢密院大臣们举行了会谈,达成了协议。3月1日托时与枢密院首席大臣戈洛夫金会晤,收到枢密院给理藩院的复函。次日,再次觐见女皇,致谢并辞别。7月18日,托时等抵达托博尔斯克与完成报聘土尔扈特部的满泰使团会合,从原路西伯利亚返回,1732年2月14日从恰克图进入中国境内。

三、回国后之宦途

1732年(雍正十年)春,托时率使团返回国内,因圆满完成使命,又得到重用。先补刑部右侍郎,旋转左侍郎,兼理工部侍郎事务。次年,调工部右侍郎,又调户部右侍郎。1735年(雍正十三年),转户部左侍郎,并协办步军统领事务。1738年(乾隆三年)初,奉命赴奉天审案。夏,迁漕运总督。

按托时以京官户部左侍郎迁外官漕运总督,虽同为正二品,但漕督掌八省漕政,独挡一面,应视为托时宦途之最高点。仓场为漕运之终点,与漕运有直接之工作关系。在仓场侍郎任内,托时已对漕运机制相当熟悉,且又有被革职之前车之鉴,故就任漕督后,勤于任事,奋勉效力,察弊堵漏,建言颇多。《满洲名臣传》中载有乾隆三年九月至四年七月托时所上5件奏疏,云:

九月,奏言本年因浚运河,阅兑较迟,至渡黄,又值清口淤阻,途次耽延,弁兵等星夜攒行,多费工力,仰蒙恩命,令臣加赏奖劳。查漕白粮船一百二帮,其先渡淮者并无阻滞,兼闸水深通,起剥甚少,无需议给。唯是江西吉安帮至浙江,嘉兴帮守候二十余日,雇船剥米,用力独多。臣拟将依限抵通全完者,正副旗丁赏银一两,领运千总四两,协运随帮二两,仰副皇上轸念优恤之至意。疏入,报可。

十一月,奏浙江绍兴前后二帮槽船,因乾隆二年截漕济闽,减存在次,旗丁等已领钱粮,部议自乾隆四年始分三年扣还,请将该帮本年应领减半粮银抵充乾隆四年应扣之数,余自乾隆五年起分三年扣完,庶运费从容,各丁不致拮据。从之。

又疏言漕船起运,例用同知、通判以总其成,领用随帮弁目以分其任,立法详尽。迨回空之日,丞倅则借辞引见,任意推延;千总则托故完呈,有心留滞。既不亲押回南,又不料理空船银米,以致副丁资斧不给,弃船潜逃。或遇浅搁沉溺,即至脱帮遗弃,弊端百出。请于起米后令领用千总督同正丁料理回空,各项齐备。其应给粮席完呈,限坐粮厅监督衙门,于十日内给发,仍照例给限单,星飞赶帮;总押丞倅引见后,部臣亦给限单,令速赴大帮。统于到淮日详核,逾者即行参处。允之。

十二月,疏言不法旗丁钱粮到手,任意销糜,偶不敷,辄逃窜,即拿获惩创,一二年后更易姓名,复签管驾,故智复萌。其故由于已革逃丁无从辨识,以致屡革屡签,误运蠹漕,莫此为甚。请嗣后有犯,除依律治罪外,仍照旗逃窃盗例,面刺逃丁二字,察识既易,不能复充,似亦惩奸救弊之一法。疏入,报闻。

四年七月,疏言湖广漕船由水次抵通,计四五千里,较他省最遥,而行月口粮折银四钱,较他省独少,且该省米价渐昂,非从前定价时可比,以故丁力渐难。复查行月口粮,各省皆有本折二色,应将湖广省亦照此例,其半仍作折色,每石折银四钱,半改折色,本色各照该省兵粮例,湖北每石折银七钱,湖南每石六钱,丁力既舒,体例亦昭划一。经大学士等议行^①。

以上奏疏计5件,除报闻1件外,其余4件皆得旨允行,可知托时任漕督一年中之建树。

1739年(乾隆四年)秋,托时迁刑部右侍郎。五年后调补盛京刑部侍郎。1746年(乾隆十一年),以老病乞休得准。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卒,享年不见记载。如以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由笔帖式授理藩院主事时为年已25岁左右之青年推测,则卒时已是古稀之年。所遗骑都尉世职由其子佟起承袭^②。

四、余论

清朝定鼎北京后,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两国在东部的边界,结束了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冲突,开始了正常的外交与贸易往来。两年后,清朝通过多伦会盟,对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编旗设领,进一步加强了行政管辖。

^①《满洲名臣传》卷四十,《托时列传》。

^②《满洲名臣传》卷四十,《托时列传》。

①⑨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89-1792)》中译本,第152页。

②⑩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89-1792)》中译本,第194页。

但由于中俄中段边界尚未划定,常有逃人等问题发生,影响到北部边疆地区的稳定。清朝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俄国转达通过谈判划定中段边界的愿望,但直至康熙晚年,未得到俄国的响应。这种状况的长期持续严重影响到中俄关系的正常发展。1721年(康熙六十年),清朝下令停止中俄贸易,拒绝俄国商队来华,中俄关系陷于僵局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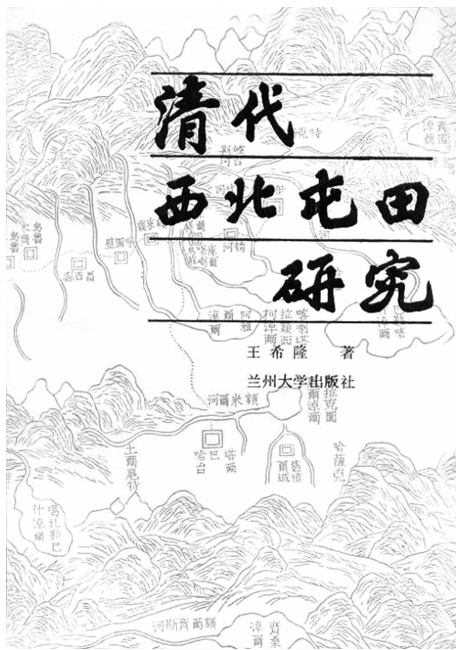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1725年(雍正三年),东西方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中国的康熙大帝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先后逝世,雍正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先后即位。两大邻国皇位的更替,为打破僵局,解决问题,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提供了契机。叶卡捷琳娜一世即位的当年,首先以祝贺雍正帝登基和宣告自己即位的名义,派遣伯爵萨瓦率团来华谈判边界、商务、外交问题。雍正帝对俄国此举表示赞赏,予以高度重视。萨瓦使团进入北京时,“受到了共约八千名步兵和骑兵夹道鸣枪欢迎”。^{①⑨}礼遇之高,前所未有。双方经过58次会谈,历时20个月,最终于1728年6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巩固了在华的商务地位并得以在北京建立东正教堂派驻传教士团和留学生,特别是清朝不再坚持收回被蚕食的蒙古牧地,故俄国方面对此条约十分满意。清朝则因漠西准噶尔蒙古自康熙中期以来叛服无常,多次侵扰漠北喀尔喀蒙古,故划定北部边界,消除来自北部的威胁,全力对付日益强大的准噶尔蒙古,统一西北边疆,是清朝期望达到的目标。总之,《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打破了中俄之间的僵局,实现了中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中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清朝在接到俄国方面通报叶卡捷琳娜一世逝世、彼得二世即位消息的国书后,首次以祝贺俄国新皇即位的名义向俄国派出使团。

在此之前,中国尚未向欧洲国家正式派出过使臣。作为第一位出使欧洲国家俄国的中国使臣,托时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首先,自然是带领使团克服途中艰险和解决遇到的问题,行程万里,到达城市的目的地俄京莫斯科。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从北京出发,经过蒙古高原行抵中俄交界的恰克图,再从恰克图进入俄境,取道西伯利亚西行进入欧俄地区,这一行程纬度高,途中人口稀少,而且是在冬春之际行走,荒漠冰天雪地,非易行之路。正因为如此,刚刚进入俄境,同行的副都统布达西即因途中劳累患病逝世于色楞格斯克地方,在当地火化^{②⑩}。这不能不对使团成员们的情绪产生消极影响。而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又有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即传闻俄皇彼得二世逝世,而且很快托时就从俄国护送差官格拉祖诺夫处证实这一传闻为事实。停留等待朝廷下一步的指令,是正常而无可非议的。但是,托时权衡了利弊之后,在与朝廷无任何联系的情况下,灵活应变,主张继续西行,这充分显示了托时的务实作风、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使团在俄境内行程历经11个月(1730年2月7日入境,1731年1月9日到达莫斯科郊外),最终到达了尚无中国使臣到达过的欧俄地区的莫斯科城,初步完成了此行第一阶段的使命。

托时此行是清朝对萨瓦赴京祝贺雍正帝登基的回应,因此,赠送贺礼祝贺俄皇即位为使团主要之使命。但更为重要的是,清朝当时正在准备用兵准噶尔完成统一新疆的大业,而准噶尔部活动地区临近俄国边境,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向俄国通报清朝的行动,请其理解清朝的用意,并就统一战争期间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如清军临近俄国边境、准噶尔头目逃入俄境等问题达成协议,是很有必要的,是清朝履行《中俄恰克图条约》有关规定的实际行动。在随后与俄国枢密院的会谈中,托时向俄国枢密院大

臣们通报：“(清朝)军队在俄国边境附近有所行动,请俄国朝廷不要有任何怀疑”;如果准噶尔领主和宰桑等大首领逃入俄国,请俄国将其引渡给中国;并请求俄国方面把同行的报聘土尔扈特部的满泰使团安全地送至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部牧地。并就这些内容与俄国枢密院大臣们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一重要使命的完成,使得清朝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行统一事业。

应该说,首次作为清朝外交使团代表,承担着空前艰巨的外交使命的托时,圆满地完成了负有的所有使命,正因为如此,返回国内后他再次得到了重用。然而,此次除往返途经蒙古高原外,在俄境行程两年(1730年2月7日从恰克图进入俄境,1732年2月14日从恰克图进入中国境内),途经西伯利亚、欧俄地区,与俄国西伯利亚、欧俄地区各大城市官员、百姓都有接触;在莫斯科停留两月时间,三次入宫觐见女皇,多次参加盛大的欢迎仪式,参观游览莫斯科各名胜,参加音乐会,与俄国枢密院官员数次会谈,为托时一生中内容最为丰富多彩之经历。也是清朝前期空前未有的一次外交壮举。然而,我们至今没有见到托时此次出行的行记和关于这次出行向朝廷的汇报奏文。在此之前,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清朝派太子侍读殷扎纳率使团取道西伯利亚赴伏尔加河下游报聘土尔扈特部,使团成员内阁侍读图理琛记录途中所见所闻,撰成《异域录》一书,成为了解当时西伯利亚与欧俄地区人文、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的重要文献。而托时出行之远,经历之多,远远超过了殷扎纳使团,然而至今我们未能见到他对此次外交活动的直接记载,只能在俄国档案记载中了解他的活动,这应该说是甚为遗憾的事情。很难令人相信,托时此行没有自己的记载,或许他的记载被尘封于清代档案之中,关于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笔者在《托时、德新出使俄国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相信随着对清档整理工作的进行,有可能使我们对此次活动有更多的了解。



【图解】

《清代西北屯田研究》书影

(后接第 29 页) 宽 3 米,夯层厚 7~9 厘米。堡子开东门,南墙和东墙中心有马面,堡墙四角均筑有马面。南墙部分破坏严重,其它三面墙体保存较为完整,堡子内现为农田。为明代堡址。

12. 李家堡子位于万泉镇史沟村李家堡子北面山坡上。北为半截墩山,南临水洛河,东望史家沟,西为李家川。东西长 100 米,南北宽 50 米,分布面积 5000 平方米。遗址以李家堡子为中心分布,堡子东西长、南北窄,平面呈长方形,堡子长 80 米,宽 50 米,残高 5~8 米,西南墙角马面保存完整,其它堡墙坍塌非常严重。属清代堡子。

【作者简介】

李维仓
庄浪县政协副主席

庄浪古堡遗迹流域分布延伸考察

李维仓

庙隆沟流域的古堡考察

庙隆沟发源于赵墩乡东北唐山梁南侧的王上湾,呈东北——西南流势,是县境内唯一属于一个乡辖的较大河流。途经阳川坡、刘罗家、石家塬,安家洼、石家湾、王家高塬、裴家堡子,沿途有下阴坡湾、刘罗家咀河、梁家湾、下梨树湾、三湾沟、王家峡、山家沟、槐树湾等沟水补给,在赵墩乡西部的张家塬小河头注入葫芦河。

庙隆沟全长 15.2 千米,河道平均坡降 20.4‰,流域总面积 74.8 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486 万立方米。因其水质咸苦,故有苦水河旧称。《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庄浪县苦水川:“在县西二十里,按《明一统志》其水味苦。”明清庄浪县治在今南湖镇,苦水河应指今庙隆沟水。

赵墩乡位于庄浪县西北部,地处两省区(甘宁)三县(庄浪县、隆德县、静宁县)交界处。庙隆沟是我县唯一属于赵墩乡管辖的河流。该乡是纯山区乡,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庙隆沟流域斜穿全乡。全乡地形由两条主梁分割出 9 湾 18 岔,110 多条大小沟壑组成。平均海拔 1800 米,最高处孙庙高庙山海拔 1950 米,最低蛟龙掌小河头 1650 米。值得一提的是,赵墩乡 1993 年实现了全乡耕地梯田化,大庄村被誉为“中国梯田第一村”称号。

赵墩乡地貌复杂多样,地形崎岖破碎,立地条件艰苦,古堡的分布多散布在山大沟深的村庄附近或梁崩山巅。

1. 赵家堡子

位于梨树湾杜家二社的村庄北侧。土堡呈长方形,长度 26 米,宽度 21.3 米,堡门朝东南开,堡门顶部的土墙上有一注水孔,用于防止堡门的木门板和门顶棚木燃烧后灭火,起到消防应急作用。注水孔直通到堡墙的顶部,便于从上到下灌水。堡门高 2 米,宽 1.4 米,木门紧锁。堡墙高 8~11 米,建有两个高大的烽火台,堡子顶部原有高 1 米多的小围墙,现在基本塌损,痕迹能看到。堡子占地 1 亩多,夯层厚 6~8 公分。

赵家堡子修建于清末民初时期,是当地的大财主赵思尚出钱出粮雇人修筑的私堡,为当时梨树湾二社的村民跑土匪避难,防止匪患起了很大的防卫保护效果,目前院堡荒

废,保存完整。

地理位置北纬 35°23',东经 105°54',海拔 1780 米。

2.王家堡子

地处梨湾村七社王庄,鹿儿梁山下。鹿儿梁绵延舒展,很象一头静卧在梁顶上的吉祥梅花鹿。王家堡子居梁下半山腰地势相对平坦的坪台上。堡内住郭家和王家两户村民,王家为堡主,郭家是解放后土改时划分的宅院。院前大树翠绿,生气旺盛。

王家堡子基本上是正方形,长 34 米,宽 30 米,东面开一堡门,门高 2 米,宽 1.2 米,棚木完好,木门板厚 20~30 公分,门洞坚固,出入安全。堡墙高 8~10 米,墙体厚 2.5 米,夯土层厚 8~10 公分,黄土夯层清晰,土层依然坚硬。土堡因长期有人居住,保护及时,堡墙和堡门保存完整,至今仍发挥着居住、生活和观赏的作用。堡内居住的郭姓村民家的门牌上写着“赵墩乡梨湾村七社 36”的门号。

王家堡子位于北纬 35°24',东径 105°54',海拔 1850 米。

我们在赵墩乡张唯乡长和村支书、主任的引导下,详细踏勘、丈量,并实地采访当地年长的村民,了解过去和现在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历史传说。

3.梁顶堡子

赵墩乡牡丹二社梁顶堡子,又称堡子梁堡子。在前往梁顶半山腰的公路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堡子的规模和圆形堡子的轮廓。到了实地,进入堡子里面看到的是堡子围墙年深日久,风化剥蚀破损严重,堡墙内侧离堡子地面高出 1.5~2 米,外侧堡墙高 3~4 米。梁顶堡子由于离牡丹村偏远,人为破坏的不明显,主要是自然破坏的严重。整个堡子呈现椭圆形,看起来像一个大鸡蛋,一头大一头小,即北面大南面小。长轴长 67 米,短轴长 30 米,堡门朝东开,现只剩下一个豁口。

村支书程宏伟讲,听老人说堡子为同治年间修造。过去堡子里种过柳树,因水源短缺,树木成活较少,现在荒草、灌木丛生,一片荒凉景象。

堡子梁堡子位于北纬 35°21',东径 105°55',海拔 1950 米。

4.裴范堡子

位于裴范村,又叫裴家堡子。堡墙损坏严重,仅靠庙隆沟的一侧可以看到延伸的堡墙,堡墙为两层,一层是同治年间构筑的,一层是民国年间补筑的。残墙厚 1.5~2 米,残留部分高 5 米左右,过去堡墙大约 10 米高。据粗略估算,堡子长为 100 米,宽约 84 米,形状是长方形。裴范堡子遗址绝大部分被赵墩乡裴堡小学和裴堡幼儿园占用为校园,前面是学校、操场和厕所。堡子的另一部分被裴堡村村民修建为宅院。我在 1990 年曾被县教育局抽调参加全县计划生育工作进驻裴堡村半个多月,记得当年裴家堡子的城堡土墙还较为完整,堡墙多为村民宅院的院墙,高墙大院,印象十分深刻,而今,昔日的痕迹不复存在。

担任向导的 62 岁裴堡村主任范来福介绍,裴范堡家现有 108 户人家,但当时只有 20 来户人,大多数为裴范两姓,各占一半。还有秤、张、杜、魏、刘等姓氏(资料:秤姓为蒙古族的后裔,有的地方叫称姓,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氏群体,“称”姓是一个历史悠久,姓源单一的姓氏)。听先年人说裴范堡子同治年间为防土匪入侵修建的。当年裴堡人打土匪的时候,阳川富汉捐的是钱银,裴堡的富汉范家大老爷捐的是粮食,范大老爷捐粮食一万石,官府联合当地乡民和官勇一起奋勇抗敌,一举打退土匪的武装侵扰。朝廷为了

奖赏范家富汉的义举贡献,特悬匾“万石粮”一面。据范来福口述,他小的时候都见过这个木质匾额,字是真金做的。后来听说有人拿去加工制作成了喂牲畜的驴槽。“万石粮”朝廷牌匾,到底有没有,仅是一种民间传闻,无据可考,无史料可查,听起来很离奇。

水洛河流域的古城堡续考

水洛河属渭河的三级支流,为葫芦河最大支流,是庄浪县境内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在县城以上分为水洛北河和水洛南河,两河在县城西南部水上公园西端汇合后称为下水洛河。河流总长约100千米,流域总面积942.99平方千米,庄浪境内长89.9千米,流域面积878.69平方千米。

北洛河。即水洛北河,发源于六盘山西麓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境苏台乡黄草沟,源地海拔2700米。从县境东北隅通化镇红崖湾流入,主流经过通化、良邑、水洛三个镇,沿途接纳阳岔沟、东峡、梁河、外儿河、章麻河、陈家峡、小河子沟、李家咀水等支流,在水洛城(《水经注》称水洛亭,《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又名洛口城)西南与水洛南河交汇。水洛北河全长41.3千米,河道平均坡降26.6‰,流域总面积345.85平方千米,其中境内河长32.2千米,流域面积296.52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3335万立方米。

南洛河。即水洛南河,发源于六盘山西侧韩店镇关山灶火沟一带,源地海拔2480米。上游地处关山林区,支流补给众多,河网纵横交织,水系比较发达。相继有黑林沟、庞家沟、王家堡崖河、石庄沟、佛沟、鲁生沟、花崖河、梁家沟、岔岔沟、龙家湾、马家寺沟、郭家沟、试雨河、谢家沟、黄家窑湾、马家沟渠、马家大湾、木瓜湾、刘家湾、沈家沟、王家沟、张家沟、唐家沟、大房李家沟等水汇聚,沿途流往韩店、南坪、水洛三个镇。水洛南河史称犍奴水,河道流域称犍奴川。河流全长39.3千米,河道平均坡降22.4‰,流域面积348.28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3561万立方米。

下洛河。水洛北河与水洛南河在县城西南部汇合后,径流增多,河道展宽,水势凶猛,滚滚流向西南,统称水洛河。水洛河干流接纳文家沟、吊沟、柳家沟、朱家咀水、吴家沟、孔家沟、贾家沟、长尾沟、青龙沟、贾家河湾、马家沟等支流,途经石门口,水洛河西穿石门之后,古称石门水,在万泉镇徐家城出境与清水河汇合后经清水峡汇入葫芦河。河流全长26.2千米,河道平均坡降8.4‰,流域面积258.81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616.6万立方米。水洛北河水质纯淡,水洛南河水质微碱,下水洛河偏淡。水洛河流量受当年降水量制约,每年四至九月为洪水期,十一月至翌年三月中旬为枯水期。

水洛河流域是县境内各流域古城堡历史文化遗存分布最多、最广,类型最全、最杂的区域。

1. 杨王家堡子

位于良邑镇杨王村的北山上。杨王家村依山傍水,北面紧靠两座梁峁,一座叫大坪,一座叫北山,北山上因修筑有堡子,当地人称堡子山。堡子山地势陡峻,山形险要,堡子居高临下,防御功能十分突显。

杨王家堡子外形像一艘大船,也像一个巨大的金元宝。椭圆形的土堡长轴长115米,短轴长35米,从南面的堡门到北面的烽火台,边长达135米。堡门所在的东南侧马面土墩,长16米,高10米。北面靠山梁的烽火台长10米,宽7米,堡墙高15~17米,堡子的东、西各有两座马面土墩,东面的马面长11米,高13米;西面的马面长10米,宽7

米,高12米。堡墙上的垛墙(女儿墙)局部保留,高2米。堡子基本上呈椭圆状,南头大北头略小,堡子依山势而建,北高南低,堡子里面分三级台阶,阶梯状排布,周围荒草丛生,中间地里苜蓿生长茂盛。

杨王家堡子地理位置处于北纬 $35^{\circ}16'$,东径 $106^{\circ}4'$,海拔1880米。我们在村上采访了89岁的王志凯老人,他说:“堡子山上的堡子,同治年前什么时候修着打的,不太清楚。但同治年间对面张家沟的堡子被土匪攻破,土匪造反,土匪贼把张家沟的人押解到村上(杨王村)的大场里叫喊着,扬言要把全村人用碌碡全部碾死。当时驻守堡子的王老五让躲避在堡子里面的杨王村人不要乱跑,他一个人在堡子顶上用土炮绑上3个‘过山鸟’(即土制炸弹),向山下场里的土匪打去,‘过山鸟’威力很大,打到场里把土匪炸地抱头鼠窜,四处逃跑,当时场里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村民乘机都逃脱了。杨王家堡子既救了张家沟的人,又保护了杨王家全村父老。大坪堡子被土匪破过,而杨王家堡子一直平安无事。”

2. 石门口刘家堡子

地处万泉镇石门口刘家山顶,土堡堡门朝东南开,堡子呈椭圆状,长轴长127米,短轴长55米,北面的烽火台高大雄伟,堡墙高14~17米,东、西两侧的堡墙厚4~6米,墙体高11~12米,夯土层9~12公分。墙体轮廓完好,但局部地段破损坍塌。进入堡子里面,农民的承包地种植的很好,苹果树修剪规范,玉米长势良好,油料作物荏子丰收在望,可以看出万泉镇人多地少,农民对每一寸土地都很珍惜。

站在石门口刘家山上堡子城墙上,对面石门堡遗址隔河相望,雄伟壮观。山下水洛河穿过,由中铁十九局承建的天平高速工程和隧道正在紧张的施工。刘家堡子地理位置位于北纬 $35^{\circ}5'51''$,东经 $105^{\circ}54'8''$,海拔1550米。

3. 石门堡

石门堡为县境内重要的古城堡之一。位于朱店镇与万泉镇交界的小湾村傅家西200米水洛河南岸高距河床50米的突出石山顶端,北面到秦隆公路,南到傅家小湾庄,东到小湾山坡,西到壕沟。堡址平面呈椭圆形,长200米,宽130米,东墙残长30米,高3~6米,开一北门,墙体为黄土夯筑。石门堡下临天堑石门口。水洛河束流崩雷湍急,两岸断峭壁,当时东南半壁凿仅数步宽一线小道。如此狭窄绝险,却是秦渭往来要径,并以“石门口”而驰名。石门口山上设堡,名石门堡,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卡,为保一方平安起过很大的作用。《明一统志》谓:“山石如门,其路斩截。”清乾隆时的《静宁州志》曰:“石门高山堡。”因而,此堡又称石门高山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城堡筑于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为水洛城所辖二堡之一。北面为“秋月观”,内存“秋月观”碑刻一通,红砂岩质,长方形,为明万历壬午年(1580)刻。1992年1月由县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堡遗址虽残垣断壁,但仍不失往日雄风伟严。

4. 董湾古堡子群

朱店镇董湾村古堡分布相对集中,全村从塬上开始依山而上筑建有古堡三座,从低到高分别是董家湾塬上堡子、外连城堡、永安堡,堡子与堡子上下相连,错落有致,前后呼应,规模庞大,气势恢弘,蔚为壮观,保存相对完整,是水洛河下游流域古堡成群的地方,也是我县境内古堡群落的典型代表,极具考察研究价值。

(1)董家湾堡子。当地村民又叫塬上堡子。堡子地处董湾村四社,土堡选择地形平坦

的塬坪上修筑,开阔向阳,适宜居住,堡内村民集中,宅院遍布,据传是当地大富豪董老爷出钱捐粮雇用当地的村民修建的堡子,供董湾全村人居住生活。

塬上堡子面积广阔,外形呈长方形,东西堡墙长 107 米,南北堡墙宽 80 米,东侧堡墙很完整,西侧和北侧堡墙体局部有破损,但基本保留遗址,南侧堡墙有 23 米完好,其余毁坏严重。堡子开有东、西两个堡门,东堡门至今供村民出行,堡门宽 3.8 米,高 2.7 米,夯层清楚,层厚 8~10 公分。西堡门两侧墙体保存,堡门已无痕迹。堡子墙体基宽 2 米,高 7~8 米。72 岁的董湾村四社村民董成鹏口述,他的几代先人都住在这个堡子里,是地地道道塬上堡子的后代,现在堡子里住有村民千人之多。

董家湾堡子位于北纬 35°8'49",东经 105°59'51",海拔 1560 米。

(2)外连城堡。从董家湾堡子顺着山坡走四五十米,看到一座堡门,本地人称闸门便是山上堡子的第一道防守大门。闸门宽 2.8 米,高 2.3 米,堡门上方有 8~10 公分厚的棚木,门框、门板荡然无存。堡墙厚 1.7 米,墙体高 6 米,最高处的瞭望台高 12 米。站在堡门上面的堡墙上向下望去南高北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闸门实际上是外连城堡的“山寨门”。外连城堡墙仅剩 37 米长的一段,其余都已坍塌。听说当年马家队伍打到董家湾的闸门处,由于壁垒森严,土匪久攻不下,便撤离而去,确保了永安堡第一道防线的安全。永安堡长久稳固,永远安宁。

(3)永安堡。永安堡地处董湾村南山半山腰的丘陵崮顶上,俗称“堡子”。堡子是一个几何图形的组合体。里连堡由一个长方形和半椭圆形的堡墙组成。西面属长方形,东面是半圆形,形成永安堡的主体。堡墙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堡内地势南高北低,和当地地形大势保持一致。堡子开有北堡门和南堡门,北堡门宽 1.2 米,高 1.5 米,仅容纳一人出入;南堡门现已封填。永安堡是当年跑土匪供董家湾和吴家沟两村村民躲避匪患的安全避难所。董家湾人走北堡门,吴家沟人走南堡门,两村人历史上就患难与共,利害一致。

永安堡依地形地势而造,长方形堡墙高大,墙体高 8~10 米,西南角的马面土墩基宽 14 米。东面半圆形堡墙渐低,呈西高东低状缓缓延伸。西堡墙长 66 米,南堡墙长 105 米,墙厚 3.5 米。堡内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全为董湾四社 5 户董姓村民的耕地,种植有苹果,花椒、玉米、蔬菜,占地面积 6 亩。

里连城和外连城之间的区域建有私人养牛场,场主董富珍介绍存栏奶牛 22 头,牛种为赫斯特里白花牛。

永安堡地理位置北纬 35°8'47",东经 105°59'55",海拔 1590 米。



5.胡家堡子

胡家堡子位于万泉镇王岔村四社胡家岔西山梁崮上(北纬 35°6'33"、东经 105°48'53"),依地势而建,东高西低,堡门朝西,现成缺口。堡子呈不规则圆形,墙基宽 1.5 米至 5 米不等,顶宽 0.8 米至 2.5 米不等,外墙高最低 4.6 米,最高处 7 米,内墙最低处约 2 米,最高处约 5 米。堡外墙

【图解】
永安堡

朝东有未打通洞口一处。堡内占地约5亩,中间有凸起土台(筑堡时未取土部分),依台埂墙有残破窑洞一口,据村民介绍,堡内原有水井两眼,四季不竭。近几年才回填。据王岔村主任胡江鱼回忆,他已去世的爷爷常说堡子与他同岁,老人今年诞辰100周年,由此推算,堡子大约建于100年前左右。

6. 弥僧堡

盘安镇颀崖村弥僧堡坐落于颀崖村三社负家沟,小地名堡子沟,形状为椭圆形,直径为50米,墙高10米,底墙厚度为4米,墙顶厚度为2米。堡子大门方向朝东,大门高10米,宽4米。

堡子修建年代约为明朝末年,于1942年维修过一次,主要用途作为防范土匪的烧杀抢掠,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堡子名为弥僧堡,传说中为关公驻军所在地。现在已成为颀崖百姓的耕地,堡子里面主要种植马铃薯、小麦。岁月流逝,时光变迁,弥僧堡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战乱年代保护着他的子女不受强敌的凌辱,在和平年代养着他的子孙丰衣足食。

7. 郭家堡子

位于水洛镇郭家堡村。土堡呈平面方形,边长250米,东西残200米,残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北部残长30米,高4米,基宽3米,夯层厚10~15厘米。城门位置不明。在夯层中发现汉代和宋代陶瓷残片。该堡子传为宋代名将郭浩后裔所筑,残存明散官郭赐、郭循碑一通。碑为红砂岩石质,圆首。残高1.48米,宽0.8米,厚0.15米,碑阳刻楷书,竖行16行,每行30余字,字迹漫漶不清,略可辨识。为明代南城兵马副使郭循父郭坚及妻子的封诰碑。为明代军事设施遗址。

8. 高家堡子

位于南坪乡阴洼马家村南约200米处的山顶。堡址呈东大西小的三角形分布,因地形而建,残存东墙、西墙遗迹,残高5米,有西门及瓮城,东西长100米,南北宽30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高山堡子东为阴洼马家村,南有刘家河,西为刘堡坪,北为水洛南河,距河床高约500米,地理位置四面开阔,地势险要,山大沟深。从堡址四周可将周围一览无余,为明代早期堡址,是重要军事遗址。

9. 韩家堡子

位于通化镇梁河村四社三角地带山顶上。堡子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80米,南北宽60米,面积4800平方米,墙体为黄土夯筑,夯层厚0.1米,残高6~8米,墙基宽3米。开南门,门口上有圆形马面。夯层内夹杂有黑釉瓷、白釉瓷碗残片,另采集有白釉瓷碟和青花瓷片。堡内现为村民居住、耕地。为明清堡子。

10. 塌堡子

位于朱店镇中街村山上李家庄西500米山顶。堡子依地势修建,平面大体呈“弓形”,东西长140米,南北宽30米,黄土夯筑,残高1~6米,基宽3米,夯层厚8厘米,开北门。堡子南北长、东西窄,东墙直形,西墙依地势呈现形,东西墙破坏严重,残高仅1米左右,南北城墙保存较为完整。堡内散见大量砖、瓦和黑、白瓷片。建于清代同治年间。

11. 阳坡堡子

位于柳梁乡阳坡村中。西至长坡沟,东、南、北三面被村庄环绕。东西长60米、南北宽80米,分布面积4800平方米。堡子平面呈长方形,残高2~6米,基(前转第23页)

定西拉扎节内涵和成因探析

——以渭源县麻家集镇为例

杨世明

【作者简介】

杨世明
定西市文史研究会

定西西南部的渭源县麻家集、峡城、田家河是一个汉族聚居区,在这里盛行着一个传统节日,仪式隆重,其热闹盛况超过了春节,它以跳山神这种独特的活动为主要习俗。在众多的传统节日里,民间信仰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子,如春节祭祖、中秋拜月等。现代社会虽然出现了节日中各种信仰仪式的衰退趋势,但它仍然是维系节日传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透过拉扎节跳山神这种独特的民俗活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山神崇拜观念是维系拉扎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于拉扎节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文献没有具体记载,当地群众只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日期,年复一年地进行着这种民俗活动。同时,在当地民众中流传着一段传说,但考察拉扎节的实质内涵,关于拉扎节起源的解释又显得力不从心。那么,拉扎节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将以格尔茨的文化解释理论为指导,从拉扎节及跳山神活动的存在空间、拉扎节的传说、拉扎节及跳山神活动的存在现状以及拉扎节背后的意义之网四个方面,来探讨拉扎节及其跳山神活动的实质内涵和形成原因。

一、拉扎节的传说

关于拉扎节的形成,有一段美丽的传说。

相传南宋时期,洮河因水妖作怪,两岸连年遭受水灾,有位名叫拉扎的藏族青年,他驾着石船,舍生忘死降服了害人精孽龙,消除了水患,自己却被无情的河水冲走了。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把他住的村庄命名为拉扎湾,给他修了庙,画了像。在丰收季节,各村轮流向拉扎敬献丰收果实,后来就演变成了“拉扎节”。拉扎驾过的石船现独占鳌头,昂首屹立在峡城乡的秋池湾,当地老百姓还在石船上建有寺庙,故名船崖寺。清代诗人吴镇写有“石船藏水面,峡断锁林开”的诗句。

据《渭源县志·民族》记载,唐朝中期至宋朝的300多年间,吐蕃在这里居住开发。宋朝时居住在渭源一带的羌族首领俞龙珂接受王韶的安抚,率12万口之众归宋,修筑渭源三堡(即王韶堡、七圣堡,庆坪堡),定居垦殖。明朝名将(藏族)因维护统一有功,至正

统五年,被英宗朱祁镇以久著边功赐姓“赵”名“安”,封会川伯授临洮卫世袭指挥使,封地在今渭源县会川镇一带。清代又封置为“土司”。据《赵元铭土司档案》及《天乙土司袭职录》记载:“土司袭传十九代,其行政机关设在桧柏新城(今会川新城)”。详见其翔:

一代土司:赵安,明正统五年授任。原为陕西行省平章加宣慰使都元帅。封会川柏,临洮卫土官指挥同知。生有三子,赵英、赵雄、赵文。

二代土司:赵英,正统十年正月袭职,特升世袭土司指挥使,驻临洮卫管事,管领土军,凉洲备御。生一子赵铨。

三代土司:赵铨,成任十九年二月袭职,衔职同前。管理土军,凉州备御。生二子:赵济、赵浚。

四代土司:赵济,弘治十六年十一月承袭,衔职同前。统领土军,防御安定,守备兰州河桥。生三子,赵梁、赵渠、赵概。

五代土司:赵梁,嘉靖九年八月袭职,衔职同前,统领土军,防御西固城池地方,生一子赵昆。

六代土司:赵昆,嘉靖三十六年正月袭职,衔职同前。军政推选掌临洮卫印务。生三子,赵永在,赵永佳,赵永仕。

七代土司:赵永在,万历二年二月袭职,衔职同前。兼摄临洮卫印甸。生一子,赵重琮。

八代土司:赵重琮,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袭职,衔职同前。推行临洮卫军政掌印,委建岷州七路墩台。生一子赵师范。

九代土司:赵师范,天启六年十月袭职,衔职同前。推行临洮卫掌印。肃王征剿三寨运粮有功。生三子,赵枢勤、赵枢赞、赵枢劼。

十代土司:赵枢勤,清顺治十六年袭职,衔职同前,袭职后病故。即由其弟枢赞获理土司事务。康熙十四年枢赞随靖逆侯将军张勇剿匪有功加授游击扎付,生一子赵煜。

十一代土司:赵煜,康熙三十一年五月袭职,衔职同前,无子。

十二代土司:赵延基,雍正五年十二月袭职(延基以堂兄侄承嗣,系赵煜之叔枢赞之子赵煜所生之子),衔职同前。雍正十四年四月旨议饬派土兵在密路关马厂获牧,曾解送军马五百匹。生三子,赵恒磷(早故)、赵恒钿、赵恒锐。

十三代土司:赵恒钿,乾隆十七年九月袭职。衔职同前,乾隆十九年二月,上渝委办台站夫役骡马,记功三次。无子,以其弟恒锐之长子赵澄继嗣。

十四代土司:赵澄,乾隆三十四年九月袭职,衔职同前。赵澄先以年例不符,由其父赵恒锐获理土务。于乾隆五十九年二月病故,换赦书一道,生五子,春梓、春荣、春果、春榆、春茂。

十五代土司:赵春梓,乾隆五十九年三月袭职,衔职同前,嘉庆十八年八月病故,换颁赦书一道。生三子,正炖、耀炖、丙炖。

十六代土司:赵正炖,嘉庆十九年九月袭职,衔职同前。咸丰二年九月病故,无子,以其弟丙炖之次男赵坛继嗣。

十七代土司:赵坛,咸丰四年九月袭职,衔职同前。同治元年,河回倡乱。赵坛受陕甘总督令调,赴狄道防守城池。所有幕务有其兄赵址(养心)代理。同治二年七月赵坛又调赴洮州。卓尼催调杨土司番兵。并带本部土军配合官军,攻剿河回。八月二十七日狄道

城失陷，又调赴巩昌招募靖逆营，协同统领“剿匪”。同治四年回军攻巩昌，官绅请赵坛赴陕甘大营求援，随带士兵七名，寅夜出城，行至北路十里董家堡被匪杀。无子，以其兄赵养心之长男元铭继嗣。

十八代土司：赵元铭，光绪十九年十一月袭职，衔职同前。民国三年，白郎起义，元铭率土军在会川黄香沟防守，旋以病率。生二子，赵柱（天乙）、赵麋（字仲舟）。

十九代土司：赵柱，民国四年六月袭职，民国十五年，甘肃边防督办刘郁芬实施“改土归流”取消土司，统一基层体制，原土司属地归入毗邻州县，赵土司自不例外。从此，土司宣告废止。

赵土司军政基层组织为族，按地区分布，共有十六门族，族辖四十八庄村，现分述如下：

桧柏大庄族：辖松柏山、川地。

纳住醋那族：辖麻家沟、醋那。

豆巴包漆族：辖豆巴里、包家湾、下漆家。

金杨家族：辖金家山、杨家沟。

支巴失巴族：辖支巴里、失达里。

田巴芦族：辖田家河、巴芦里。

元古柏木族：辖元古堆、土城门。

拉林石崖族：辖乔马家山、官堡上下店、法轮寺、高石崖。

磨峡大马族：辖磨峡滩、第竺寺，大马河。

三砸驴房族：辖上中下三砸、香树崖、菜子沟、纳如寺、安藏沟。

南峪望子族：辖饶寿里、蒲家庄三处、王家庄、望子沟。

下衙寺沟族：辖下衙、寺沟、何阎家山、路西。

崆峒大湾族：辖大湾里、麻家川、阎家湾、叠家坪。

文何家族：辖文家山、北三十里铺、驹儿川、潘家坡。

小南半牛族：辖杨庄、半牛坡。

深沟高山族：辖赵家口、金家大庄、苏家庄、麻刺里。

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少数民族逐渐汉化了。但一些地名仍沿用当时的藏语，如会川镇的醋那、醋路沟、豆巴山、支巴等；田家河乡的巴芦、失达等；杨庄乡的下拉吉、汤尕、灯那、尕地窝等；祁家庙乡的贡巴、大寨子；峡城乡的拉扎湾、路住灯、洼扎等；麻家集镇的巴湾、毗达、麻塆、曹碾、孤独路、斑竹湾、拉嘎山、哈竹、亚路沟、夏拉查、宗丹、大石那等许多藏语地名沿用至今。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拉扎节是从民间传说故事之中形成的，它本身并不能真正解释拉扎节的起源问题，但它是民间群众心理状态的一种精神折射。

陈江风在《观念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岁时节庆的起源多与原始天文历法观念有关，而且在民间大多都传有动人的神话和传说，有趣的是，通过诸节庆的分析看出，那些传说神话往往并不是节庆的真正起源，相反，却多是后世附会的结果。”

正如陈江风考察岁时节庆所得出的结论一样，后来人们为了解释拉扎节所做的附会、编撰，本身并不能真正解释拉扎节的起源，但拉扎节本身并不在乎这种传说的真实与否，它只是要借助节庆实现某种文化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民间不仅乐于接受这

种不真实的节庆起源传说，有时甚至认为杜撰某种传说以养足文化功能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一特点，在注重教化、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国度里表现得格外充分。

二、拉扎节的存在现状

藏族信佛教，佛寺是他们的宗教中心，马藏寺、腰崖寺、五竹寺、圆明寺、兴国寺、贡巴寺、露巴寺、大草滩寺、金家寺、杨家寺、侯家寺、竺尼寺、纳定寺、元寺、塔尔寺、铁佛寺、高石崖、八戒沟寺、寺沟寺、船崖寺、门楼寺、凤岗寺、金刚寺等都是他们的遗留。特别是在麻家集一带还流传着“打西番婆（姜番鼓舞）”，“拉扎节”明显的保留着远古的藏族风俗。

拉扎节是一个地方性的节日，盛行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西南部地区的麻家集、田家河、峡城等乡镇，过“拉扎”的日期因村而异，各不相同，如麻家集镇从农历七月十八日卧龙杨家大庄村开始，到十月初一日袁家河最后一个“冻卷拉扎”结束，两个多月中每天以村庄为单位过一个“拉扎节”，尤以八月中秋和九月重阳最为隆重。

按古老习俗，过“拉扎节”时，由村庄上的“神头”募捐资金，杀猪宰羊，献牲跳神，大黄酒答报山神。户户要烧酒、蒸馒头、焚香点蜡，虔诚祭奠，请“司公”跳神，请善奶奶念嘛呢经。

过“拉扎节”这一天，各家各户，都邀请亲戚朋友吃“拉扎”，看跳神，欢度节日，“腊肉烧酒罐罐茶，包子油饼卷子花。”被邀请者身着盛装，背上“花炕子”“大馍馍”，提上青稞酒，一则送新麦面尝新，二则祝贺东家丰收。席间，互相敬酒谦让：“曲子不好酒不香，水酒一杯表心肠。”“香香香，实在香，亲手送来味更长，渗在心上永不忘。”

“吃拉扎”还有忌讳，端上的酒菜，无论怎样可口，都不能吃光喝尽，要有剩余，这象征吉庆有余。餐毕，宾主倾心攀谈，互问收成，交流生产经验。

为何不统一在一天过“拉扎节”呢？有两种说法：一是各地区都有差异，庄稼成熟有迟有早，因而过“拉扎”都是先川后山，逐村挪移；二是庄庄敬神、跳神，时间太集中了，“司公”应付不过来。因此，逐庄排完日期，好让“司公”“独吞”“十方”。结合实际情况考察，这两种原因恐怕是兼而有之吧。

十月初一的“拉扎节”是最后一个，名曰“冻卷拉扎”。也有个别地区在庄稼打碾完毕，收仓入库后，才过“拉扎节”。

过“拉扎节”还有一个规矩，既不空来，也不空回。亲戚们临走，东家还要给他们送些好食品带回去，让亲朋家里的每个人都品尝一口，以分享丰收的喜悦。

“八月十五一川，九月初九一山”在定西市西南部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考察其内容，实是指当地群众每年从七月十八开始至十月初一结束，在两个半月时间里，从川区到山区，每个村庄以自己传承下来的约定时间，过拉扎节的情形。其间，以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为拉扎节节期的村庄尤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历来为中国汉族人民所注重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和重阳节，在定西市西南部地区被拉扎节所替代，双节重合之后，人们首先选择了当地所重视的拉扎节。那么，那拉扎节对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而促使这一地区的人们主动放弃了传统节日而将全部精力投向拉扎节呢？

中秋节的起源，与古代秋祀、拜月习俗有关，而重阳习俗产生的初始之义，乃与被

禳、趋避的观念有关。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这些最初的信仰观念已趋于淡化,现在这些节日也只留下了其大概轮廓,成为现代紧张生活节奏下人们回家团圆的日子。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拉扎节因当地独特的山神信仰观念而形成,当地群众放弃了拜月等习俗而选择了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山神信仰,在这种习俗的发展演变下,逐渐成为独特的节庆民俗。即使现在,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宗教色彩依旧相当浓厚。节日期间的跳山神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在不断的延续着,它是一种在特定季节答谢山神的礼仪,即娱神又娱人,是当地民间信仰、生活习俗和生活风情的形象反映。

三、拉扎节的生存空间

综观拉扎节的报道与研究文章,学者们一致认为,“拉扎”是藏语“山神”的音译,拉扎节是“由于汉藏同胞长期杂居,互相交流、学习、濡染、通化,一同歌舞祭祀,融合而成。”因此,要考察拉扎节的形成原因,是不能脱离当地的文化生活环境的。

(一)拉扎节产生的生存空间。定西市西南部的渭源县地处陇西台地黄土高原西部及西秦岭地槽西端交汇地带,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气候多变。现位于南部地区的南屏山、侯家大山、鸡冠梁等,依然林木葱郁,其平均海拔在3300米左右,年降水量在600毫米左右。当地群众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自然崇拜观念在各民族中早已有之,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人们面对自然界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霜雪灾害等无能为力时,自然地将其盼望丰收的愿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神灵。因此,山神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之一。

在当地,每年在春播之后,各村村民基本上都是以村庄为单位,选择最高的山头请喇嘛“榨山除雹”。祈求山神保佑一年的丰收。这也是当地村民山神信仰观念的一种建构方式,他们通过这种榨山的仪式,将无形的观念转变成有形的形象,再通过祭祀仪式,成为保护一方的山神。等到秋季来临,庄家“拉扎”之后,他们又通过跳山神这种娱神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山神一年之中保佑平安的酬谢,同时也期待来年山神继续护佑,这是山神信仰的一种维系方式。通过这样一种构建与维系的模式,满足当地群众的精神需求,获得心理安慰。

(二)地方学者的解释。据《渭源县志·节日》《政协渭源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渭源民间故事精选》《渭源民俗》等史料书籍记载与赵光明、徐化民、杨世明、乔彩凤等民俗爱好者研究,拉扎节自宋以来,至明、清达到鼎盛时期。一方面,以前该地区气候凉,只种青稞、春小麦、豆类,庄稼收割之后,有了空闲的时间,并且丰收之后,有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以前村庄上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活动,农民也无其他娱乐事项,跳神属于一种大型的文化活动,遂吸引周边亲朋来此观看,亲朋到来以后,主家要接待,逐渐形成节日。但最初以跳山神为主,随着老人们崇拜山神的心理在年轻一代中的逐渐淡化,以及年轻人外出务工时间不济,再加上跳山神费用高等原因,现在逐渐出现跳山神活动趋于淡化,而盛行过拉扎节之风。

四、拉扎节背后的意义之网

每年春播之后的插山神,标志着山神与村名同在,同时,山神在村民的祭祀中,获得实惠。进而保佑一年之中的丰收。通过这种插山神的祭祀仪式,首先确认了村民与山神之间结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网的位置。等到秋收之后,通过拉扎节,这一(后转第38页)

说家

师 纶

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家人”一卦。明示“家人,利女贞”。彖(释词)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这个规定合乎男女体力、天性的特点,是科学的。“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这是说家中成员,各明其地位,各尽其责任。因此“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是说,定天下从正家始。“象”又说:“王假(至也)有家,交相爱也。”一个“爱”字概括了家中人员的核心关系。

家的重要性,先秦诸子多有论述。如管子说:“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所以家是最基本的。管子又说:“身者,治之本也。”因而“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必须讲究学习。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还规划了一个农耕社会中的家庭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是讲的生产经济条件,是物质基础。但这还不够,还必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即进行教育,形成尊老、敬老的和谐社会风气,才可以社会安,天下定。

孟子讲的是家庭初始阶段,为什么是八口之家,当是本之于《易》。《易》中规定:乾父、坤母、震长男、坎中男、艮少男、巽长女、离中女、兑少女。尔后必然是男婚女嫁,繁衍子孙,以至于出现三世以至多世同堂的现象。家,非但人口多了,而且加入了非血统关系的成员,情况就复杂了,如何和谐共处,除了生产经济条件跟上去之外,就是要大讲“孝弟”(即悌)二字。《论语·学而第一》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程子(颢)说:“孝弟为行仁之本,仁立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有了孝弟之爱,人间就会出现和谐奇迹。清朝徐锡龄、钱泳在《熙朝新语》中记:“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陆清献公陇其述云间王庆孙之言:崇明(今江苏省属)有吴老人年九十有九,妇九十有七,老人生四子,壮年家贫,鬻子以自给。四子尽为富家奴,及四子长,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妇,遂同居而共养父母焉。卜居于县治之西,列肆五间,伯开花米店,仲开布店,叔开腌腊铺,季开南北杂货铺。中一间为出入之所。四子奉养父母,曲尽孝道,始拟膳,每月轮一家,周而

【作者简介】

师 纶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荣誉馆员

复始。媳言三月始得奉养，太疏，改每天一家，媳言亦疏，乃以一餐为率，如早餐伯，午餐仲，晚餐叔，明早餐季，周而复始。逢五及十，则四子共设于中堂，父母南向坐，东则四子及诸孙，西则四媳及孙媳辈，分昭穆（即左右）坐定。以次称觞献寿。率以为常。老人饮食之所置一橱，橱中每家各置钱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毕，反手于橱中随意取钱一串，往市中作童子戏，橱中钱缺，其子潜补之，不令老人知也。数十年无异，老人夫妇至今无恙。长子年七十有七，余子皆斑白。孙曾二十余人。清献公作‘崇明老人说’。”

宋朝文莹《湘山野录》记：“伪吴故国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为之旌门闾，免征役。尤著者江州陈氏，乃唐元和中给事陈京之后，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雍睦。凡栲、椀架及男女授受通向婚葬，悉有规制。食必群坐广器。未成人者别一席。犬百余只，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则群犬不食。（按：犬犹如是，人丁当更有序有礼）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其家。”

这样的大家庭，尽管有教育有定制，但得和睦相处恐亦十分不易。宋朝孔平仲《续世说》中记：“唐张公艺，郢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奉泰山，亲幸其宅，问其义居所以久。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时至今日，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已不多见。还有，由于男婚女嫁，便产生了姻亲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更须容忍克己。历史上有唐人赵璘在其《因话录》中记述的两个著名的例子。一是唐代宗的女儿昇平公主下嫁于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夫妻二人吵架，郭暖说，你倚仗你父亲是天子吗，我父亲嫌弃天子不做，才轮到你家。（按：这可是犯上的反话）昇平公主回宫，向其父哭诉。代宗却说：“你不知道，确实是他父亲嫌天子不作，才轮到我家。”说着，“因泣下”（按：可见已触及其内心痛处），命令她还是回婆家去。郭子仪见儿子惹了祸，连忙捆绑着郭暖入朝请罪。代宗却安慰说：“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一场风波平息，郭子仪将郭暖杖打之后了事。此是京剧《打金枝》本事。另一个是平西王李晟（临潭人）的女儿嫁给了吏部官员崔枢。一天，李晟庆祝生日，在中堂设宴，出嫁的女儿也在座。有婢女两次前来对女儿耳语，女儿点头而已。李晟问有什么事，婢女说：“崔吏部昨夜有病，派了人前去探视。”李晟一听立即恼怒，摔了筷子，说：我不幸有此女，作出这样的怪事，你为人妇，哪里有丈夫生病，不去侍奉汤药，却给你父作生日的道理。我有这样的女儿，还作生日干什么。立即命她回去。他自己随即到了崔家去问候，检讨自己对女儿缺乏教训。“姻族闻之，无不愧叹，故李夫人妇德克备，治家整肃。勋臣之家特数西平王礼法。”此亦千年之前的陇上之光，剧作家是否谱为秦腔剧，以广流传。

如今盛行小家庭，兄弟分居各过，老人则共同奉养。分居之兄弟亲情犹在，绝大多数均能相互扶持照应。这就便于发挥各人才智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许多人离开原住地，走出创业。万众创业，万众创新，党的政策惠及城乡人民。居城者，大多有自己的房产。农村不仅取消了几千年来的农业税，且给耕种者以补贴。明令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且令加以保护。特别是实行亘古未有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精准扶贫，习总书记多次深入到贫困家庭中访问调查，人民全部脱贫指日可待。这就实现了孟子所说的“有恒产有恒心”。全民情况大不相同，值得大书特书。前者，著名学者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论小家庭之不可废云：“人类之道德，发源于亲子之爱，若废小家庭制，则婴儿初生即归公育，亲可不过问，而亲子之爱绝矣。父母老而公养，子可不过问，而亲子之爱又绝矣。天属之地，已绝爱源，而高谈博爱，恐人情日益浅薄，无以复其性也，儒家言道

德，必由亲亲，而扩充之为仁民爱物，此其概本大义，不容变革者也。小家庭既许存在，则极大限度之私有财产制亦当予以并有，为维持其小家庭生活之便利。则保留相当之私有权乃事势之必然也。”此论甚中肯綮，最为切要。而今不仅已完全实现，且鼓励人民发家致富，可谓弥天之喜！

礼义之邦的泱泱大国，讲家，必然要讲家训，“养不教，父之过，”这是任人皆知的，家家如此的。当然，也有不少见诸文字的家训，且举一例：清朝王士禛（新城人，别号渔洋山人，官至刑部尚书）在其《池北偶谈》中记：“先祖方伯公年九十，读书排纂不辍，虽盛夏衣冠危坐，未尝见其科跣，常揭一联于厅事云：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斋中联云：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癸巳岁自作祭文有云：不敢丧心，不求满意，能甘淡泊，能忍闲气，九十年来，于心无愧，可偕众同游，可笑而长逝。盖实录之。”又记：“高祖涑川公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汝勿行也，慎之而已。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汝勿友也，远之而已。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汝勿言也，诺之而已。”这是读书人家的家训，其中勤俭持家（或云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之类的格言，是农耕社会中最为流行的家训，即使未见诸文字之家，也大多是以之教训儿女的，对社会对国家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历史上著名的家训很多，如南北朝颜之推的专著《颜氏家训》，宋朝朱熹有《朱子家训》，近代曾国藩也有家训。广为流行的则是明末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民族英雄林则徐曾以楷书书其全文，成为学书者的范本。其中至今仍有不少内容可供借鉴者，兹摘录数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无求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谗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施恩勿念，受恩莫忘。

讲家，还要讲记载家族历史的家谱。我见过江苏丰县的《师氏族谱》，其中记载：山西太原师旷之后师名远夫妇，于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鹳窝出发，迁至江苏丰县欢口镇落户，至今繁衍至二十四代，人丁一万有余，“为徐丰之望族。”其《族谱》始修于清乾隆时，之后嘉庆、同治、民国重修三次。又于1985年、2003年重修、凡修六次。这当是比较完整的家谱了。我家原也有家谱，不幸毁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难。如今只知始祖为山西兴县人，于明永乐年间迁于河北徐水县。辈份排字为“人若恒其德，先传必克昌”我是昌字辈。参加革命时盛行改姓名，未能免俗，去掉了“昌”字。关于洪洞大槐树，民间广为流传。据记载，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明政府屡次从山西移民于北、豫、鲁、皖、苏、鄂、秦、陇等十余省，明政府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发放“凭照川资”。寺旁有大槐树，树上有老鹳窝，移民即在树下驻足，因而有“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流传。更有多人到大槐树下寻根问祖，洪洞县即定于每年4月1日到10日为“寻根问祖节”，办的有声有色。总之，不论迁东迁西，移南移北，华夏大地这块沃土，永远是中华民族休养生息之地。不管有什么惊涛骇浪，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我们永远在这。”有了家谱，可以得知家族之时代承传，“支

系分明,长幼有序。”而且得知先人事迹,接受遗教,是不可少的文化承传。如今盛行修撰家谱之风,也是盛世修志的表现。

一个家字,衍生出许多名词,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文字语言,也是礼仪之邦的一种体现。如不惮烦,且罗列如下:

已成历史的名词,如家士、家令、家丞、家老、家臣、家兵、家妓、家邑、家削、家根、家仆、家监、家生奴、家削(稍)、家督(长子)、家天下。

多解词,如:家人,易卦名、平民、仆人、一家人;家门,家族、乡里、门第、戏曲开场语;家公,子对人称其父、子孙称其祖父、家之主人公;家业,家产、家学;家生,家用杂物、武器的俗称、家中生产之事、旧称奴婢子女仍服务于主家者;家传,家中世代相传者、私家的传记、家家传述;家园,私人的田园、家乡;家私,家产、家中私事;家事,家务、用具(傢伙)、家产;家法,家长训饬子弟的法规、责打家人的器具;家室,夫妇、家属;家教,家中礼法或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请学者入家施教;家累,家中生活负担,旧时妻子儿女都仰赖于家主而生存之谓;家道,家庭经济状况、旧称治家之道;家数,学术或文艺上的流派,特指宋代“说话”的种类;家兄,对人自称其兄(对人称其长辈多加“家”,如家伯、家叔,称小于己之弟妹则称舍弟、小妹);家家,各家之总称,北宋时称嫡母曰家家;家庭,即家,亦称家门、堂前阶;家门,乡里、家族,旧称卿大夫之家;家传,家中所遗传先人事迹传示后人之文;大家,指众人、世族之家,古时亲近从官称天子为大家,宫中称太后、皇后为大家,对女子尊称大家(音姑)。又,以家为主词,前加字则成专用词,如作家、画家、商家、匠家、专家等。

专解词。家口、家小、家山、家长、家父、家母、家尊、家慈、家君、家姑、家言、家政、家珍、家书、家信、家约、家什、家风、家食、家乘、家问、家常、家眷、家属、家园、家业、家牒、家谱、家当、家语、家庙、家族、家范、家畜、家蚕、家鸭、家兔、家长制、家常便饭、家喻户晓、家庭教育、家徒四壁、家庭出身。

拉杂写来,恐多谬误不妥之处,亟望指正。

(前接第 34 页)固定的节庆时日,进行跳山神活动,为山神献上歌舞。逢年过节的献祭,答谢山神,并进而求山神给他们带来安宁与幸福。跳山神的仪式,使得村民与山神之间结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网进一步得到强化。

因此,拉扎节是村民与山神进行沟通的日子,人们借助跳山神仪式来增强山神的力量,使山神能更好地给村庄带来好运。在这里,实质上创造了一种融合的局面,它强调了村民与山神的相互义务。在拉扎节的背后是人们解释世界、理解生活的一套意义体系,这套意义体系透露出人们生活的艺术。

综上所述,拉扎节的形成是以当地的山神信仰观念为基础的,其实质是为酬谢山神而进行的一次“狂欢”。至于节期的不统一,正如学者们指出的:“当时,从事跳神的司公较少,即使现在,还是很少,再加上气候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先川后山的过渡形态,并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节日’。”

墨子的政治主张(上篇)

郝洪涛

墨子(前 480—前 390),姓墨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先秦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汉之后,相对沉寂,清末以来,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墨子弟子收集其语录等,编辑《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本文分上下两篇,就其政治主张进行探讨。学术界一般认为:墨子有十大政治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墨子》中各有专篇。笔者在此将天志、明鬼排在前面,把节用、节葬、非乐合并为一项,再列“法仪”“五谷”两项,亦为十大主张。现将上篇概述于后。

一、天志

墨子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

《天志上》简明而深刻地阐明了墨子的天志观。

“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上天对所有的地方都能明白地看到。人们要知道这一原理。

天的意志主要表现为:

“天欲义而恶不义。”“天之爱天下之百姓。”

“义”的重要性:“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对“义”的解释:“且夫义者政也(政,通“正”,即匡正的意思),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之为政于天子。”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者。

顺从天意,就会得到奖赏;违背天意,必受处罚。“故于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残害),必得罚。”并举例说:“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

【作者简介】

郝洪涛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

怎样才能顺从天意?“顺天意者,义政也(以义服人的政治)。”“反天意者,力政也(以力服人)。”义政就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掠夺)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

上天关爱天下百姓。“以其兼(不加区别)而明(成长)之。”“以其兼而有(包容)之。”“以其兼而食(养育)之焉。”“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杀害无辜者,天会降下灾祸。

天志是“兼相爱,交相利”的最高准则,是判断是非的试金石。“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钜。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

墨子的天志观是墨子的核心思想,是他的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他的其他主张皆来源于此。这是我把“天志”排在第一位的原因。

从哲学方面讲,天志观是唯心主义的,是有神论者。但其目的是把天作为“兼相爱、交相利”的象征。天有赏善惩恶的意志,天志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作者以此警告贵族统治者,不顺天意必受惩罚,必降灾祸,引导人们讲义,向善。天志有时也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

天志观广生于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这对当时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二、明鬼

《明鬼》,就是辨明鬼神的存在。

墨子认为:鬼神是存在的;鬼神能扬善惩恶。

《明鬼下》以史书记载的例证,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了这一问题。

墨子首先提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由于人们怀疑鬼神的有无、不了解鬼神能赏贤罚暴。“逮自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武力征讨)。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行政长官)之不强于听治,贱人(平民)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袭击)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都出现了)。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

由此提出考察鬼神有无的必要性。“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辨别),以为将不可不明察此者也。”

接着,墨子一连讲了史书上记载的几个故事。一是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三年后,已成鬼的杜伯在猎场以箭射死周宣王。二是秦穆公在宗庙遇见句芒神。神说:上帝赞赏你的道德,让我赐给你十九年寿命,使你的国家昌盛,子孙繁茂。三是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一年后燕简公坐车去祭祀,被已成鬼的庄子仪用木棒打倒在车上。四是宋文君时,掌管祭祀的观辜,祭祀时不恭敬不谨慎,被神灵附体的巫师打死在祭坛上。五是齐庄公的臣子王里国与中里微,打了三年官司不能定案。齐庄公让两人共牵一只羊到神社盟誓。把羊杀了,羊血洒在神社前。先读王里国誓辞,读完了。再读中里微誓辞,没读到一半,羊奋起而触之,案情大白。这五个故事,最后都有结论:“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墨子还从三代圣王修建祭坛、宗庙、神社、选择祝宗、祭品等论证:“古者圣王必以鬼为有,其务鬼神厚(隆重)矣。”

墨子还指出:《周书》《商书》《夏书》都有关于鬼神的记载。因此,“尝若(当若)鬼神之能赏贤如(而)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闲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要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此言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

《明鬼下》结论:“今天下之五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尊奉宣扬)也,圣王之道也。”

显然,“明鬼”与“天志”一样,是唯心主义的,是整顿社会秩序的信仰,体现了墨子改造社会的良苦用心。其目的:警告统治者要谨慎,多行不义必受惩罚;以信仰增强老百姓敢于反抗的勇气。这一观念的提出,着眼于人民的实际利益,着眼于其起到的实际作用。

尊天明鬼,这是墨子的理论基础。

其实,墨子的这一思想负面影响深远。至今有人相信、甚至迷信鬼神。

三、兼爱

兼爱,兼而爱之。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兼爱中》反复论证这一命题。

首先,墨子确定了做人做事的原则:“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接着,阐述了什么是天下之害及其产生的原因与恶果。“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强力争夺),人之与人之相贼(杀害);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睦,此则天下之害也。”“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睦。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控制)弱,富必侮贫,贵必敖(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墨子明确指出:“以兼相爱(互相关爱)、交相利(互相谋利)之法易之。”具体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结果“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睦。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

墨子认为,兼爱并不难。“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只不过君主不把它放在政事上,士大夫没有付诸行动罢了。

墨子以大禹治水,周文王、周武王治国为例,证明兼爱的可行性。最后得出结论:“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祸不断,人民深受其害。墨子提出“兼爱”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

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是有区别的。

儒家的仁爱,是有等级的、有差别的、局部的。墨子的兼爱,是平等的、是博爱、是大爱。

在阶级社会,兼爱只是一种理想。但这种理想是崇高的。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大地震,造成重大伤亡。天灾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鼎力相助,奉献爱心,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捐款捐物,通过各种方式表示慰问,生动地体现了人间大爱。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兼爱,总是人们的企盼、渴望、追求。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现代价值。对当代道德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爱的奉献》)

四、非攻

非攻,就是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

墨子极力主张非攻。

《非攻上》连续设喻、层层递进,由偷桃李、偷鸡犬、偷牛羊、杀人取物之不义,引出攻人国为更大的不义。严正指出“大为非攻国。”(攻打别国是大的过错)

《非攻中》揭露攻战之害。“今师徒唯毋兴起(现在假如军队出征),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上为“出”之误),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拔劫,往而靡弊臃(腐)冷(冷)不反(返)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饿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墨子感叹:“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年代久远的)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结尾引用古语警告统治者要汲取历史教训。“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

墨子反对攻伐,但并非反对一切战争。《非攻下》记载:当喜好攻伐的国君提出,“昔日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回答:“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他们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制止了混乱,使天下安宁。

墨子对“非攻”不仅反复论证,四处游说,而且亲自实践,身体力行。

《公输》记载了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公输盘为楚国制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闻讯后,“齐(疾)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楚国国都)。”先是与公输盘讲道理,指出攻宋“不可谓智”“不可谓仁”“不可谓忠”“不可谓强”“不可谓知类”(明理)。后是指楚王攻宋是以富窃贫。接着搞虚拟战争,“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木板)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抵挡)之。”当公输盘阴谋杀墨子时,墨子说:“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余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终于说:“吾请无攻宋矣。”这体现了墨子的大智大勇。当然,最后还是以实力说话。鲁迅以此题材写了历史小说《非攻》,塑造了一个大仁大义、奋力突践自己主张的伟大形象。小说语言幽默、生动、形象、意味隽永。

《鲁问》还记述了墨子止齐伐鲁、止鲁攻郑的故事,十分感人。

历史远去,非攻思想仍有现实主义。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浪潮滚滚向前。全世界人民热爱和平,期盼和平,珍惜和平。而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出兵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这是典型的攻伐,不义之举,必将遭到失败,自食其果!

五、尚贤

尚贤,崇尚、尊重贤人。不分贵贱,推荐、选拔、使用贤人。这是墨子关于用人的政治主张。

《尚贤上》作了具体论述。

墨子分析了国家贫困、人口减少、社会混乱的原因,“是在王公大人从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使用)能为政也。”所以当务之急“将在于众(聚集)贤而已”。

以什么办法众贤?墨子指出,贤良之士“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辅助)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古代圣王的原则是:“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这样就形成一种导向,“举义不辟(避)贫贱”,“举义不辟亲疏”,“举义不辟远近”,全国上下“皆竞为义”。

墨子总结了古代圣王的经验,“故古者圣王之政,列德(按德行排位)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工匠)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给予决断之权)。”“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定)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列举古代史实:尧提拔舜,“天下平”;禹提拔伯益,“九州成”;汤提拔伊尹,“其谋得”;文王提拔闳天和泰颠,“西土服”。由此引出结论:“得意(国家太平时),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下》提出“为贤之道。”即:“有力者疾(赶快)以助人,有财者勉(努力)以分人,有道者劝(勉励)以教人。”说明贤人不仅要有能力,还要有高尚品德。

墨子在《修身》中提出,要成为贤士,必须修身。修身的主要方法是:“潜慝(诬蔑与恶毒)之言,无入之耳;批扞(诽谤与攻击)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孩应为“刻”,伤害别人的刻薄之想),无存之心。”“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交往)。”“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言无务(追求)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华丽)而务为察(明确)。”

墨子在《亲士》中告诫国君,凡人才都有个性,要宽容、善待贤士。“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

墨子的尚贤思想,反对贵族专政,尊重人才,唯贤是举,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对后世有深刻影响。荀子在《君子》中提出,不能“以族论罪,以世举贤。”韩非《显学》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龚自珍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这对现代用人,也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阳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级作家

天下第一雄关

阳 颺

嘉峪关,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代的重要军事要塞。

嘉峪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西5千米处最狭窄的山谷中部,城关两侧的城墙横穿沙漠戈壁,北连黑山“悬壁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历史上被称为“河西咽喉”,因地势险要,建筑雄伟,亦有“河西第一隘口”之称。

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中国长城三大奇观可谓是东有山海关、中有镇北台、西有嘉峪关。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渤海之滨,南临大海,故称山海关,是明长城的东部起点。

嘉峪关比山海关早建九年,是现存长城最大的关隘,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关隘,是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也是明长城的西部终点。

明代所建的镇北台位于陕西省榆林城北4公里红山顶,镇北台呈方形,共4层,高30余米,属于万里长城防御体系之一的观察所,是明长城中部的要塞之一,依山据险,巍峨挺拔。

我曾站在镇北台上,东望山海关,西眺嘉峪关,感慨一朵朵云后面隐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呢?一群不知名的鸟从头顶掠过,倏忽之间飞远了,或许千里之外就奔作铁甲战骑了。

我去过山海关的孟姜女庙,忘不了庙前那副奇妙的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消。”此对联断句反反复复,重重叠叠,读法有多种,细细琢磨品味,妙趣无穷——抱歉,读对联让人一时忘记那位哭长城的苦命女子孟姜女了。

现今仍然通用的“解手”一词,就出自秦始皇修建长城时。为了防止劳役逃跑,押解者把他们串绑在一起,劳役们只有在被解开绑着手的绳子之后才能去大小便。由此可见修建长城劳役者们的艰辛和苦难。

我还去过山海关号称“万里长城第一城”的长城入海口老龙头。而嘉峪关往南的讨

赖河畔,则是谓之“天下第一墩”的烽火台。中国人喜欢把长城比喻为龙,那么从老龙头龙首到天下第一墩龙尾,万里长城这一条长龙,可谓是首尾呼应,大气磅礴。

站在嘉峪关关城上,面朝关外的古战场,空无一人的戈壁滩犹似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大片开阔地。一群野鸽子飞过天空,翅膀把天空越抬越高。

清同治十二年(1873),已经年老体迈的陕西直隶总督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途经嘉峪关,他率领着几十万出征的大军,抬着一副为自己准备的棺材,以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出了嘉峪关。之后,左宗棠平定新疆,保护了清朝门户,凯旋而归。面对雄伟壮观气势磅礴的嘉峪关,他挥笔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此匾额现还悬挂在嘉峪关城楼上。

说嘉峪关,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明朝开国大将军冯胜。

明洪武五年(1372),征虏大将军冯胜在收复河西走廊后,见此地为河西咽喉,于是提出了建关的建议。当年七月开始筹备兴建,于次年筑成一座周长220丈、高2丈余、宽厚丈余,有关无楼的土城。

冯胜是个难得的帅才,只是每逢胜仗就私匿战利品。朱元璋治军严厉,冯胜被多次罢免兵权,最终被赐死。

嘉峪关从最初建关到成为坚固的防御工程,经历了160多年的时间。明洪武五年(1372)首筑土城,至100多年之后的明弘治八年(1495),肃州兵各道李端澄修建了嘉峪关关楼。史书记载:“李端澄构大楼以壮观,望之四达。”嘉靖十八年(1539),尚书翟奎视察河西防务,认为这里须加强防务,又在关城上增修了敌楼、角楼等,并在关南和关北修筑了两翼长城和烽火台等。至此,一座建筑宏伟的关城巍然耸立在了高天阔地的大戈壁之上。

嘉峪关因修建于西麓的嘉峪山上而得名。这里地势险要,南面是白雪皑皑连绵不绝的祁连山,仿佛奔驰的白马群;北面是险峻峭拔的黑山,如同奔驰的黑马群。两山之间相距只有30里地,是河西走廊西部最狭窄的地方,被称作“河西第一隘口”,也是明代长城千余个关隘中最为雄险的一座。

如果我们稍稍转移一下视线,或许还会看见一匹正在奔驰的马,就是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驿使图”上的那匹马吗?骑在马上信使手举一竹筒信札,马身上看似随意的涂抹了几块土红色,这种土红色其它画像砖上也有,你看,那几个妇女的脸颊就涂抹了这种土红色;再看,那个农人端着的大托盘里的猪头也涂抹了土红色。我估计,这就是匈奴谓之: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胭脂色吧?

一匹有着胭脂色斑纹的马奔驰着,作为中国邮政标志的“驿使图”中的这匹马,和距嘉峪关并不太遥远的凉州出土的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那匹“马踏飞燕”铜奔马,都是吃焉支山下的草长大的吗?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我似乎看见,年轻的汉代大将军霍去病就是骑着一匹有着胭脂色斑纹的马,一次次击败匈奴的。

紧邻嘉峪关东南坡下,就是峪泉活水“九眼泉”,此泉终年不竭,可供人马饮用,并可灌溉良田。

亦如历史记载,嘉峪关“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长城筑而后关可守也。”

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险要的地理位置，是在这里建关的主要原因。因而早在汉代，就在距关城北7里地距离的石关峡口设有玉石障，依山凭险，设关防守。

嘉峪关由内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线构成重叠并守之势，壁垒森严，与长城连为一体，形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的军事防御体系。

嘉峪关罗城初建于明弘治八年(1495)，罗城是主城外面的护城，面对戈壁滩，是应敌的正面，“凸”字形城墙全部用砖包砌，非常坚固。罗城南北两端建有箭楼，两端与外城墙相接，外城墙又与关城南北的长城相联。

嘉峪关内城外筑有瓮城，让人自然而然想起一个成语“瓮中捉鳖”，这也是修建瓮城的目的。内城四角有角楼，也叫戍楼，形如碉堡，是守城士兵值勤放哨的地方。南北城墙建有敌楼，是放置兵器的地方。站在这里回望，光化楼、柔远楼及嘉峪关楼三座高大的建筑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这种过洞式城门及高台楼阁的建筑形式，是中国几千年建筑历史及建筑形式的延续发展。

嘉峪关东瓮城门额刻“朝宗”二字，表示过往朝廷官员虽远行，但仍不忘朝廷和君王；与此相对的西瓮城门额刻“会极”二字，意即从西域来的诸侯、商旅等从这里经过，向中原王朝纳贡。西瓮城不与内城门直通，使关城也成为了内城的一道防线。

柔远门为嘉峪关内城西门，意思是明王朝对关外边陲各游牧民族实行“怀柔”政策；光化门为嘉峪关内城东门，面向东方，表示旭日东升，瑞气普照大地。

光化楼为三层三檐歇山顶式结构，楼高17米。楼阁第一层为砖木结构，第二三层是木结构榫卯咬合而成，虽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及地震等自然灾害，仍然屹立于关城之上。

嘉峪关游击将军府也称游击衙门，初建于明隆庆年间，后来成为明清两代镇守嘉峪关的游击将军处理军机政务的场所。

文昌阁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清道光二年(1822)。楼阁为两层两檐歇山顶式建筑，底层两边为单间铺房，四周立红漆明柱18根，形成回廊。内为面宽三间、进深二间的官厅。四面装有花格门窗，上部绘制山水人物彩画80余幅。此阁在明清时为文人墨客相聚，吟诗作画的场所。到了清代末年成为文官办公的地方。

嘉峪关戏台是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修建，系当时守城官兵、城内居民及过往商旅的娱乐场所。其形制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古典戏台，由木制屏风把前后台分隔开，屏风上绘制了八幅人物图，是人们熟知的一个个飘逸洒脱的“八仙”，顶部为中国传统阴阳“八卦图”。前台正面屏风两侧的墙壁上绘有两幅画，内容是一个小和尚拿着铜镜，一个老和尚面带笑容，利用镜子反光的原理，正在偷看对面的一位妇女。可能是小和尚也想知道老和尚在看什么吧，却偏偏被老和尚按住了头，难以动弹；另一面墙壁上画的是一位袒胸露乳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非人非兽的怪胎。有说这组画表现的是和尚与妇女私通，佛祖降灾使其生了个怪胎。这解释合乎情理吗？

戏台两侧的对联倒是耐人寻味：“悲欢离合演往事；愚贤忠佞认当场”。

想想那些终日守关寂寞心生荒草的士卒，或者穿越戈壁沙漠长途跋涉疲惫的旅人，戏台上一串枣木梆子敲击的伴奏之后，紧接着就是平地起雷的唱腔，整个嘉峪关瓮城似乎都发出了嗡嗡的回声。让人想到《水浒》里的打虎英雄武松，一脚踏进小酒馆的武松一声吆喝，空酒坛子都发出了嗡嗡的回声，那又是何等的英雄啊。秦腔——这嗡嗡的回

声只能属于打了胜仗的人,有着渴望胜利所衍伸出来的声音,最终演变成了此刻秦腔的唱腔,也终于抚慰了那一个个孤寂的心灵。

关帝庙明末清初从内城迁到现在的地方。庙内原有大殿一座,陪殿两座,另有刀房、过厅、马房和牌楼。关帝庙曾多次扩建、重修。

红脸关公在上,青龙偃月刀已锈,日行千里的赤兔马安在?天下黑白事管也罢不管也罢,且趁夜黑月明,溜达到“九眼泉”边洗把脸,然后回来继续享受香火祭祀。

天下雄关碑在嘉峪关西门外百余米处。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肃镇总兵李廷臣视察嘉峪关防务时,见这里南有祁连雪山,北有黑山,嘉峪关壮观雄伟,便写下了“天下雄关”四个字,并勒石为碑。

背倚“天下雄关”石碑,风大啊,嘉峪关的风把那么多人全都吹成了沙。那么多人,在一粒粒沙尘中眯着眼睛往外看,那么多人,全是风沙的脸。

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国。祝愿那些早已经被风吹成了沙的人,从一粒沙中也能看见花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曾经开放过的花朵啊。我见过戈壁中的骆驼刺花,猩红的颜色,掺杂了遥远记忆的铁锈一样,颜色开放得让人不知所措,仿佛一句不明就里的谶语。

嘉峪关除了自身的防御作用,还依赖于有祁连山和黑河流域及其两岸巴丹吉林沙漠做屏障。那时候的交通工具无法绕行祁连山和黑河,嘉峪关成为中原和西域的唯一通道。

嘉峪关附近烽燧墩台的布防很严密。早年已有隋朝以及更早的汉朝的烽燧墩台。明朝又在嘉峪关内关外修筑了大量的烽燧墩台。

烽燧墩台是古代长城防御工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烽燧墩台的主要作用是举火报警,传递消息,以防备敌兵的骚扰和入侵,同时也为丝路上往来的使者、商队补充给养。

《史记·索隐》引《纂要》记载:“烽见敌则举,燧有难则焚;烽立昼,燧立夜。”《史记·正义》记载:“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烽,土橧也;燧,炬火也,皆山上安之,有寇则举之。”

每当遇到敌情时,夜间举火,白天放烟,所燃烟火远在三十里外都能看到,可以及时通报敌情。墩台内配有旗帜、鼓、弩、软梯、炮石、火药、火箭、狼粪、牛粪、柴草等,以备急需。

据传,当时筑长城所用的黄土,在经过筛选后,还要放在青石板上,在烈日下焙干或用火烤干,使土中的草籽不再发芽,才能用来夯筑长城。工程结束后,还要经过严格的验收。在距城墙一定的距离,用箭射墙,箭头碰墙落地说明坚固合格,如箭头射入夯土墙,就是不合格,要返工重筑。

史书所记载的长城“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墩”,指的就是烽燧墩台。每座烽燧墩台都派有戍卒把守。

大地涌起山脉,涌起长城。一个个孤零零的烽燧墩台,就像是一群群集成方队的古代将士,空空的肩膀上面是空空的天空。天空渴望鹰的飞翔,大地渴望植物的生长,诞生英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流血——渴望血的年代,英雄辈出。

看一个个烽燧墩台,在暮色下变成一堆堆熄了火的红炭,或者刚刚冶炼出炉的黄

金。我还设想,如果从天空高处俯瞰燃起篝火的烽燧,会不会像是我们人类的生日蜡烛一样美妙?如果真是这样,我所说的烽燧墩台将与刀枪剑戟无关,与流血无关——但对于那些战争中逝去的人,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的幽灵一定没有远去,他们不需要意义,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死亡本身不存在意义。

作为长城文化遗产“万里长城——嘉峪关”,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地名录》。

如果有机会坐汽车穿过嘉峪关戈壁,你也许就会看见空旷的戈壁滩上偶尔的骆驼和散落的羊只,像是一幅幅木刻插图,线条呆板且不乏遥远岁月的尘土气息。不知什么缘故,我感觉戈壁深处一定蹲伏着一只古代饕餮兽——创造这动物的时代一定是崇尚狰狞与荒诞美的时代,这家伙会把汽车当成肉饼一口吞掉吗?天上的白云白得虚假,空气被蒸发从而形成了人与物之间若近若远不真实的距离,巨大天空的倾斜——如果是一种生命意义的倾斜,将会使你感受到生命的虚无,或许只是一声轻轻的喟叹。

风大啊,多少重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不经意地被风吹散了。风把嘉峪关横着吹竖着吹,怎么吹都成调,就如同风把人吹成沙一样,这也是风向这个世界致敬的方式。

风如果不吹——风不可能不吹,如果没有风的喝彩,寂寞的历史又去哪儿寻找观众?那就让风使劲地吹吧,我是不是可以藏在一阕《八声甘州》的词牌里,静听风吹的平平仄仄呢?

嘉峪关一动不动,风中的嘉峪关和这个季节一样高。

假若我是一位誊写历史的书生,应该从哪儿写起——天空献出了丝绸,死者献出了磷,西风胡乱吹散,一把尘土两手灰烬。

是的,如果有太多的痛苦,就以痛苦的姿势站着;如果有太多的豪迈,就以豪迈的姿势站着,并且把痛苦和豪迈混淆成天空的空旷,嘉峪关长城就这样一直站着。

如果我是一位喜欢在风中回忆的诗人,我就继续在风中回忆。或者在嘉峪关长城的墙垛上磕开一瓶老酒——我是个见酒就醉的男人,如果醉了,我会不会说出这样的醉话:好铁去打刀,好男去流血。

此一刻,无云的天空只需要一片云朵,就可以增加大地的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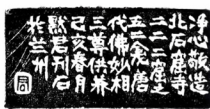
一块砖一块砖垒筑的嘉峪关,犹似一块骨头一块骨头构造的人体一样。风中的嘉峪关没有一块砖侧过身去——这是历史的嘉峪关和传说中的嘉峪关合而为一的真实的嘉峪关。

写嘉峪关,注定是一种对历史的追念及回忆。我知道,回忆是生命的延伸部分,大回忆需要大空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站在嘉峪关这块土地上,就会感受到地底下有一颗跳动的的心脏,正合着自己心脏的节拍,强烈跳动着……

钱墨君陇上石窟系列新作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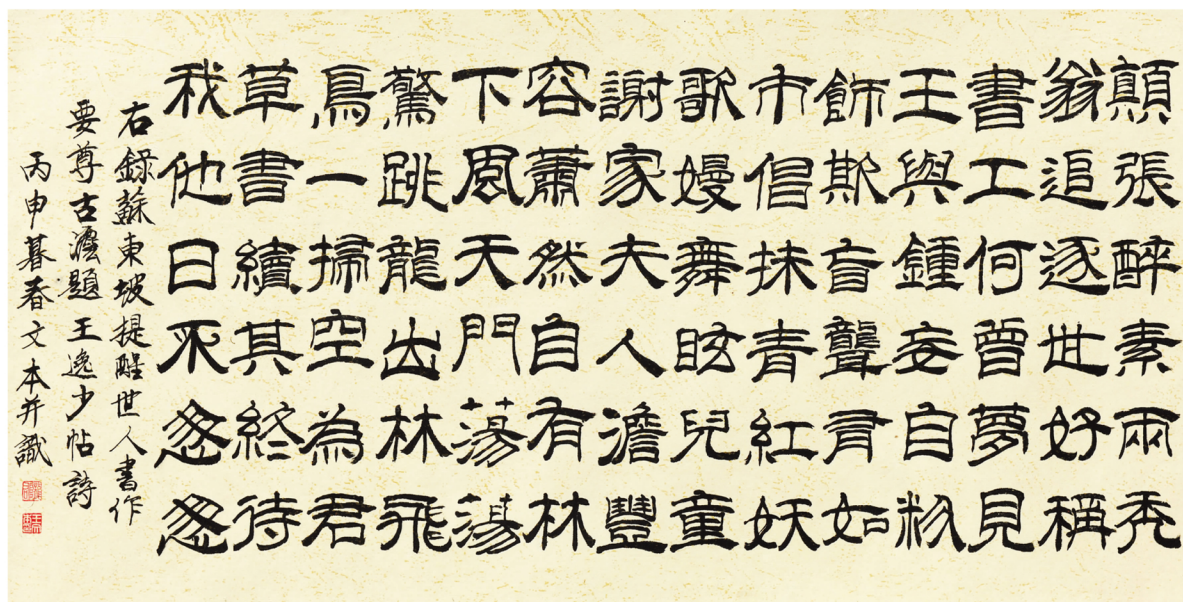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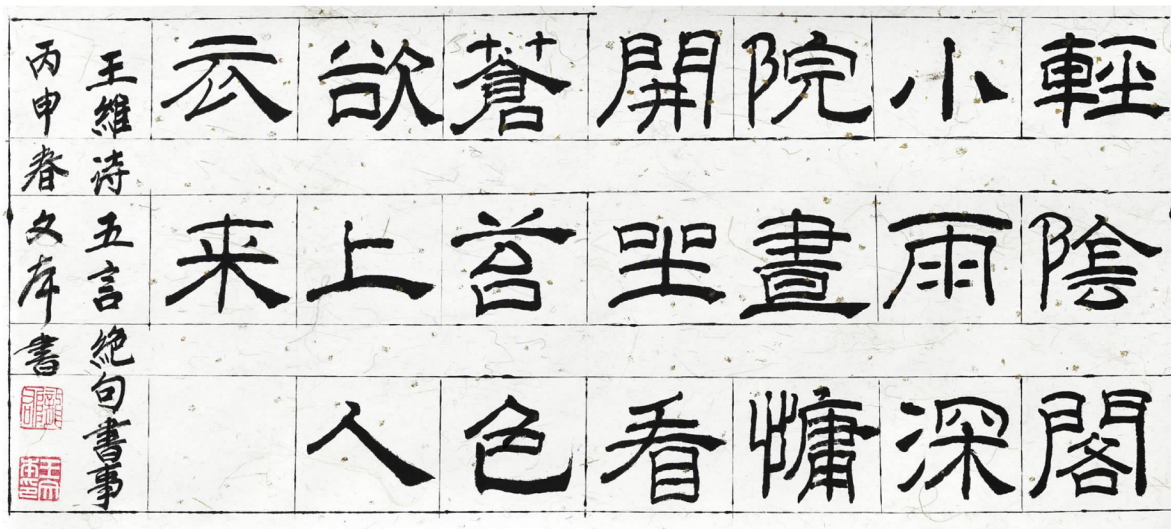
钱墨君，常用名默君，号群石、荷石居士，斋名荷石庐。1955年8月生，江苏无锡人。从师已故西泠印社社员、江苏著名书法篆刻家高石农先生。现为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中国书协会员，中国美协藏书票艺委会会员，甘肃兰山印社副社长。其篆刻作品追求古朴浑厚风貌，喜以甲骨、钟鼎文入印，尤擅图形印创作，作品采用汉代画像石与唐人线刻画相结合、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创作表现方法，以鲜明的艺术风格而享誉印坛。有《敦煌印集》《敦煌飞天百印》《敦煌艺术印谱》《敦煌图形印》《敦煌观音印集》《榆林窟图形印集》《甘肃石窟印谱》《张掖地区名胜印谱》《钱默君佛像图形印集》《华夏龙韵》《荷石庐印存》等出版问世，被业内人士称为“敦煌篆刻艺术”的创始人。作品多次入展第二届国际肖形印大展、全国藏书票艺术展、国际藏书票邀请展等展览，个人曾入选《篆刻》杂志推介的“中国篆刻艺术百家”和“中国肖形印”名家。《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书画报》《书法艺术》《篆刻》《中国篆刻》《中国艺术家》《当代美术》及台湾《印林》和香港《东方美术》等报刊对其创作均有评述介绍。



王文本书法作品欣赏

王文本，甘肃兰州市人。甘肃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甘肃省书法家协会第二届理事，甘肃省灯谜学会副会长，甘肃省绿化基金会生态书画院院长，兰州五泉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甘肃省省直机关工委书记画协会常务理事。

书法作品曾多次在省内外国书展展出并获奖，作品收入兰州书画长卷。1983年作品东渡日本展出，被日本东京恒文出版社收藏，书法作品入选“中国常德诗墙”，曾参加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与日本国中日友好会馆主办的“中日第九届自咏诗书画展”等大型展览，书法作品曾获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敦煌艺术奖”、甘肃省直机关书画展一等奖等奖励。多次为《甘肃画报》题写专栏刊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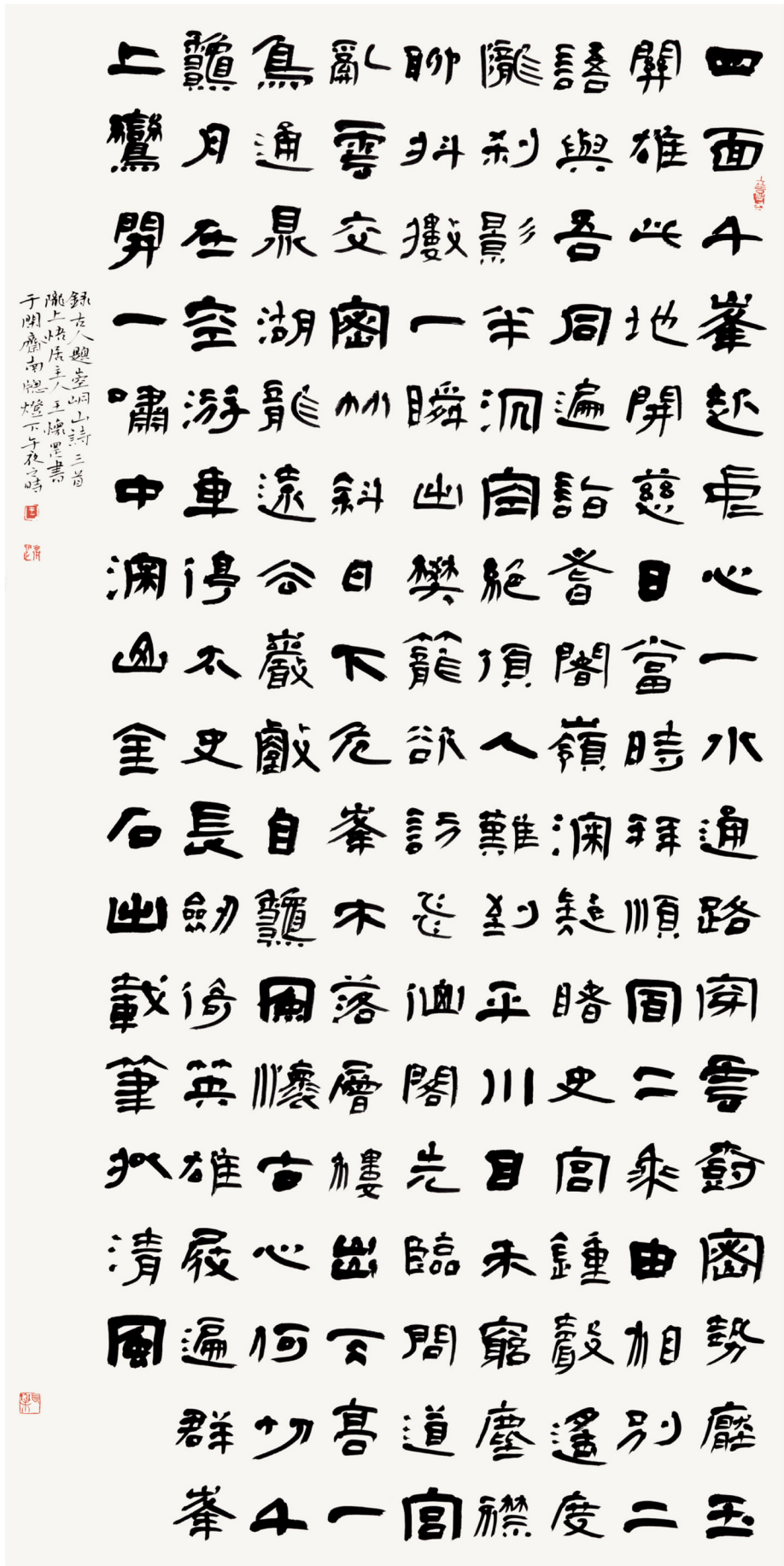
赵玉华国画作品欣赏

赵玉华，女，甘肃政府文史馆研究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曲艺家协会会员。



王怀罡书法作品欣赏

王怀罡，字子凤，别署悟居、闲斋，1960年生于甘肃静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甘肃省书协少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平凉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董其昌与南北宗论

张继刚

南北宗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明代末期,吴门画派衰落,松江画派兴起,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董其昌提出了“南北宗论”,影响了晚明及清早期的绘画。

董其昌是松江画派的领袖,他于书画创作鉴定以外,在画论领域亦有独树一帜的思考。画史上把董其昌的名字与“南北宗论”永远连在一起,正因如此,董其昌在画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极其重要。“南北宗论”涉及到中国绘画流派沿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体现出文人画在画史中的价值。南北宗论这个问题,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是莫是龙首先提出,莫氏《画说》中共有16条论述,其中就提到“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等观点。莫是龙与董其昌是挚交,同案挥毫,起居论道,探讨问题。就南北宗问题董其昌在莫是龙所论基础上继而深入阐述,陈继儒推波助澜,把这些关键点著述于天下。董其昌早年拜师莫是龙的父亲莫如忠,在莫家私塾就读结识了莫是龙,陈继儒是董其昌的知己,在绘画思想等诸多方面与董其昌一致,推崇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不足为奇。在晚明画坛中董其昌的名气影响力极大,南北宗论的提出必然会以他为代表。

谈北宗论问题,不能不谈莫是龙与陈继儒二人。莫是龙是明代杰出的书画大家,只因传世作品少,未被画史重视。莫是龙(1537-1587),字云卿,改字廷韩,号秋水,又号后明。明松江府华亭县人,家住东明桥堍,8岁读书,10岁能文,有“圣童”之称。其工诗画,善草书,喜散曲,精鉴赏,意气豪迈,不拘小节,一时名流,无敢抗席。其曾被召至金陵校书,与当时文苑名流结诗社并作画,屡试不第,以贡生终。

莫是龙应该说是“松江画派”创始人之一,他喜藏书,得其舅父常熟杨仪七桧山房万卷楼所藏,嗜弈。诗宗唐人,古文出入韩、柳,书法以钟、王及米芾为师,山水画学黄公望。传世作品《浅绛山水图》(现藏故宫博物院)、《长谷幽松图》(现藏松江博物馆)。书法作品有《草书五律诗》《行草七律诗》等(现藏上海博物馆)。著作有《石秀斋集》10卷、《画说》(1卷)、《笔尘》1卷及《廷韩遗稿》(16卷)。辑有《崇兰馆续帖》及散曲《南北宫词记》。莫是龙家学渊源出身仕宦之家,其父莫如忠,嘉靖戊戌(1538)进士,学问渊博。钱谦益称他“善

【作者简介】

张继刚

中国人民大学文献书画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草书,为诗尤工近体”。莫是龙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为其日后奠定了基础。董其昌25岁时,观莫是龙作画,“咄咄称赏”(《画禅室随笔》卷二题莫秋水画),他对莫氏父子都颇为赞赏:“始知公(即莫如忠)深于二王,其子云卿亦工书”(《评法书》)。他评价其师莫如忠“似正反奇,超俗即雅”,“人地高华,知希自贵,晋人以外一步不窥”。而对莫是龙的评价同样很高,“风流跌宕,俊爽多姿,酝酿诸家,匠心独妙”,“如五陵豪侠,宝剑金丸,意气自喜”,“游道既广,鉴赏之家无不遍历”。由此可见,莫是龙在书画方面对董其昌的影响不容置疑。

陈继儒(1558-1639),幼颖异,工诗文、书画,书法家法苏轼、米芾,书风萧散秀雅,擅墨梅、山水,画梅多册页小幅,自然随意,意态萧疏。其山水多水墨云山,笔墨湿润松秀,颇具情趣。论画倡导文人画,持南北宗论,重视画家的修养,赞同书画同源,嗜弈,为诸生。

陈继儒学识广博,诗文、书法、绘画均所擅长,并喜爱戏曲、小说。所藏碑石、法帖、古画甚丰。所著《幽窗小记》与明朝洪应明的《菜根谭》和清朝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一起并称“处世三大奇书”。

南北宗论观点与思想倾向

董其昌南北宗论的主要观点与倾向,有四个方面:一、山水画与佛家禅宗一样,从唐代起划分为“南北二宗”两个体系;二、南北之分,并非指地域的区别,而是以“南北二宗”的不同修行体验;三、南宗源自“顿悟”,北宗出于“渐积”;四、技法风面,南宗重渲淡,随意自如,圆柔疏散,充满“土气”,于“烟云供养”中享受安闲的天趣。北宗重勾斫,严谨方刚,刻画着意,画面呆板僵硬,气韵不足。南北宗论引用佛家禅宗南北派的“顿”“渐”之说,隐喻和解释山水画的风格、派别及创作观念等问题。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将中国山水画从唐代开始划分为南北两派,其主要思想是推崇水墨、浅绛山水画,贬低工笔青绿设色的山水画,推崇文人画家,贬低工匠和职业画家。在创作方法上,主张用类似于佛教禅宗的“顿悟”,反对北宗的“渐悟”。南北宗论在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为文人画发展建立了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

南北宗论对后世绘画及思想理论的建设,对晚明与清一代的山北画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清代山水画是对董其昌思想的一种回应。董其昌的艺术思想为清初画坛留下了宝贵的审美体系,其思想也迎合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康熙皇帝曾命人四处搜寻董氏墨迹,并极为珍视,这样就更加强了董其昌在明清画坛的地位。南北宗论到了清代,则将“南宗”演变成“正统”“正宗”,其代表人物是“清初六家”: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吴历、恽寿平,他们在画法理论上深受董其昌影响,在清代画坛上占有主流地位。

南北宗论的美学观点,尚率真、崇士气、喜平淡、重笔墨,推崇文人画,在很大的程度上促使画家提高了自身文化修养,并为许多画家指明了绘画的方向,这一点即使在当今画坛也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明末清初画坛在董其昌“亲南疏北”思想的影响下,“南宗”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的更加壮大,“北宗”发展的比较迟缓,这是董其昌为美术史带来的不利于各派绘画发展的因素。

在邓宝珊身边工作的日子

——王焕文先生访谈录

张正锋

王焕文，陕西榆林人，1922年11月出生，1938年起，担任邓宝珊将军勤务兵、卫士、副官等，1950年元月邓宝珊任甘肃省省长，王焕文调省政府办公厅，一直在邓身边工作至1968年。邓逝世后，王焕文被下派天水皂角公社、省红旗山五七干校学习调研和参加劳动。1983年从兰州商学院离休，1989年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16年元月在兰州病逝，享年94岁。

【作者简介】

张正锋
政协甘肃省委文化文史资
料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结识王焕文先生，曾两次前往家中看望、慰问。2014年春节前夕，我去王先生家中有过两个多小时的交流长谈。这天，王先生精神特别好，他拉着我的手，深情回顾了几十年的往事，时已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除了视力不好、行走困难外，头脑清醒、记忆力惊人。当谈到他在邓宝珊将军身边工作的日子，更是兴奋不已，如数家珍。我发现老人对亲历的事已深深扎在脑海中，就抓住机会提了几个问题。他侃侃而谈，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年是邓宝珊将军诞辰125周年，我根据谈话记录和王焕文先生子女王志芳、王志诚提供的部分资料，作了整理，以此缅怀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首任省长邓宝珊将军！

张正锋（以下简称张）：王老，您是怎么认识邓将军的？啥时候开始在他身边服务的？当时你主要做什么工作？

王焕文（以下简称王）：前些年我断断续续发表过一些回忆邓将军的文章。你今天问起来了，我就多说些情况。“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榆林当时是抗日前线。时任新一军军长的邓宝珊临危受命改任21军军团长，由甘肃开赴榆林抗日前线。邓的司令部设在榆林钟楼巷部队卫生院旧址里。我是榆林人，邓部正值用人之际，因此，1938年经我堂兄王增棋介绍引见给了邓宝珊将军。我当时16岁，邓见我老实，说话机灵，字写得不错，让我留下给他当勤务兵，主要负责他的生活起居等，后来又干卫士，主要是安全保卫方面的任务，有时也帮助抄写文稿，整理文件。时间不长担任副官，负责机要方面的事。

张：“您是老前辈，这么小就参加抗日了，而且为大司令服务，太不简单了。”

王：“当时日本人占领华北，形势很吃紧，大家都想绝不能让日本鬼子过黄河，跟着邓司令打鬼子，就是保卫家乡，其它没有多想。”

张：我也看了不少邓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史料，“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将军固守榆林，捍卫着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而且和我党领导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做了许多有益国家民族的事，这一过程您也亲历过，能具体谈谈吗？

王：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全面抗战爆发后，成立北路军，傅作义是总司令，邓任副总司令，邓后又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董其武任副总司令。又联合高双城、马占山等抗日武装共同打击日寇，保卫了大西北。1938年，邓和傅作义同中共高层干部南汉宸曾在山西河曲举行过一次抗战联席会议。两军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和傅作义的个人友谊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如在“十二战区”、“华北剿总”时，都是傅为正职，邓为副职。国共合作开始后，邓多次去延安，每次都在延安小住几天，有时住几十天，拜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出面接待过邓，交往颇深。这也是1949年傅作义请邓作为全权代表出面谈判，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原因。

张：邓将军在榆林住了多长时间？抗战期间和延安党中央以及八路军是如何相处、共同抗日的？

王：邓在榆林驻军有十年时间，司令部设在桃林山庄，这个山庄位于榆林城东南三四里路的金刚寺附近，叫山庄，实际上是上下两排窑洞，栽有几十棵桃树，请于右任先生题写了“桃林山庄”。住在城外，也有一个考虑，是防备日本飞机轰炸，相对安全些。在山庄，邓接待过毛主席等中央派来的重要客人，高岗、肖劲光、王震、南汉宸、杨拯民、刘文蔚等在此与邓共同协商抗日事宜。邓也多次去延安拜见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每次见面后都很高兴、轻松。邓和毛主席还有很多书信来往。其中有一封信是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刘绍庭当面交给邓的，信里除了表示问候的内容外，有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对邓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足见毛主席对邓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评价是很高的。

张：邓将军去延安时您陪同去了吗？还能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王：邓将军前后去过三次延安，其中有一次我影响深刻。那是1943年夏，我和邓骑马去的，邓的那匹马是从兰州调往榆林时带来的，叫大枣骝，个头高大，因额头上有块白，也叫白玉顶，我骑一匹小红马，带着十几个警卫随行。到达绥德时，徐向前将军在这里驻防，接待了我们，并陪同邓将军检阅了驻地的八路军。我印象八路军的服装不是太新，但帽子是一色的，队列很整齐、很威武。（我插话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经济封锁，八路军和边区条件艰苦，因此，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延安后，各方面接待很热情，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特别让我难忘的是，我近距离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党中央在延安大礼堂为邓将军开了欢迎会，毛主席和邓将军讲了话。在十多天时间里，毛主席和邓将军几次单独见面，讨论大事。毛主席也两次来交际处看望邓将军。后来，邓对我说：“毛先生真是伟人，他谈抗日的事把形势分析得很透，对国家以后的出路设想得很好，我很佩服。”在延安期间，因执行任务我认识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卫士，一起打篮球、比身手，成为了好朋友，当年担任朱总司令卫士长的李树槐后来一直和我有联系。（王沉思了一下）还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邓将军的二女儿邓友梅此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邓这次到访延安时，友梅正好在延安学习，毛主席每次请邓吃饭都叫了友梅陪同。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层特殊的关系，因为友梅的身份是保密的，这事若干年后才知道。邓在榆林驻防期间，友梅几次来看望父亲，经常和父亲单独交流，后来友梅不幸因病逝世，葬在金刚寺山上面，邓将军痛失爱女很伤心，很长时间不思饮食。我们身边工作人员都很难过、着急。

张：邓友梅很小年纪就秘密加入共产党，她思想进步，理想远大，一方面她传承了父

亲的优点,就是胸怀国家民族大义,另一方面她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进步思想,对她父亲也是有很大影响。

王:你说得对,我看是这样的。

张:王老,请您讲一下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事,据我了解邓宝珊将军对促成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北平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他是怎样为此努力的?

王:抗战胜利后,国人都希望两党共商民主建国大计,休养生息、恢复经济。但是重庆谈判后,蒋还是要坚持打内战。邓是坚决反对打内战的。1946年,蒋介石召傅作义、邓宝珊去重庆开会,会场上内战气氛很浓,邓开始保持沉默。后来让邓讲,邓说,八年抗战损失太大,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如再打,这个国家还怎么建设。为此,蒋单独几次召见邓做工作,邓不表态。最后一次召见时,邓说:“内战千万打不得,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很震怒,但又不好发作,转身离开。晚上邓到牛角沱于右任家说了这件事,于说:“你这样说话不要沙(人头)了。”又安慰邓说,我佩服你敢于直言。后来胡宗南进攻延安,命令邓出兵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因为邓不愿意打内战,就只派了一个团开到鱼河堡停下来,借口要补充装备按兵不动,应付了事。

张:蒋介石不顾国人的普遍反对,违背民意,发动全面内战,派重兵进犯延安,不得人心,没有得逞。这期间邓迫于压力,有没有和解放军发生磨擦,是不是很难处理这些关系?

王:毛主席和党中央很信任邓将军,邓也确实不愿再打内战,双方心照不宣。但蒋介石步步紧逼还得做样子给老蒋看,比如1947年,我已任副官兼译电员,邓命我去北平接女儿团子。我离开这段时间,解放军前后两次围打榆林,第二次打榆林时邓驻扎萨旗指挥,傅作义调宁夏部队出兵援榆,解放军撤围打援,在元大滩打了一仗。邓回到榆林后,宁夏派出的援军也到了榆林。1949年初,邓陪傅作义去西柏坡见毛主席时,就问毛主席“为什么打榆林连个招呼都不打?”毛主席说,“为了请你。”邓说,“有这样请法吗?”后来我们得知这出戏是演给南京看的。因为蒋介石不放心傅作义、邓宝珊,担心他们和中共私下搞名堂,派出不少特务监视他们的行动,解放军打榆林,围而不真打,也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我插话说,不搞出点动静,蒋介石更怀疑,就不好办了)。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入关,与华北野战军组成平津战役司令部,对北平、天津形成包围,平津战役开始。傅的司令部由京郊搬至中南海居仁堂,傅当时握有重兵迟迟下不了决心。解放军先攻打新保安,王牌35军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1948年12月28日,傅打电话说派飞机接邓去北平,当时邓在呼和浩特,傅派来的是“追云号”飞机,我陪邓乘坐飞机在临时机场天坛外坛降落,直接去了傅的司令部。傅面授机密,很快动起来了。邓接受任务后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邓对崔说,“傅将军有起义的心愿,但一下子下不了决心,希望转告上级,暂时不要攻城,我再做工作。”有一天晚上在傅的司令部,我进去后听到傅对邓说,“在南京会议上,蒋让我把部队开到江南去,许愿给我个最高军政长官当,所有江南部队由我指挥,我推辞了。”邓说,“蒋这个人靠不住,别信那一套。”

张:傅作义也在等待时机,邓的态度很坚决,促使傅最终下决心和谈。

王:傅知道邓和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就将和谈的重任托付给他,既是信任,又表明了诚意。1949年1月6日,解放军送来消息要求派出高级代表来谈,最迟1月14日前答复。1月13日邓带周北峰、刁可成和我四人以视察防务为由秘密出城,穿越两军前沿

阵地，骑马到清河镇，改乘吉普车经沙河到达通县骆庄平津前线司令部招待所，当晚我们会见了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参谋处长苏静。

张：谈判双方都啥人参加还记得吗？谈判是否顺利？

王：14日谈判开始，邓带的我们三人都参加了，解放军方面规格很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参加。邓代表傅作义先讲了几句话，说“内战打了几年死了不少人，这应由我负责，与我的部下没关系”。建议和平计划应包括平、津、唐、绥四地一块解决。聂荣臻说，“天津已下达总攻击令，就不包括在里头了。”邓据理力争希望宽限几天时间，最后达成协议，次日上午10时打不下天津就和平解决，结果15日凌晨天津就解放了。根据协议，决定驻北平部队开赴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对不服从命令者双方武力解决。但仍有一些分歧，如在时间问题上，林彪卡得很紧，要求提前，双方发生僵持，邓提议可将不同意见呈毛主席定夺。毛主席当晚回电说，“按邓先生意见办。”这样就产生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决定第二天，邓宝珊、刁可成和我陪同解放军代表苏静去见傅作义。周北峰留下负责联络。苏静将军时任四野的参谋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铁道兵副司令员。进城时，傅已安排一位姓王的团长接应我们通过封锁线，到达西直门。1月19日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决定1月22日10时停火开城。

张：邓先生了不起，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南京方面什么反应？

王：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但南京可能感觉到了什么，派出徐永昌来北京，企图阻止和谈，被傅、邓礼送回南京。傅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说，“接受和平起义，将领们愿留下的欢迎，不愿留下的礼送。”

1月22日上午实施停战，我们陪邓到达通县马家庄，参加联合办事处的工作，当时叶剑英任办事处主任。1月31日，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北平城内万人空巷欢庆北平解放。2月初，南京派了一个和平代表团，团长颜惠庆，成员有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由上海飞抵北京，主要谈与上海的通邮问题。这时，党中央来电，请傅、邓搭乘代表团的飞机一同去西柏坡，明确指示，不带随员。因此，我仅去了南苑机场送行。北平和平解放后，受党中央委派，傅作义、邓宝珊去绥远做工作，促成了绥远的和平解放。

张：“听了王老您的讲述，真是惊心动魄、艰难曲折，太不容易了。首先，邓先生协助傅作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保护了千年古都和几百万民众的安全，使大量文物古迹完整保存下来，这个贡献是巨大的，当载入史册。”王说，“为此当时北平的《新民报》发表文章，题目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称邓是一把钥匙，傅先生这个锁只有他可以打开。”我说，“王老您也功不可没，我们会记住您所所做的一切。”

王（捋捋胡子笑着说）：我是个副官，主要搞联络、收发机要、抄写文稿，不敢居功。不过，经历了这些事对我教育很大，终生受益。

张：王老，您再讲讲邓宝珊将军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的事。邓将军是新中国甘肃省首任省长，而且在任18年，对甘肃人民是有很大贡献的。请您谈谈印象深刻的事。

王：这我也是见证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年底政务院34次会议决定，邓宝珊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我记得是1950年1月3日周总理派飞机送邓去兰州的，我和王兆吉、沈求我等陪邓前往。五个小时后到达兰州东郊机场，张德生、王世泰迎接我们。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会场设在文化会堂（现在的省政府院内），宣布邓宝珊任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未列会）任副主席，我随邓到

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当时享受供给制。省政府成立后,省上随即安排民主建政工作,先召开全省农民代表会议和职工代表会议,后召开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些工作完成后,于1950年10月1日在兰州举行了甘肃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500多人,会议正式选举邓为省政府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为副主席。还选举产生了甘肃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由上面几位兼任主席、副主席。另外,还选出了省协商委员、人民委员、监委委员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省人民政府改为省人民委员会,主席改称省长。这次会议还选举邓为全国政协常委、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

张:省人民政府成立初期,巩固政权的任务肯定很重,王老记得主要抓了哪些工作吗?

王:当时,人民政权刚建立,事情很多,如剿匪、镇压反革命、土改等都是大事难事。比如,甘肃全境解放后,在一些地区还潜伏有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反动地方武装。邓主席经常和省委、省军区的领导开会研究,参与指挥剿匪工作,至1951年底,大股匪徒被歼灭,击毙、俘获、受降一万多人。再比如,农村土改,1950年下半年政务院安排下来,甘肃省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先在部分县乡抓试点,总结经验,稳步搞。记得1951年初,邓专门到永登和河西十几个县调研视察土改工作。回来后,大概八九月召开了省人代会二次会议,邓主席作了报告,主要讲土改,当年冬季在全省搞起来了,到1952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了土改任务。

邓省长很重视民族团结工作。甘肃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较早。建国初期,天祝、肃北、东乡、肃南、张家川、阿克塞先后成立自治县。邓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团结政策,认真落实民族区域自治。1953年10月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邓前往参加,和州长黄正清深入交谈,并会见了夏河县长黄祥和拉不楞寺嘉木样活佛(不到10岁)。当时甘南州政府在夏河,后迁黑措(合作镇)。1956年11月临夏回族自治州也成立了。邓很重视做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广泛结交团结他们。他五十年代初在兰州多次接待过十世班禅。

张:您说到民族团结工作,我再问一下,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防止日本人毁坏成吉思汗陵墓,是邓将军负责将其迁往兰州兴隆山的,这事您怎么看?

王:成吉思汗陵原在扎萨克旗伊金霍洛,距离榆林较近。因为日本侵略者想把成吉思汗灵柩掌握在他们手中,妄图削弱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意志,而蒙古族人民对成吉思汗很崇拜,敬若神明,保护好成陵,对争取各民族团结抗战很重要,因此报经同意后决定迁往大后方保护起来。邓将军和蒙古族上层人物都熟悉,曾任盟长的沙王、图王、达拉特旗康王、巴云英女王,西公旗司令郝游龙、乌审旗司令他都认识,也有过交往。经协商,达成一致,同意迁。移灵时举行了个仪式,盟旗主和王公参加送行。途径榆林、延安时沿途瞻仰的人很多,最后安全抵达兰州兴隆山。几年后邓回兰时还去祭奠过一次。(我说这件事办得好,符合汉、蒙等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我还想起一件事,1958年9月底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来甘肃调研,邓陪同去了阿克塞县、敦煌,我也去了。习仲勋一行从青海来到阿克塞,听取县委人委的工作汇报,重点谈了自治县成立后要落实民族政策、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搞好民族团结、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等。还现场研究了县城的搬迁建设问题。到敦煌时正赶上国庆九周年庆典,一起参加庆祝活

动。参观了莫高窟,常书鸿所长介绍了洞窟的保护情况。邓省长对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做了许多事。

张:我查阅了一些关于邓宝珊省长的资料,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很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后来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但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更可贵的是,敢讲真话,毫不保留发表不同意见。请谈谈您的感受。

王:“文革”前,邓宝珊一直担任甘肃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他艰苦朴素、作风扎实、深受干部群众的尊重。十几年时间里,全省他除了庆阳、宁县、玛曲等几个县外,其他市县都跑遍了。为了掌握实际情况,每年都安排大量的时间下去调研,视察指导工作。那时候,交通条件很差,有些地方车开不到,邓省长就手持拐棍,步行前往。见到基层的干部群众就问有啥困难,关心老百姓的吃、住、用等生活情况。他一直关心陇南的几个县修公路的事,五十年代后期,武都一文县一康县的公路修通了他亲自去参加通车典礼,解决了这里农副产品出不来、日用百货进不去的问题。在文县还专程看望了知名人士韩定山先生。修宝成铁路期间,他率慰问团去天水、徽县慰问筑路工人。我记得去时带了剧团和电影队,这些长期在野外施工的战士和工人看了演出非常高兴。另外,邓在镇反、土改、反右等多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针对后来发生的浮夸风,很看不惯,曾经抵制过,并保留自己的意见。有一次,在河西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群众吃榆树皮面和野菜饼,很难过,顶着压力,向中央领导如实反映了情况。1960年12月汪锋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问题得到纠正。

张:听说邓宝珊先生酷爱书法,也结识了不少艺术家,他的书法作品您有收藏吗?

王:邓是军人出身,但同时也是个文化人。他与书法大家齐白石、陈半丁、董寿平、李可染等都有深厚的交情,也收藏有他们的作品。邓先生早年在部队时,我就见他爱写毛笔字,买的帖子也不少,后来受这些大书法家的影响,字写得越来越好,邓园就陈列有他的字。他认识齐白石较早,私交很好,互相信赖,有一件事就能说明他们的关系不一般。北平解放前夕,不少人去了台湾。有人动员齐去台湾,齐因曾给国民党军政大员画过画,担心人民政府放不过他,犹豫不定,向邓讨主意,邓对齐说,我和共产党领导人接触很多,他们胸襟宽广,怎会容不下您,再说毛先生爱惜人才,也是你的湖南老乡,就放心留下来吧。后来齐白石成为了毛主席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邓每次去北京都看望齐白石,回兰州带几幅齐的作品。邓收藏的名人字画,都是人家精心创作的,他过意不去,多数都付了润笔费,有几幅是这几位名家赠送他的。我记得朱德、陈云、陈毅、贺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到兰州视察工作,去邓的家里看过这些藏品。我曾陪同邓去齐白石老先生家里几次,齐有时高兴了也给我画几幅小斗方,有螃蟹和虾、花草等,我自己保留的几幅齐白石、陈半丁等名家的字画可惜后来抄家烧掉了。邓收藏的作品中有两件文物后来让工作人员捐给了甘肃博物馆,有的在“文革”中毁掉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解放军五部征集我省反映红军长征巧夺腊子口的作品,邓安排范振绪和半瑛、郝进贤、马文江等画家创作,在邓园的大厅画了几个月,完成了一幅《更喜岷山千里雪》,由我负责去北京交给解放军五部,后来部队给范给了500元稿费。

邓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叶盛兰等也是朋友,在兰州先后接待过叶盛兰、杜近芳、谭福英、裘盛戎、尚小云、梅兰芳等大师,请他们品尝兰州小吃。此外,邓对地方戏也很感兴趣,如有昆曲、秦腔、晋剧、皮影、豫剧等演出都抽空去看。他尊重演员的(后转第92页)

文史笔记二则

柳 栋

【作者简介】

柳 栋

西部战区陆军第77集团军

之一：兰州“祥泰公”木厂为抢修、维修黄河铁桥无偿提供大量木材

今年是兰州黄河铁桥建成 110 周年。铁桥存世的百余年间，解放兰州战役抢修黄河铁桥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对这个事件相关文史资料作了记载，遗憾之处是只提到了抢修桥面所用木材的地点，而没有提到是何人所提供木材。本文就这个问题依史陈述，以补史之遗，丰富黄河铁桥的历史。

关于解放兰州战役抢修黄河铁桥和建国初期维修黄河铁桥的史实文字记载，主要文献有柴应龙《从事建筑五十年》（《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36 辑《陇原创业的人们》第 58~59 页）、隰可庄、高宪岗《抢修黄河铁桥的日日夜夜》（《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10 辑》第 84~87 页）、隰可庄《黄河铁桥抢修始末》（《兰州风采》第 171 页）、范凡《军民一心抢修黄河铁桥》（《兰州日报》2009 年 8 月 19 日）等相关文史资料。这 4 人中，有当时抢修黄河铁桥的 3 名主要亲历者，柴应龙为抢修桥面面板的负责人，隰可庄、高宪岗为军管会参谋，另一位范凡（范文辉）则是兰州军区研究第一野战军军史专家。

鉴于当时兰州工业不够发达，人们的关注点主要放在焊接补修钢桁架上了，而没有关注到木材的来源。但几篇文献共同提到了小西湖、骚泥泉附近私人木厂：“许纪生工程师去骚泥泉附近木场，挑选直径 40 厘米、长 5 米的大圆木运到桥头现场。”“修桥所需的主要物资是木材，大部是由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从小西湖、骚泥泉附近私人木厂征购原木供应的。”“从小西湖、骚泥泉附近的私人木厂源源不断地将圆木运来。”“其他材料及机械则由公路局及有关单位调用。”这些记载说明抢修黄河铁桥的木材均来自同一地方，唯一不足是没有交待是谁家提供的。但这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可靠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当事人对这件事的回忆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如：柴应龙讲，25 日夜，兰州中山桥火光冲天，连续爆炸。26 日凌晨，由北城墙下来了一批解放军，我领他们到国民党省政府内的望河楼上，插上了红旗，兰州宣告解放。隰可庄、高宪岗讲，26 日兰州解放的当天下午六点钟左右，军管会主任张宗逊同志（时任解放军第一野

战军副司令员兼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派隰可庄去观察了解黄河铁桥在战争中受损伤的情况。27日凌晨,军管会领导派隰可庄会同任震英同志(党的地下工作者,公开身份是建筑师)去找工人,天明后开始修桥。隰可庄、高宪岗还特别强调,有些情况已经印象不深了,但也有不少尚历历在目。因此,我们研究问题时,应坚持抓大放小的原则,关注事件的本质,而非在纠缠细枝末节上费白劲。

自2002年至今在调查整理家族在甘肃、兰州的历史过程中掌握了新的线索,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基本搞清了抢修、维修黄河铁桥桥面木材的来源,即我曾祖父柳鼎臣先生经营的“祥泰公”木厂所为。大体情况如下:

在解放兰州战役中,黄河铁桥是唯一跨越黄河的战略要点和交通要道,攻占黄河铁桥战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事人隰可庄于1949年8月26日当天由一野司令部到兰州军管会工作。下午6时许,军管会主任张宗逊叫他去查看黄河铁桥受损情况。当时的黄河铁桥第一、二孔上的桥面受损,原因是国民党军队两辆装载步兵弹药的汽车轮胎被打破、车上的弹药被击中而发生爆炸所致。隰参谋当即返回汇报了情况。兰州市军管会决定紧急组织抢修。

大约在27日凌晨,军管会领导派参谋隰可庄和建筑师任震英同志乘一辆吉普车去组织人员修桥。他们从中山林附近起,沿现在的白银路、旧大路至一只船的私营陆大铁厂(今兰州柴油机厂)找到厂主、工程师陆之顺时,天已大亮。折回桥时,桥南端两孔上的桥面已烧光,两辆汽车的残骸,歪踞在桥上。他们随即以桥南东侧的一个庙宇(现甘肃省军区招待所处)为场所,开始部署铁桥抢修工作。

因是战时状态,修桥是件大事,说干就干。据隰可庄、高宪岗回忆当时情形,没有成文的计划和预算,仅靠口头和电话对上级请示、汇报,和有关单位、部门、人员联系,没有盖一个公章,事情就办起来了。经过多半个晚上的奔波和联系,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来了,圆木也运来了。他们在庙宇门口一间屋内办公,后院便是木工场地。说是办公,实际上是昼夜接待两班倒的工程师们。当时修桥的工作有三项内容:第一是在现有条件下,维持最低限度的桥上交通。办法是在桥两边人行道搭上杉木杆,上面垫上沙袋,供行人和单个骡马通行。第二是木工们用镑头把圆木按要求规格劈成方木,铺桥面用。第三是桥东侧有一根斜拉钢带被炮火打断,得设法焊接。这座桥是20世纪初由德国人按走大轱辘车的荷重要求设计建造的,后来改行汽车,而汽车的自重、载重当时都已达到5吨,所以修复后的荷重能力是修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27日上午开始紧张抢修铁桥。修桥指挥部由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兼军事处处长李夫克(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领导。军管会派修桥指挥部的负责人先是隰可庄,后勤军需部的杨国斌同志专管后勤工作。10天左右隰可庄回军管会工作,由高宪岗接任,直到全部竣工。任震英以官方和工程技术人员双重身份自始至终主持修桥工作。柴应龙、陆之顺、陈卓尔和陆祖福出了大力。修桥的技术问题,由公路局总工程师孙发端负责。修桥所需的主要物资是木材,由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从小西湖骚泥泉街(今小西湖立交桥西侧至雷坛河以西一带)附近的私人木厂征集圆木供应的。当时派柴应龙的老友许纪生工程师去骚泥泉木厂,挑选直径40厘米、长5米的大圆木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桥铺设桥面的工地现场。全部修复工程中绝大部分是木工活,由柴应龙负责抢修桥面板,他建议将已找来的木器店的木工换成棺材铺会使用镑斧的木工,并带领木工们把大圆木加工成

30公分见方的方木,直接横铺在铁桥桁架上,用蚂蝗钉连成整体,其上再顺铺10公分厚的木板。其他材料及机械则由公路局及有关单位调用。同时,请来国民党辎汽某团的412厂厂长陈卓尔和焊工陆祖福等,研究补修钢桁架问题。至9月10日黄河铁桥抢修竣工。

当时抢修黄河铁桥很急,有的桥面木板经过车辆碾压,时间一长板与板之间缝隙加大,走路不小心脚就会插进去被卡住。因此建国初期(1954年大修之前),政府对黄河铁桥进行了加固,再次更换了部分桥面木板。

据张大千四子、甘肃省音乐家协会原主席张泉(本名张心玉)回忆,鉴于柳家对抢修黄河铁桥有功,且柳鼎臣的孙子柳含润长得酷似周恩来,被接收入伍到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战斗文工团(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前身),与他为同事。由于柳含润普通话很不标准,加上又吃不了苦,工作个把月就离开文工团,走上了建筑报国的道路,终身从事建筑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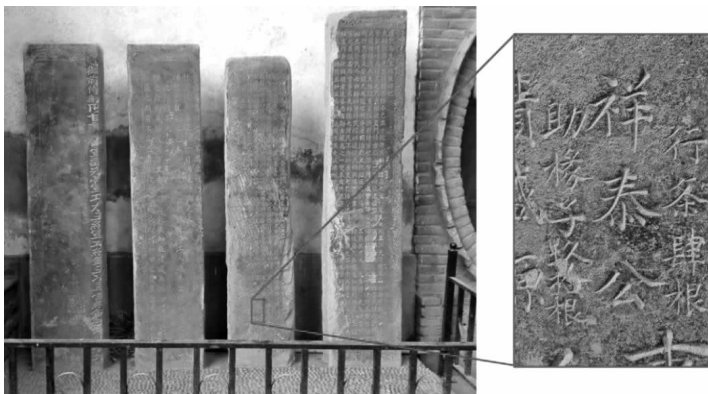
这两次抢修、维修黄河铁桥中无偿提供木材作出重要贡献的,是“陕西儒商”柳鼎臣经营的“祥泰公”木厂。上述有关事实,除文字记载外,笔者还采访了相关人员。2009年,我找到专门研究第一野战军军史的兰州军区退休干部范凡(范文辉)先生核证。他对抢修黄河铁桥“祥泰公”木厂无偿提供木材一事文字记载有印象。由于他刚搬新家,所涉及军方记载有关“祥泰公”木厂的资料一时找不到。兰州解放前的著名银匠、画家权新园先生曾亲口给公交公司退休职工田雨田先生讲过,解放兰州战役抢修和建国初期(1945年大修之前)维修黄河铁桥所用木材,就是从“祥泰公”木厂拉的,是柳家无偿捐助的。因为当时周边最近的木厂就是“祥泰公”,附近再没有别的木厂。这个事实,可填补目前关于抢修、维修黄河铁桥所用的木材是从哪儿来和是谁提供的史实空白。田先生与我是忘年之交,他与兰州老画家权新园、书法家沈年润先生因学习书画而关系密切,曾为权老编辑出版了《权新园画集》。权新园对老兰州的事是一本账,人称“兰州的活字典”。

兰州“祥泰公”木厂,始自乾隆末年的一个木材店,名为“祥泰店”,至道光中期成为小型木厂且为李家所有,到光绪年间逐步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大木厂,定名为“祥泰公”木厂。光绪年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期,资方(东家或董事长)为李子宏(陕西富平人),劳方(大掌柜或总经理)为曾祖父柳兆甲(字鼎臣,陕西韩城人,以字行)。曾祖父因光绪三十年(1904)帮李家房太夫人打赢“安泰堂”药店产权官司,被调“祥泰公”木厂任大掌柜,实际主政木厂工作半个世纪。鼎盛时期,柳鼎臣先后在临夏、临洮(西门外)、卓尼、连城、冶力关、迭部、黑措(合作)、靖远等地开办分厂(号),设立庄码(即办事处),形成了采购、伐木、放渡、中转、销售一条龙服务,仅兰州的总号就发展到五个厂区,占地一百多亩,成为当时兰州木材行的翘楚。同时,家族拥有“惠芳堂”四合院(位于官升巷41号,今大众巷)、“柳合山堂”四合院(今西藏驻兰办事处)以及“德兴顺”金店(今张掖路人民饭店处)和“三益兴”金店(绸布街,今省政府中央广场西侧)等资产,成为当时“山陕儒商”在金城传奇商史的见证和缩影。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祥泰公”木厂与其他木厂一起转隶为“甘肃省木材总公司”。

目前,作为见证“祥泰公”木厂商史的曾祖父百年四合院“柳合山堂”,被保留在兰州市七里河区五星坪后街21号,为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西泠印社执行社长、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刘江、欧阳中石和甘肃省委宣传部原部长连辑分别为大院题写了堂号和院

【图解】

文化宫碧血碑游廊东侧保存的四块残碑第三块刻记“祥泰公”字号及捐助数量。



匾。

具有补充史料价值的还有一件史事，就是“祥泰公”木厂曾在光绪年间（1904年至1907年）给兰州卧桥最后一次重修捐助木材。现金天观碧血碑游廊东侧保存的四块残碑之一，刻有“祥

泰公”字号及捐助数量。这就是曾祖父光绪三十年（1904）帮李家房太夫人打赢“安泰堂”产权官司被调任“祥泰公”木厂任大掌柜主政木厂之初所办。这个史实，可补充完善有关文史资料。

之二：西泠兰苑两相牵——拜访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先生记

虽已是深秋之际，但秋日里的杭州依然自有一番风韵，如同兰州的春夏之景，美不胜收。不同的是季节，永恒的是风景，印证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千古之誉。

2018年11月5日，在南宋故都杭州建城880年之际，享誉中外的著名篆刻家、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艺术馆在南宋御街一座800多平方米的清代古建筑院落隆重开馆，以93岁的老艺术家名字命名的这一艺术馆为千年古街平添了一道文化新景。做为一个与刘江先生有缘相识并来往的晚辈，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先生曾为曾祖父柳鼎臣的私宅“柳合山堂”题写堂名，为表达柳氏后人对先生的谢意和敬重，我特意定制了铜奔马和洮砚这两样富有甘肃地域特色的艺术品以贺开馆。其中洮砚底由甘肃青年才俊张大愚分别镌刻了刘江社长所题“柳合山堂”堂名和我所撰铭文，其铭文如下：

丙申春月，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先生为吾柳氏家族百年老宅“柳合山堂”题名。戊戌杪秋，欣闻刘江艺术馆在杭城隆重开馆，特以洮砚贺之，胞姐涵玉赋诗记之。

底是三生石上缘，西泠兰苑两相牵。

平湖秋月长河远，泼墨乾坤写大千。

柳栋识于古金城，竹盦刻石

这是刘江艺术馆接受的首批个人捐赠的艺术品。之后我相约拜访了刘江社长和夫人章培筠画家。

我自年少学习篆刻起，就很关注时任西泠印社副社长刘江先生的作品和著作，之后对他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数次为西泠印社捐赠作品等义举十分仰慕。在我心中，刘社长是西泠印社在新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为西泠印社在当代的发展殚精竭虑，对印社在新时期的发展有中兴之功，是真正的“西泠传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西泠印迹”。

我与刘江社长正式结缘于2016年春季。刘江社长曾在西北军区某部服役，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因而对部队和部队工作的同志非常有感情。这也是我们结缘的重要因素。

我家祖屋百年“柳合山堂”现为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系曾祖父柳鼎臣及其子柳舜如父子在兰州的私宅之一，为当今兰州市区保存完整、残存不多的清代古建筑之

一。请刘江社长题写堂名是我的夙愿。由于军旅情结和老单位的缘故,一经牵线,刘江社长便爽快答应了。当时,我让友人带给刘社长书信、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柳舜如书画集》和我的作品集(清样)请教。刘社长看后很认可并现场通了电话,他肯定我写得、刻得都很好。欣然为“柳合山堂”题写堂名,同时为我题写《柳栋作品集(展)》,勉励我出书时用“集”,办展时用“展”。刘社长这两幅题字尺幅较大,用笔一丝不苟,庄重大气,是难得的精品之作,充分体现了先生敬重文物和勉励后学之情。

此后,我们之间数度书信联系。2016年8月,我回赠刘社长一枚由“猫王”之称的兰州微刻葫芦名家牛宝珍所刻的《耄耋富贵》微刻鸡蛋葫芦,画面由假山、牡丹、5只猫、3只蝴蝶构成。2018年6月,又送刘江夫人一枚由王亨华微刻《莲池观音》。刘社长和夫人收到这两枚葫芦后非常高兴和喜欢。在“柳合山堂”建成110周年之际,柳氏家族专门订制数把紫砂纪念壶,上刻刘社长篆书“柳合山堂”和先祖柳舜如楷书“柳合山堂”,回赠刘江先生一把作留念。

鉴于刘江先生的艺术成就和对西泠印社的历史功绩,为更好地梳理和研究刘江的书法篆刻艺术和书学印学理论,弘扬刘江德艺双馨的艺术精神,2017年浙江省成立了浙江省刘江艺术研究会,之后又建立了刘江艺术馆。

2018年11月7日上午10点,经刘社长之子、中国美院副教授刘丹相约,我来到烟雨西湖之畔嘉禾园小区拜访刘江社长和夫人工笔画家章培筠先生。二老朴实无华,风采照人,一看就是人们心目醉心于艺术天地的大家。在客厅落座后,我首先打开手机让二老看了我捐赠给刘江艺术馆的“花开富贵”洮砚和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工艺品照片。章老师以工笔画为最,在中国美院中国画系上学时受教于潘天寿、谢稚柳和陈佩秋等大师,终身禅心素绘,作品清新脱俗,直追宋元工笔花鸟高古之气,因不求闻达于躁世,故对其名气有所影响。她看后带着欣慰的笑容说:“之前刘丹已让我们看过照片,知道这件事,很有意义。这个砚雕刻的很精细,很美。”显然章老师从工笔画家的角度对洮砚高浮雕牡丹给予了肯定。“这个马的造型很活泼、很有气势!”刘社长对“马踏飞燕”做了评价。

鉴于二老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开馆当天他们并未亲自去艺术馆现场。我告诉他们:

“这两个艺术纪念品已在社长的艺术馆陈列了。”刘社长欣喜地说:“那是好!很有纪念意义!”随即社长主动提出:“我来看看你的印和字吧!”我明显地能感受到他对印章和书法的钟爱。

三年前,刘社长已从作品集清



【图解】

作者与刘江先生交流

样看过我的字和印,尚有印象。我先从手机中调出 27 岁所刻自用名章。刘社长仔细看后点头说:“这个刻得好!得汉印精髓,很规矩很庄重,线条准确。很不错。”因长期对印章和书法所好之故,刘社长虽是 93 岁高龄,但对这方面非常敏感,一提到字和印,马上就来精神,折射出他对艺术的挚爱之情。他对印和字的图片看得很认真、很准,眼睛一点也不花,边看边议:这笔、这个字、这个地方写得到位……特别是对我所写“甘肃公路博物馆”馆名(行草)、“金天观”、“柳鼎臣故居”(楷书)、“黄河母亲雕塑”(隶书)等匾额作品和文物保护碑名,他先是一幅幅放大看整体,再缩小看细节,反复对比,边看边点头,随口说写得不错、很好。他尤其肯定了我行草书写的“龙凤书院”匾,说“这四个字写得很活,有精气神,很有味道,内容和形式都有了。”

之后,我又让刘社长看了他所题“柳合山堂”堂名已被悬挂的照片和被广泛应用在紫砂壶、铜刻等标识上的相关照片。刘社长十分满意,兴致甚浓,专门强调对我说:“以往和今天的照片,都要给我留一份。特别是我和我题字的照片,不然人们看了不知道是谁写的。”我点头应诺,心想老人家还真是有心。

刘先生和夫人毕竟年事已高,时下非重要活动和事项一概谢绝。转眼间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可我感觉过的好快,真想多呆一会儿以聆听先生的教诲,但又不忍打扰过长,只好告辞。刘社长保持着传统文人的礼节,在夫人的搀扶下握手送我到门口,招手注目送客远。

我衷心祝愿刘社长和章老师健康长寿!这既是当面的礼节性客套话,也是心底为西泠、为文化的衷心祝愿和祈福!从刘江社长家中出来,漫步在碧波清影的西子湖畔,我与友人交流,感慨万千,像先生和夫人这样的文化人,才算是真正的文化人,真正搞艺术的大家,风范自溢,不由不令人敬佩。难怪西泠印社社长空缺后就有人评论:刘社长又谦让了。我想,刘社长看重的是怎样把西泠精神传承发扬光大,给西泠能做多少实事,而非俗人眼中的虚名也!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江社长是“西泠印社”在当代最好的传承者,真乃西泠之幸,更是中国艺术之幸。孤山之上的百年西泠印社与刘江社长家由西湖之水相连共处为邻,两者的生命与精神一同共存,赓续着西泠基因,光大着西泠精神。湛蓝的天空之下,西湖之水清漫荡漾,恰似在讲述刘江先生与西泠先贤、与西泠印社的故事……

(后接第 89 页)的哲学观、道德观、科学观、心理学观、政治观。尤其是作者的比较研究,很见功力:同中国同类文献的比较,同日本、印度、埃及、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等东方其他国家有关政治著作的比较,同欧洲、重点是法国和英格兰相关著作的比较。第二部分是翻译和注释,其针对西方读者的注释最见功力。此书以后还多次重印。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哈林·克里夫兰(Harlan Cleveland)在他 1971 年完成出版的著作《未来的行政首脑》(THE FUTURE EXECUTIVE)中就认为《人物志》是人类早期关于如何察访和管理人民的代表性著作。

这本《人物志》,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个别字据他本作了校改。全书由伏俊琰译为现代汉语,英文由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罗应换教授翻译,其中阮逸的《序》由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赵登明教授翻译。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全福教授多所指导。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关于建设祁连山高寒冷水鱼养殖带 发展冷水鱼产业的建议

张克复 何延忠

高寒冷水鲑鳟鱼,原产于北冰洋深海及高寒冷水中。我省较早起步利用祁连山冰川高寒冷水过水养殖。经过多年努力,养殖区域化布局初具规模。2008年9月在兰州召开的全国渔业大会,将甘肃祁连山高寒冷水鱼定为中国三大渔业之一(原有海水、淡水)。高寒冷水鲑鳟鱼因其体内富含大量DHA和EPA,具有独特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我省具有丰富的祁连山高寒冷水资源,因此在我省大力发展高寒冷水鲑鳟鱼产业具有广阔的前景。同时,因高寒冷水鱼产业是最能节粮、节地、节能、节约资源的节水生态循环产业,对发展甘肃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良河西生态、改善甘肃人民饮食结构等,均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简介】

张克复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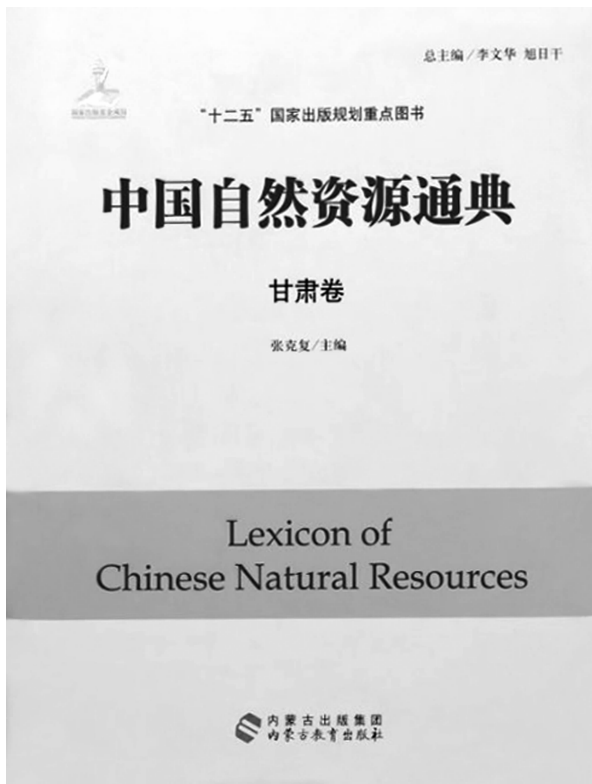
何延忠

兰州祁连冰川冷水鱼研究所

一、开发祁连山高寒冷水鱼产业的重要性

1. 开发高寒冷水鱼产业,是修复和建设祁连山流域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甘肃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节水农业,修复和建设生态环境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由于过度开发水土资源,致使植被干枯,湿地萎缩,天然植被锐减,土地沙漠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影响祁连山流域的生态恢复和发展,所以保护生态环境是甘肃发展的重要任务。因为冷水鱼养殖节水、节地,不同于遍地开挖式的种植业破坏植被;一过性的流水养殖,基本不消耗水资源;部分农民已转向冷水鱼养殖,可以减少耕地、种植业用水;鱼池区也会形成湿地。

2. 发展高寒冷水鱼产业,有利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恢复和保护河西走廊的生态,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节水,节水的根本途径是改变生产方式,即大力发展节水高效农业。所以必须找准“节水高效农业”的产业,在不破坏水土资源的前提下,让老百姓增收致富。利用祁连山高寒冷水资源,发展鲑鳟鱼产业,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提高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据调查数据显示:(1)按一般农产品亩产值2000多元计算作比较,农民养



【图解】

《中国自然资源通典》书影

殖冷水鱼亩产 8000 ~ 15000 公斤,每公斤 50 元,取中间数按 1 万公斤计算,产值可达 50 万元,相当于农产品的 200 多倍,每亩净收入可达 25 ~ 30 万元以上。(2)传统农作物每亩约耗水 600 ~ 800 吨,而鲢鳙鱼养殖为过水式流水养殖(永登县散养户还采取从水渠两头用网隔离的方式流水养殖),不消耗水资源。水资源还可继续循环利用,属典型的高效节水型产业。(3)祁连山冷水流量达 80 亿立方,加上 20 万亩水库的底排水,冷水资源可达 180 亿立方,而现今甘肃省高寒流水式养殖场只有 220 多家,冷水资源利用率还不到 1%。因此,极有必要合理

高效地利用祁连山冷水资源,大力发展冷水鱼养殖业,可保护和修复建设流域生态环境,增加就业人员,实现农民增收,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3. 发展高寒冷水鱼产业,有利于满足市场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与生存质量的要求愈来愈强,健康长寿是人们的企求与愿望。高寒冷水鱼含有人体大脑必需的 DHA 和 EPA 营养成份,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青睐。过去,富含 DHA 和 EPA 的深海鱼类主要依托海洋深水捕获,但由于海洋的过度捕捞使鱼类资源大幅下降,人们对鲢鳙深海冷水鱼的需要,将逐步转移到高寒冷水人工养殖场,发展鲢鳙等冷水鱼养殖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另外,鲢鳙鱼类对水质有非常高的要求,略有污染即无法生存。从食品安全角度讲,鲢鳙鱼生长的高寒流水环境,有害细菌也不能生存,所以鲢鳙鱼体无任何污染,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食品。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水中人参”。爱斯基摩人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其长寿的秘诀已被科学家破解,即长期食用冷水鱼、摄取大量 DHA、EPA 的结果。鲢鳙鱼还能预防心血管疾病,并能抵抗糖尿病等慢性病。大力发展鲢鳙鱼产品,有助于改善甘肃人民的饮食结构,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4. 发展高寒冷水鱼产业,能带动相关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增加就业,促进甘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省目前已发展冷水鱼养殖场 220 多家,形成了初步的产业格局。据测算:如果利用祁连冷水的十分之一,即可实现养殖年 60 万吨,年可增加产值 300 亿元。同时将带动当地种植业、饲料加工业等相关产业发展,例如鱼饲料业的发展。据有关化验结果表明:玉米秸秆含有 30% 以上的碳水化合物、2% ~ 4% 的蛋白质和 0.5% ~ 1% 的脂肪,可利用玉米桔杆、稻杆、青草、树叶、剩余食物等等,经过发酵养殖面包虫、黄粉虫鱼饲料,还可带动蚕豆、黄豆、胡萝卜等种植区的规模生产。同时,随着鱼食品深加工的发展,必然需用各类特殊包装进入市场,从而带动包装业、运输业、食品加工业,附加值

更高,从而增加农民长期稳定就业,促进甘肃经济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

二、开发祁连山高寒冷水鱼产业的可行性与有利条件

1.祁连山冷水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冷水鱼的独特优势。鲢鳙鱼属世界名贵冷水鱼类,主要养殖品种有虹鳟、金鳟、银鲑、大西洋鲑等。鲢鳙鱼适宜生长在水质洁净、无污染的高寒冷水环境里,对水质、水温、溶氧等要求极为严格,被人们称为测试水质的“生物指示剂”。依据我省祁连山丰富的高寒冷水资源,结合鲢鳙鱼的生物特性,利用祁连山高寒冷水养殖冷水鱼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祁连山冷水鱼实施流水养殖,无污染源,比其他淡水鱼产量高(鲤鱼亩产 1500 公斤,2010 年甘肃省冷水鱼平均亩产 9000 公斤,有的养殖场亩产达到 30000 公斤,是鲤鱼的 6~20 倍),经济效益好(鲤鱼 8.0 元/公斤,冷水鱼 38 元/公斤)。根据调查资料显示:我省河西祁连山脉长 900~1000 公里,海拔多在 3000 米以上,山脉流域共有冰川 3066 条,总面积 2062.72 平方公里,是典型的高原冰川,冰川储量 1320 亿立方。冰川冰雪融化形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56 条内陆河流,年径流量 72.6 亿立方米。西起阿克塞,东至榆中,沿山各县区都有冷水资源,为高寒冷水鱼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我省一批冷水鱼养殖企业的发展,为加快祁连山高寒冷水鱼养殖提供了成功经验。目前,甘肃已有一批高寒冷水鱼养殖企业。特别是碧泊产业公司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科研、培育、养殖、加工为一体的高寒冷水鱼企业,先后承担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星火计划,取得科技成果七项,被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科技部定为“祁连冰川高寒冷水鱼基地”、“良种基地”、“特派员专家团队”、“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被省政府确定为“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甘肃省鲢鳙渔业龙头”、“扶贫开发龙头企业”、“农业标准化示范区”。2013 年,碧泊公司敦煌高寒冷水鱼养殖基地“敦煌飞天生态产业科技园”,被确定为“甘肃省荒漠化治理沙产业可持续发展敦煌示范区”,被国家科技部定为“国家级可持续发展试验区敦煌示范基地”,特别是投巨资治理风沙水害修筑的“沙漠都江堰”生态科技工程,被国内外院士专家称赞为“治沙治水奇迹,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从而为我国内陆河流域及世界荒漠化治理探索出了一条科学有效的路子和成功模式,在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和内陆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及干旱地区水资源的增加及综合治理方面,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与示范意义。“沙漠都江堰”项目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技术负责人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碧泊产业公司多年艰辛努力,探索出了虹鳟鱼养殖产业模式,为发展祁连山高寒冷水鱼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拥有与上海合作的祁连山高寒冷水鱼研究所、永登养殖加工基地、敦煌飞天生态产业科技园(沙漠高寒冷水鱼基地),并已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22000 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碧泊产业公司开发出祁连山冷水资源的可利用价值,探索出从养殖、深加工到生物提取 DHA、EPA 及物流贸易一个新的生态经济产业,推动了整个鲢鳙鱼产业的发展;研发出 45 个品种的营养食品,被评为中国食品工业“科技进步——优秀新产品”,荣获东盟国际博览会“科技成果优秀奖”,被甘肃省科技厅授予“科技创新”特等奖,公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具备鱼苗培养、养殖技术培训、产品加工等条件,为大力发展祁连山高寒冷水鱼养殖提供了成功

经验。

三、发展祁连山高寒冷水鱼产业的几条建议

建设祁连山高寒冷水鱼养殖带,大力发展冷水鱼产业,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养殖 5000 亩,年产量 5 万吨,产值 25 亿元,约需投资 5 亿元;第二步发展养殖 1 万亩,年产量 10 万吨,产值 50 亿元,约需投资 10 亿元;第三步实现养殖 6 万亩,年产量 60 万吨,产值 300 多亿元,约需投资 60 亿元;争取用 10~15 年左右的时间,把我省建设成全国最大的高寒冷水鱼基地,冷水鱼产量占全国鱼产量的三分之一。

1.由省委、省政府牵头成立祁连山高寒冷水鱼产业领导小组。由省政府有关领导挂帅,成立甘肃省祁连山高寒冷水鱼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设在省农业农村厅,以加强对高寒冷水鱼产业的统一组织领导。领导小组职责主要是制定高寒冷水鱼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政策,统筹协调。高寒冷水鱼产业规划应包括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定位、发展步骤、相关配套的政策和法规等。

2.抓紧做好祁连山高寒冷水鱼产业可行性研究和项目申报。尽快组织相关人员,进一步调查论证,做好祁连山高寒冷水鱼产业可研和项目申报工作,争取列入国家重点扶持建设项目。

3.召开专门会议统一布署,层层落实养殖计划。召开由祁连山沿山市、县、区参加的专门会议,进行动员布署,要求各市、县、区调查冷水资源,规划养殖场地,采取切实措施,落实养殖计划。号召并鼓励私营企业和农户投资开办养殖场,同时做好各项配套服务工作。

4.大力扶持祁连山高寒冷水鱼产业龙头企业发展。要使高寒冷水鱼走向国内外大市场,加大力度培育和发展具有较强带动力的龙头企业是当务之急。同时,加快建设和重点扶持冷水鱼良种繁育基地、冷水鱼养殖示范基地、冷水鱼深加工基地、冷水鱼饲料加工基地和市场网络及培训中心,为大规模养殖、工业化生产奠定基础。同时,加强院校、科研单位与企业的科技合作,进行深度加工,提高高寒冷水鱼的附加值,扩大高寒冷水鱼的市场占有率。通过政府主导、企业自主、市场运作的方式和政策倾斜、财政扶持、信贷支持等措施,将高寒冷水鱼产业发展和龙头企业的发展相结合,形成产业促龙头、龙头带产业的模式。

以上建议如有不妥,请批评。

(后接第 85 页) 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写作缘起,约略有如上述。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有些篇章曾单独发表过,有些则是首次面世,此次结集出版,一并呈献给读者。至于各篇之间在材料使用上的某些重复之处,为照顾文义,有些也未能完全删除,敬请读者谅解。

光阴荏苒。再过四个月又是先师姜亮夫先生诞辰的纪念日了。重读先生给我的十余封书信,回忆先生对我的教导与关爱,感激与欣慰之情与日俱增。权以此书纪念先生诞辰 117 周年。

最后,我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李强先生,在此书的出版中他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杨立强和他的画(二)

——从“长安”到“陇南”

沈 奇 杨立强

(接上期)沈:关于“长安二蔡”的话题,今天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当然以后必然还会不断地回到这个话题上来。陕西和甘肃同属于“西部”,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梳理西部精神与西部美学的问题,你的艺术历程,以及这一历程与广义“长安画派”的关系,都是将来要重点梳理的。

换个话题。我来这之前,做了一点功课,翻阅了一些有关你的资料,发现你确实是一个有奇缘的艺术家,不但能在“文革”那样艰险的时局里,得机缘凑巧入门“蔡家”学画,后来回到甘肃又遇到高尔泰先生,成为知己之交。我们知道,高尔泰是在当代中国有重要影响的美学家、画家和作家,也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虽然后来去了国外,但与国内的学术性往来还一直保持着,前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30万字的随笔集,半年后便再版3次。我也仔细拜读了此书,感觉不错。作为美学家,高尔泰有一个很有名的理念“美是自由的象征”。你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往中,这一理念对你艺术创作实践的实际性作用何在?或者仅仅是精神性的开启与提升?

杨:我与高尔泰认识也确实算是机缘凑巧。

1983年我从西安回到甘肃,被借调到当时的甘肃省美术创作组画画,随身带了几张在陇南成县老家画的写生,在兰州碰到高先生,看了那几张写生画后,高先生表扬了几句,算是认识了。高先生那时在兰州大学教书,平时也画画,画油画,有时也让我看看他的作品,互相评说。那时正搞反对自由化运动,高尔泰也受到冲击,很苦闷,思想压力很大,刚好和我熟了,平时聊得也投机,谈到对当代画家的一些看法,包括对当时新发现的四川陈子庄先生的评价,互相都有同感,所以就常往我这里跑。他视我为知己,我从内心理解他,却爱莫能助,唯一能做的就是荒凉的夜晚陪着内心焦虑的他在兰州的街道上走来走去,直到我们都走不动为止。

记得有一天下暴雨,晚上9点多了,他借了别人的高腰雨鞋冒雨来找我,进门时鞋里已经全灌满了水,他还不好意思脱。我和我爱人好说歹说劝他脱下来,倒掉水拿到电

【作者简介】

沈 奇

西安财经学院教授
中国作协会员

杨立强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
甘肃省美协名誉主席

【图解】

杨立强国画



炉子上烘烤。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聊到半夜3点多,谈到黄胄、徐悲鸿,我那时年轻气盛,说他们的画还有些夹生,高先生很认同。

总之,那几年我们算得上是知己之交,理论上对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审美意识的形成和确认。我读过他的著作《论美》,他认为“美是自由的象征”,“美学就是人学”。我不一定能全部理解他美学观点的深层含义,但我喜欢他的这些美学观点。他的一些说法当年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开启。不过

理论性的认知和实际创作常常并不一定就同步而行,理论提高的是理性认识,实际创作还得靠自己慢慢摸索和扎扎实实地下功夫才是。

沈:说到具体创作,我看了你一些画册上的作品,发现尽管一直是自学出身,拜师也拜的是传统中国画画家,但依然可以见到中西两源的双重影响,将中国传统水墨的“写画”和西方传统中的“绘画”有益结合并行,有所谓“新美术”的遗风,包括对题材的一些取向,也和纯粹走传统路子的画家不一样。

所以我读你的画,总觉得所谓“笔墨当随时代新”这一理念,对你的创作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我说的是心理机制方面的影响,潜意识中的影响。西部美术由于长期处于较边缘状态,画家们为了跟上时代,以求与主流合拍,很容易受此类“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理念影响,似乎是一个难以避免的普遍现象。当然,总体上来看,你和那些一味追风逐浪刻意求新的潮流性画家有根本性的区别,是一种“守常求变”的理路,不失传统的根骨,有自己的底气和稳健的步程。

杨:这可能还是和我的学画经历有关。

一般人都知道我是跟“蔡家”学画出身的,其实在此之前,1964年我初中毕业时,想报考美院附中,就下决心画过一段素描和速写,有过一段比较扎实的西画功底的锻炼过程,后来虽然专攻国画,但平日对其他画种也还是在心在意,并借鉴学习着。

至于“笔墨当随时代新”,以及题材问题,确实,我们西部文艺界,可能与这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体制的引导有关吧,一些画家和艺术家们习惯性的,有时甚至太过于重视所谓“西部题材”,搞一些标志性的作品,以为这就是西部了,其实很肤浅,我很早就认为这不合适,并一直避免走这样的路子。说白了,这是“贴标签”的做法,缺乏主体性的真情实感在里面。身处西部,我也常常去采风写生,但只是为了熟悉一下物象的基本结构,同时以此练眼、练手、练脑子,而非去刻意挖掘什么新题材,表现什么新生活。

其实就我自己而言,关键是我几十年来的艺术道路,都是一直为我自己画画的,不是应什么外在的需要去画画的。出于心,归于心,就此而已。几十年中我也跑过不少名山大川、人文胜地,但很少专意去画这一类具体的题材,原因是情感对于物象的灌注是

很复杂的事,你必须对那个地方熟悉,培养感情,包括对土地和人的理解。没有情感,山水就没有精神,当然就缺乏鲜活的力量。

记得当年尊师蔡先生说过,只要好好画画,画中有自己的心性和面貌,不在于非得去画什么。这一点我一直耿耿在心。

沈:“为自己画画”,这个说法我很是感佩,在当下的时代语境里,可谓稀世之声,十分难得。

现在看来,你确实有很多和西部流行的画家不一样的地方。一方面很少去屈就什么主潮时尚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因此形成无所不画的“全能画家”,山水人物,花卉蔬果,翎毛走兽,无不涉猎。这种“全能”其实有利有弊,我们以后另作讨论。这里还是先回到前面我冒昧指认“笔墨当随时代新”和题材取向对你的影响问题,原因是,我在读到你于北京展览中重点推出的“陇南”系列画作,发现与你日常创作有较大的改变:一是集中于一个明确的地域性题材;二是笔墨与色彩感觉有新的探求。但就我个人的狭隘见解来说,这一新的探求确实想法很好,思路很好,所成作品的图式和气息也非常新颖鲜活,颇为亮眼悦意,但在具体笔墨关系上,似乎与传统笔墨属性和特质有些偏移,值得商榷。

杨:我们第一次见面认识,却能如此坦诚对话,很是惬意。

这批赴北京展览的主打作品“陇南”写意山水系列,确实是我的新探索,我努力尝试去画故乡的土地,画不同时节的土地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和色彩的律动,这和传统的山水格调以及时下流行的山水画都有所不同,我也比较看重,还出版了几本专门的画集。

先说题材吧,在这块故土家园生活了一辈子,给我的情感和我付与的情感都太深了,我想总得对此有个交代吧。同时从审美的角度而言,这块地方,这里的山水田园,也确实特殊,一直想有个集中的表现,或许还可以就此开辟一条独属于我自己的新路子、新格局。离象取神,有神有韵,我一直努力想画出我心里和梦中的陇南,画出其中的内在美。画贵创意,出于表达心性的需要,意在先,技巧不过是手段,是得鱼忘筌的“筌”,我想画到童真,画到没有技巧,这就是“美是自由的象征”吧,所谓借笔墨去散步。当然,要做到有笔有墨,纯任自然,是需要“控制”的,要如黄宾虹所说,做到“墨不碍色,色不碍墨。处处虚灵,非关涂泽”。反过来说,能“控制”,必然是在学问、见识、绘事的专业训练等方面长期修养才能做到的。

现在看来,无论是在北京展出期间,还是画集出版后各方面的反应,确实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以为我“简单”了,有的甚至批评我没有了传统的皴法,等等。其实不是“没有了”,是我在探索中的主动“舍弃”,是减法,希望以少总多,大家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对此,我是有些定力的,急于让人理解,等于媚俗。陈老莲每年年终,要展览他平日所积的画作,邀请人观看,如果有许多人夸赞一件作品好,他就会即时撕去。他以为人所共见的好作品,当算不得极品。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和古人自比,没有这个意思,也绝不敢自负,我只是说有人可能对相对“新”的东西不会一下适应,这很正常,此外,我也每每感到在创作中自己可能想到了十分,但表现出来的不过八九分而已,这个话我也不只一次对古马说过。艺术常常是一种缺憾,用一个外国诗人的诗句表达,就是“半完成的天空”。这里还是想先听听你的具体意见。

沈:具体意见还谈不上,我就想到哪说哪。

这批画题材不是问题。沈从文将小小的边地湘西写成世界的“湘西”,成为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地标”式的经典之作,你的“陇南山水”若坚持画下去,画成当代中国西部美术的“地标”之作,又有何不可?

我想说的是笔墨的问题,包括这批画中那些大块的、鲜明跳跃的色彩,如前面所提出的,如何将中国传统水墨的“写画”和西方传统中的“绘画”有益结合并行,如何在创新中不失偏颇,恐怕在后面接续的创作中需要再深入探究。

单从宏观理论而言,中国画自宋元以后,基本上可用“广义的文人画”和“广义的书法”概言之,是一种文化的综合体,主要的作用是心灵、心性、心气,而不是如西方那样主要作用于视觉与观念。传统中国笔墨同中国汉字一样,具有不可穷尽的随机性、随意性、随心性和随缘性——字与字“胡碰乱撞”,常常就可能“撞”出诗意“碰”出隐喻来,不依赖于理性认识与把握及逻辑结构的链接。

故汉语天生是诗的语言,由此生成的汉语诗性,更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属性。而文化乃书画之母,诗性乃书画之魂,以汉语诗性为“筑基”的汉字书法和水墨画,正是有了与之相生相济的诗性文化的精气神之灌注,方成为气血充盈而神真意满的活的生命体。故古人总在那讲:“文以气为主”,“一笔细含大千”。这里的“气”和“大千”,以及书画中的所谓“神采”,正是这种精气神的文本化体现。

是以包括水墨画在内的中国书画之笔墨的根本审美特性,在于其由“物性”到“诗性”的“气化”而至“诗意自性”的过程——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不同于西方艺术的审美“方程式”。

西画也有“笔墨”(仅从材质而言),但大都属于“物性”意义上的,落于实际创作过程时,与主体精神和气息的关系是一种如黑格尔所说的“灌注”的关系,止于形象与逻辑思维(由具象到抽象到观念艺术)。中国式笔墨,是“物性”与“诗性”的水乳交融,是物态的笔与墨,经由长期主体精神的“修行”与“浸润”,至“心手双畅”时的“气化”(气质化,气息化)而达成“诗性”境界。是意象思维,故有“意造”之说。落于具体书画之作,则重在抒写而不为形困,求神似,求心象与物象的“天人合一”,浑然一体而余味无穷。

我一向认为,笔墨的现代性不是指笔墨的现代化,这一块你没办法化,越化越坏事。而是指灌注于笔墨中的文化品性和生命体验与语言体验的现代性意味。由此再回返来看你的这批融会中西、“两源兼及”的新画风画作,似乎还有些夹生,想表现出来的和现有作品表现出来的,似乎还有一些距离,不像你其他作品那样老到,娴熟,厚实,得心应手。但这条路子,包括这个题材,绝对是大有前景的,只是初步上手且一下子铺这么大的局面,稍有夹生是难免的。当然这些也都是我一时读画中的直觉感受,管窥个见,不一定对。

杨:我理解你的这些说法,早先在理论上也深入思考过这些问题。

中国画的笔墨材质和西画的笔触材质有本质上的不同,运笔的快慢疾徐,墨色的干湿浓淡,其中诸多微妙,都包含了主观精神的相生相济。尤其是“线”,中国画笔墨中的线和西画中的线根本不是一回事,西画的线主要是拿来造型或勾边的,是一种科学的、逻辑性的“线”性思维,不像中国笔墨的线里面,有那么多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正如你所说,中国水墨画是一种“意造”,就是传统中所说的“写画”,广义的书法,主要表达的是一种主体感受,要微妙高明得多。这其中的高低好坏,全靠画家个人才气和综合素养来支撑,再就是案头临池时的状态。

至于这批“陇南”彩墨系列新作，确实一方面反响较大，另一方面也看法各异，包括你提出的一些问题，我都会在以后的创作中来参考调整，争取笔墨与题材的有机融会以形成明确而独到的风格。毕竟这是我一直特别重视的一个大题材，光写生就好几年，烂熟于心，还是想坚持做下去，在求变当中探索新的未知的境界。说实话，我也早对自己这批画不满意了，我想尽快地“忘掉”，然后重新开始，敢于否定就是最好的进步。



【图解】

杨立强国画

沈：像这样大的、有方向性的艺术探求，初步成型后，反响不一，实际上是正常的，若都是一边倒的反响，反而等于没反响。就现有的图式、气韵和风格来看，拿这批画同其他一些有关西部题材的画作相比较，至少摆脱了你所说的那种“贴标签”式的，或者按我的说法即“文化明信片”式的模式，发自我长期生活体验于其中的真情实感，同时也发自我独在的语感体验，其探求的方向是没问题的，只欠从写生的原生性体验中再升华一步，予以更精到的提炼与再造而已。

说到这，想到我自己近年作“高原·高原——中国西部美术展”学术主持中，所提出的有关“西部美学”的“三原”理念：其一，原在性的生存体验与表现；其二，原发性的语言体验与表现；其三，原生性的生活体验与表现。就是想从理论上重新梳理和廓清长期以来人云亦云的所谓“西部精神”和与之相生的“西部美学”的定位问题，及学理性内涵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和表述。这个“三原”理论的核心意旨，是试图将“西部精神”及“西部美学”收摄凝定为人与自然的纯时间性（非时代性，所谓“新风貌”）和生命性（非生活性，所谓“体验生活”）的一种更深层的对话，且是一种充满苦味、涩味和艰生味的对话，消解了主体虚妄和主流意识驯养，重返神性与诗性生命意识的对话；生存的局限与渴望突破局限的亘古的意愿，强势的自然力与相对弱势的生命力的对立与和解，原始美与现代美的冲突与交融，传统文化遗脉与当代文化语境的摩擦与纠扭，异质混成的地缘文化与唯新、唯时尚是问的主流文化的分歧与磨合等，才是本质意义上与“西部”对话的要义之所在。离开对这些要义的追问与探求，都可能只是流于表面的认识和无效的高仿。

我想，以你的创作态势和创作经验，于此轻松自由的访谈中，顺便扯出这点不免高蹈和学术性的话题，权当交流佐茶吧，或许能为此后的探索，做一点理论性的参照，那我就更不虚此行了。

而来这之前，其实我最为感兴趣的是，在当下这样空前浮躁和实利的时代语境下，可以说，会画画的在画画在卖画，不会画画的也在画画在卖画，而且都是小地方的画家往大地方跑，三线、二线城市的画家往一线城市跑，你却整一个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放着

兰州省城能待不待,而且“自我放逐”到家乡小县城后,还越沉越深,越待越自在。如此以“一线画家”,身高位重,而孤居山乡故地,自得边缘,潜沉修远,颇有杜诗“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的高致,恐怕无论新老朋友和知己者都想知道,你何以能如此选择还能如此坚持至今?

杨:你提的这个问题,几乎所有来访的都要提,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了。记得十几年前就有朋友劝我到北京,我一口回绝了,至今也没动过心。为此也拒绝过留在省城专业机构工作的机会,早在80年代中期就离开兰州回这了。美术界的各种活动,多年来我也很少参加,不是非得去开的会,一般会我也很少去开。已经成了习惯,上上下下好像也渐渐理解了我,容忍了我,得大自在。但在创作上我却从没偷过懒,几十年坚持不懈,可以说几乎一天也没偷过懒,但心态方面,倒是一直很轻松。

守住成县,守住故乡,客观原因是为了尽孝,为了侍奉一生艰难不易的老母亲安度晚年,主观原因是确实觉得守在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地方,才能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咋画就咋画,没有外在的干扰,没有为什么国展、省展赶创作的焦虑,更没有为赶各种任务受这方面那方面的指手画脚。说老实话,现在画画真的很难得自在,一旦要面对变了味的展览,面对变了味的市场,以及人情世故,你就得考虑既要画给懂画的人看,还要画给不懂画的人看,实在很难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难以完全脱俗,也常常为难于其中。不过我坚持一点,就是要真诚,不做违心的事。举个例子,比如给朋友画一幅画,画好画得意了,成就一张满意的作品,即或舍不得,也照样送朋友,给你画的就是你的,不能留下再另画一张打发朋友。这样的心态,大概只有“人在边缘”才做得到。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想回报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家园。80年代中期我也跑南方考察过一圈,最后还是决定回成县发展,并于1985年筹办成立了甘肃省第一个县级画院,也是全国成立较早的县级画院,后来越来越有名气,越来越发达,成为陇南一道特别的文化风景线。同时我也就能如鱼得水地沉潜下来,将倾心多年的“陇南”这个大的题材坚持追求下去。

沈:听你这么讲,真的很感动。包括今天一天的谈话中,我也一直在观察你,想到歌德的那句话:“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由于市场机制和展览机制的强势存在,现在的画家很难保持人与画分离的尴尬,在你这里,我真的和甘肃的诗友们一样,重新找到了对艺术及其艺术家的双重敬重的感觉。

所以这些年我总在讲,在色彩和线条之外,在视觉深度和灵魂深度之外,艺术的发生及艺术的接受与欣赏,恐怕还有一层重要的“意思”或叫做价值尺度,即“心境”。无论欣赏者还是收藏者,在其意识的深处,由艺术品的欣赏或收藏途径,在养眼悦意之外,更改变了一份“心境”,或者说是更增添了一份“诗意的心境”,或收藏了一份“诗意的心境”——这是更具诱惑更有价值的所在。

而真正的好画,是既可作壁上观,又可作心里读的。而真正优秀的画家,也是既可作画中读,又可作心里读的。在这样的“观”与“读”中,我们既享受了一次美的散步,又收藏了一个诗意的灵魂。正如造访你这“山外山画室”小院,整整一天了,此前读你的画,今天读你的人,一见如故,无拘无束地聊了一天,又逢初夏时节,天朗气清,真的是一次诗意之旅,感念至深呢。当然,还得感谢古马诗友的介绍,成全了我的一个心愿。

杨:谢谢!我们找机会再聊。晚饭就在自己家里吃。

对工笔花鸟画创作的几点思考

郭向雷

关于创作

从字义讲“创”即开始(做)、(初次)做,“创作”就是创造艺术作品。但艺术是一种文化,不是发明创造,它是有文化积淀和传承的,完全的“新”是站不住脚的。歌德说过,“不论你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都应当装满你们的时代的思想感情。”是的,如果拿古人当镜子,循规蹈矩,泥古不化,好像自己不食人间烟火,那也是站不住脚的。但如果从中国文化根源深处努力寻找它的发展前景,或现代性的思考,以及从西方艺术表现中借鉴都是很好的途径。失去文化历史背景性的存在,中国画的价值运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寸步难行。纵观中国传统绘画,正是由于历代画家不拘成法,勇于创新,才使得绘画艺术不断延伸,才有了这么多传世佳作。中国花鸟画是世界绘画艺术中具有非常强烈的个性特色与独特审美视角的艺术形式,工笔花鸟画做为它的表现形式有着很优秀的传统,最典型的当是宋代院体花鸟画,精致的团扇是画工用心画出的,要想从“心”中认识、体会到所要描绘的客观物象的形貌精神,是要下一番苦功的。但靠苦功和耐心补偿不了艺术家的天赋,艺术家在事物前面必须有独特的感觉,事物的特征给他一个刺激,使他得到一个特殊的印象,凭着敏锐的感知能力,自然而然能抓住事物细微的层次和关系。所以,创作是对真正用“心”的艺术家而言的。

【作者简介】

郭向雷

甘肃省美协会员

创作心态

独特的视角、个性的语言、鲜活的色彩、细腻的笔法,强调大场面、大制作几乎是当代工笔花鸟画的整体风貌,虽然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了宋画精细不苟的审物精神,但缺失了借物抒情的“意”字。所谓“有感而发”“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在创作中只存在于表层,并没有真正成为画者表情达意深层主宰。工笔花鸟画不光要表现美感,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情思,或者说,描绘形象以抒发意境。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里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瑞士思想家阿米尔(Amiel)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因此,“静能生慧”,意境的创设首

【图解】

郭向雷工笔



先需要心静。为上展览创作而创作，挖空心思找所谓的“突破口”迎合评委口味，以“新”突出创造性，其实自己并没有进入角色。创作是自己真情实感的表达，“黄子久（元代大画家）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篠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谔而不顾。”他这样沉醉于自然中的生活，所以他的画能“沉郁变化，与造化争神奇”。在当下，艺术市场空前繁荣，盲目躁动者不乏其人，但真正的画者，外界的繁杂并不会波及他的艺术创作。心静下来了，才能达到“画境”。

创作状态

老子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自然”的概念，“自然”不是指自然对象，而是指一种自然无为的状态；庄子的“解衣盘礴”论是借用画画的故事讲道家“任自然”的思想。这些哲学思想虽不是论绘画的，但道出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即艺术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自然无为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创作，作品才能清新自然，毫无造作痕迹，才能突破前人藩篱，有自家面目。自由自在是艺术创作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艺术家在他的创作中得不到应得的（亦即天人合一的）自在境界或乐趣，那他一定是在做一件苦差事，也只能出产一些虚情假意的甚至是以毁灭自己灵性、才情去模仿他人风格为乐事的作品。因此，创作应是画者精神心境的天然观照，进入自由的创作状态，心性的东西才会自然流淌。正如清代美学家沈宗骞所说的那样：“故当伸纸洒墨，吾腕中若具有天地生物光景，洋洋洒洒，其出也无滞，其成也无心，随手点拂而物态毕呈。”这才是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工笔花鸟画的创作周期长，容易僵化，画者的感受和表达是要在长时间的书写、制作、晕染中慢慢的呈现，这就更需要画家的定力和功力。

创作过程

朱光潜总结说过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也是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加工改造，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是的，艺术创作是一件煞费心血的工作，是要经过一段繁复的蕴蓄与培育过程。艺术创作的过程是先由感性的行动，再经理性的思考安排，终至感性的呈现。工笔花鸟画之感性的呈现是超越艺术形式之外的更高的境界，要表现所谓“气象幽妙”“真元气象”所谓“画之境外意”“画之意外妙”“妙在笔画之外”就更不易，因此，在这个复杂而又简单的创作过程中，最终考验的是画家的顿悟、学养和真情的表达。工笔花鸟画要以技术为支撑，以写生为突破口。工笔花鸟画虽是勾线填彩，但创作时也应是自由的，画法有工有放（写），有写意中的书画一道用笔为上，也有泼写式

的大制作,总之工笔花鸟画家精湛的技法让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具有了实在意义,决定着画面的生命力。当然,技术只是一种手段,毫无意义的技术炫耀是空洞无味的肤浅的,精湛的技术是建立在对自然、当代文化、当下社会人文文化心理需要的感悟和认知中,是从心灵中流泻而出,奔发而出的,而不是为了效果的制造、时尚的独创,它仍然是在古代花鸟文化的感染下的一种现代情愫表达。

工笔花鸟画要以写生为突破口,方熏在《山静居画论》说:“古人写生即写物之生意。”工笔花鸟画就是凭借气象万千的自然花木鸟禽走兽为题材来写其生气,写其生机,通过画家耐心不竭,细致入微的手写心记来把握形象、把握意境、把握气氛,抒写画家内心的情思和意境。艺术家如果能长期深入到大自然中,和自然亲密接触,物我交融,自然会迁想妙得,神遇而迹化。写生时要培养生活中的发现能力,“庸才总是对众所周知的常识津津乐道,只有天才能够发现隐藏在垃圾背后的学问。”发现能力包括发现题材、发现意境、发现特征、发现美感、发现典型的形和状等,甚至发现构图和新的画面构成样式。大自然的形象是惟妙惟肖、丰富多姿的,画家的创作如果要有生命的力度,则需对自然生态规律进行深度的观察和精细的研究,就会发现独特所在。写生时要培养绘画的表现能力,大自然中的虚实动静、阴阳向背、张弛疏密、高低错落的韵律感和纵横交错、大气磅礴、浑然一体的视觉撞击无不给我们一种提示和感染,我们需灵活机智的对感知的物象进行取舍、提炼、概括、夸张,再不断地组织,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完善,把握势,强化势,造险,破险,以达到表现出物象的机趣和生趣。写生是物与心的交流,面对自然的真情表达,工笔花鸟画的本质在于以心感物,而且要在观察写生中做到这一点,才能达到一定境界。

(后接第 79 页)生除了进行持续的艺术创新实践外,还潜心研究工笔花鸟画艺术理论,倡导新的绘画理念,力求将当代工笔花鸟画引入到古典精神、时代精神、人格精神、人文精神的大融合中。毫无疑问,工笔花鸟画的传统底蕴与当代的艺术精神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较之于山水画和人物画,工笔花鸟画写实、写意、写神、写形兼备一体,出神入化地传达着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相契相合。工笔花鸟画作为人类艺术史上非常早熟的一种具有关注自然的艺术载体,至今还有着袅袅不息的余音,它仿佛始终在提醒着人们升华求真的感情、求善的情操、求美的心理,从如歌如诉的山禽野卉中发现生命之美。可以这样说,莫建成先生的工笔花鸟画,以荷花喻心地之高洁,以寒梅喻品格之高雅,以茂竹喻性情之刚正,以山雀喻灵魂之飞翔,以仙鹤喻岁月之长久,以雉鸡喻生命之纯朴,综合在一起就是画出永不缺失的赤子之心。所以,读他的作品就如同是从青春的秀美走向中年的壮美,我们慢慢从内心卸下华丽的思绪,逐渐以成熟的芬芳去温习往日的时光,听凭自然之力、艺术之力和生命之力把我们的真情挚爱抬高,这样我们才可以离仰望的苍空更近一些,这样我们才可以紧紧追随生命中的诗意到生活的深处栖居。莫建成先生的工笔花鸟画艺术历程,仍然处在“西望敦煌”的大背景、大氛围中,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工笔花鸟画大家,他在脚下这片文化沃土上继续着自己的耕耘、创新、突破,他注定以他所开创的崭新的工笔花鸟画艺术天地,成为沐浴着敦煌画风的西部艺术史上独树一帜的画家。

天籁化逸气 纤真写新风

——读当代著名画家莫建成先生作品

雒青之

【作者简介】

雒青之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中国作协会员

“花有情而独笑，鸟无事而恒啼。”（唐·骆宾王）当代著名工笔花鸟画家莫建成先生，以其对工笔花鸟画艺术的独特理解和精心实践，创作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华章佳作，成为名满西部影响全国的一代名家。莫建成先生的工笔花鸟画艺术交织着激情和柔情、绚丽和纯朴、圣洁和简洁、自由和严谨，呈现着回归古典而不失浪漫、深蕴传统而不失创新、坚守真实而不失梦幻、追求古朴而不失现代的高贵与大气。莫建成先生用他的工笔花鸟画作品构筑了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天籁之国，那里既有他隐而不彰的心路历程，也有他对大自然一往情深的热爱、敬畏、回馈之心，因而他十分确凿地坚称：“我的画与其说是精心的描绘，莫如说是真情的抒发，它展示着我对人生与自然的信仰。”这种深邃高阔的情怀和精微细致的心绪，为他的工笔花鸟画创作打上了深沉有力的生命烙印，也使他以西部画家的身份崛起在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创作之林，以其独特的艺术格调和荡气回肠的鲜活之作赢得“莫家花鸟画”的美誉。

莫建成先生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将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本土美学与域外美学、自然美学与历史美学完善地提炼融合为一体，使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艺术精神得到了超越物化、直抵心灵的提升。在他诸多犹如天使般澄净温柔的代表作品，如《寒月惊梦》《竹雀图》《双鹤系列》《春早》《寒塘映衰荷》《松云伴鹤飞》《寒冬寄语》《幽居图》等令人神往的佳作中，表现出十分罕见的精神气度和人格力量。莫建成先生以其独特的清明纯净的抒情语言和艺术灵感，一扫浮沉在画坛上的种种喧嚣与躁动，在画面中营造着宁静的韵致、淡雅的从容、诗意的寻觅、沉郁的忧思和仁慈的情愫，从而让我们的阅读演绎成心灵的相遇和良知的相逢。可以说，“莫家花鸟画”的根本和精髓就在于：通过工笔花鸟画呈现着精神特质和心灵品质，解读着人生和人世的美意与诗意，充分表达了对大放异彩的自然世界的敬畏、对沧桑岁月与如梦人生的审视，由此而流露出的弥漫不散的艺术魅力定格成工笔花鸟画意境、意韵、意象、意绪的完善和谐。国内许多著名美术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莫家花鸟画”视为代表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水平的艺术品牌，这是毫不惊奇的。莫建成先生从故乡土地上开始的五十余载艺术创作实践已说明，大西北的艺术家完

全可以汲取文化厚土的养分，创作出既不同于岭南画风也不同于江南色彩的自成一格的工笔花鸟画作品，正如反响强烈的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西望敦煌——甘肃省美术作品展览》学术研讨会上，一些著名的美术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莫建成、莫晓松的工笔花鸟画，代表了中国当代工笔画的水平……”其作品呈现出难得的历史感、时代感、敦厚感、宁静感、执着感。

在我看来，莫建成先生工笔花鸟画创作最集中也最突出的艺术贡献体现为六个方面。

一是他承继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东方艺术思维。他将工笔花鸟画的艺术创作理念和理想融入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中，是儒家思想与老庄智慧的艺术结晶。故云：“我望着那深厚苍拙的山川巨石感受着大自然的造化之美，品味出世道之沧桑。我画山石林木、山花野卉，不是简单地为它们作形象注解，而是抒发我对它们的恻隐和同情、倾慕和爱心，表达我对生活、对祖国山河的热恋之情。”

二是他始终在艺术创作中持续地作着文化坚守和文化建树。他的作品充分洋溢着文化符号的特殊气息。这种植根文化、拥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精神空间的创作思维和创作方式，使莫建成先生的作品达到了“十不”的高度，即：“不狭隘、不空洞、不单调、不呆板、不庸俗、不矫饰、不琐屑、不晦涩、不盲从、不喧嚣。”

三是他的作品是对大自然的最好礼遇。是对山禽野卉的一见钟情，是自然与人生的邂逅相逢。他的工笔花鸟画有着令人一见倾心的浓郁诗意，甚至孕育着与唐诗宋词血脉相贯的艺术脉络，观者往往从他的画幅间感受到既有时代气息而又跨越时空的生命诱惑。

四是他将自己的工笔花鸟画艺术建立在对内心情感的倾诉上。他的画作中揉织了自然的天籁与心灵的天籁，他总是能够在美不胜收的画面中展示人性的光辉和心灵的温情，所以他不在乎作品是否时尚是否流行，他认为一幅经久不衰的作品应该是心灵的花瓣，任何昧心媚世的痕迹都会有损于作品的生命力。

五是他就是一位能够自觉地站在美学和哲学的高度去完善工笔花鸟画艺术的大家。他对大自然的心领神会源自于他对山川万物的全景式思索和积淀在心头的悲天悯人的精神视野。他的画作理性而端庄，但同时又饱含内在的激情；他的笔墨、色彩、构思、韵律有时空灵，有时雍容，有时冷静，有时微醺，有时内敛，有时洒脱。既然工笔花鸟画就是他潜隐不彰的心灵独白，那么他就在这清醇无语的境界里进行着圆融无碍的沉思默念。

六是他勇于从历代绘画艺术比较中开拓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审美疆域。他的工笔花鸟画很难用某一种美学规范加以评判，作品中所包含的声、光、色、形、意、韵使人顾恋不已，他对其它艺术门类的吸收与借鉴，特别是有意对自宋代以来花鸟画艺术的视野和结构，对自然的静观默察、对实写生、潜移默化的提纯出新，为他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增添了更和谐、更高雅、更清新的艺术质感。

莫建成先生是一位自省意识和自新意识非常一致的学者型和文化型画家，他对作品的构思、构图都有着非常系统的考究和追求，没有思想感情的画从来不画，没有心灵体验的画从来不画，只讲形式技法的画从来不画。我一直关注他写下的一些创作手记，就是因为这些充满感想、感受、感性认识和内心感慨的手记，真真切切地将他对每一幅工笔花鸟画创作过程的体验完全地记录下来，给了我们最直接最完整最贴切的审美导

向和感悟。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创作《竹雀图》和《寒月惊梦》时写下的创作手记了。在谈到《竹雀图》的创作主题时,他“力图体现人与自然同体,精神沉入竹林,进入到与整个山川草木融为一体的世界,使立意和主题得到深化,表现了生命动静相生的旋律。”从《竹雀图》这幅典雅、和谐的作品中不难看出,莫建成先生高妙的创作技巧与其高贵的艺术精神是合二为一的,他在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基础上更加大胆地加入了个性化、感性化的元素,以增强画作的表现性和表达力。尤其是他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原创精神,摒弃了任何模仿痕迹,用自己精心构造的形象赋予画面强有力的感情色彩,卓越的把握线条、墨迹、色彩、格调的运用,使整个画面洋溢着、澎湃无懈可击的纯情之美。华贵之美、梦幻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说莫建成先生的《竹雀图》是一幅闪烁着诗意光芒的精美绝伦的艺术结晶。在《寒月惊梦》的创作手记中,莫建成先生开宗明义地把自己定位于“更接近于古典主义的工笔花鸟画家”,但他所言的“古典主义”肯定不是“复古”“泥古”,而是一种全新的中国画传统风格,在这幅备受好评的工笔花鸟画巨作中,他“强调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时空扭转,使地域特征——西部的审美景象通过花鸟画这一独特的语言得到强有力的表现。”的确,《寒月惊梦》是一幅抒情气息极浓、诗情画意恢宏、人格精神旺盛、心灵内涵充沛的具有开创性全景式构图的作品,“画面寂静中突出空旷,似乎一股苍凉感向你袭来,西部冬季的长夜格外寒冷,凝霜与月光铺向大地,严冬伴随着生态的恶化,使雉鸡在寒月之下惊魂不定,闻声而起。这一构想的安排,深化了花鸟画的内涵。具体裁技法上对雉鸡神态、羽毛质感的刻画尽其精微,有跃然于纸上之感。追求画面单纯、淡雅的色彩效果,对背景、树干、空间多层次的晕染,苍而不涩,寒而不燥,并且使线条的表现力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而遒劲苍拙。整幅作品的调子苍茫不失清润,冷峻而见高雅。”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散文诗般的创作手记给我留下的印象几乎与对作品的感受如出一辙。我一直在想,倘若莫建成先生能够将创作生涯中写下的如此精妙的创作手记,全部搜集整理成册,必将为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艺术创作史



册留下一部厚重的经典之作。莫建成先生对每一幅作品的审美思维,表现出学者型画家的卓而不群的独立思考 and 美学智慧,从中看到了他的工笔花鸟画既不是对传统工笔花鸟画的简单复制或回炉加工,也不是别出心裁地凭空草率经营,而是善于浓缩传统精华、善于捕捉现代意象、善于释放内心情感、善于各种新的艺术元素,用发现的目光找突破的口径,用创新的笔墨写心中的意象,他的作品将朦胧诗的风格和风骨润化在笔、

【图解】

莫建成工笔

线、墨、色中,极为自然生动地把传统型工笔花鸟画译析成具有现代精神的艺术语言。

莫建成先生在他的工笔花鸟画作品中对山禽野卉及其大自然背景的描绘,有着童话般的超时空的内在体验性,也有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相互发酵的抒情性、梦幻性、叙事性。如《春早》有着田园诗般的宁静,布满画面的大片大片的绿色让我们想起了春天的舞蹈和山林的音乐,两只温情脉脉的蓝马鸡像两位山林的守望者,寂静地呼吸着早春自由的绿色气息,这样耐人寻味的形式美感表现着作者的“一种情感,一种向往”。同时也是一种自信的希望、款款的憧憬和婉转的倾诉。精工于荷花、菊花、寒梅、老树、枯藤、秋叶、苍柏、竹子、雉鸡、仙鹤、燕雀等花鸟意象的莫建成先生,有着超凡脱俗的色彩感、肌理感和实体感,他的作品没有一幅是信笔涂鸦而成,没有一幅作品是技巧至上的结果,他在技术与艺术之间构架起一条心灵的彩虹,彰显精神的光照和情感的化育。如在《寒冬寄语》中流露的是爱与美的颂歌,画面中的暖色调与冷色调交相辉映,白雪、岩石、枯枝以及数只蹒跚的雉鸡有着浮雕般的艺术效果,画面丝毫没有神秘感和忧郁感,也没有任何茫然和冷漠,透过冬日荒芜的略显寂寞的景色,我们领略到的是一种淳朴、祥和的诗意,作品仿佛在发出这样的寄语:以爱的形式等候春暖花开。这让我所感悟到的莫建成先生工笔花鸟画驾驭主题和把握细节的能力。他的艺术成就已经攀达到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主峰阵列(这里没有顶峰或巅峰可言),这有大量在国内外或展出、或收藏、或荣膺大奖的作品可以佐证。他的作品中所呈现的精神富足和心灵喜悦,让我们体验到传统工笔花鸟画到了莫建成先生这里有了质的飞跃:不再是简单的视觉图像的制造者,也不再是静态的平面的描写者,而是从程式化中冲撞而出的艺术创新者,是以动感十足的韵律化语言取代传统艺术秩序的变法者,他总是能够乐此不疲地将宫廷化的工笔花鸟画艺术演变成触动心灵情感的当代艺术语言,总是能从平淡无奇的非艺术存在里发现并表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之美,他将西北风物、西北景貌举重若轻地渗透到一向以南国风景为中心的工笔花鸟画创作系统中,拓宽了工笔花鸟画的艺术空间,使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与表现走向更加自由、自在、自然、广阔的天地,他是那种最重视地域特性又坚持反对以地域视野封闭艺术视角的艺术探索者,他所坚守的工笔花鸟画艺术的统一包容了中国画风格、传统特性、地域特色、现代品格、时代气魄的艺术精神,他的工笔花鸟画艺术体系充满了多样性、开放性、兼容性……把这些赫然醒目的杰出艺术家所应具有的精神特质融于一体,使莫建成先生的工笔花鸟画作品显现着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和亲合力。

莫建成先生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带给许多人精神抚慰,也使“莫家花鸟”成为美术评论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作为他的甘肃同乡,我有三种强烈的感觉溢在心口:一是把莫建成先生的工笔花鸟画作品视为心灵故乡的表达者,我尽情地在他迢迢而至的山禽野卉中聆听到大自然亲切的呢喃;二是莫建成先生工笔花鸟画作品所创造的神圣、神奇、神秘的禅韵,以无限的诗意萦绕在我的审美视野中,让我有恒心有恒力认识美、热爱美;三是莫建成先生用最唯美的形式为大西北的天籁之美留影,传达出大西北内在的可遇不可求的神韵,这足以让所有深居西部的人们体验到强韧的艺术精神的洗礼和熏陶。我相信莫建成先生通过他的工笔花鸟画创作,已经使国内外美术界人士了解到甘肃美术所深植的文化厚土,了解到甘肃工笔花鸟画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了解到“莫家花鸟画”对推动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创作的重要性。近些年来,莫建成先(前转第75页)

《未是斋吟稿》跋

刘可通

【作者简介】

刘可通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樊执敬，字履僊，晚号梦禅山人。虔信因果，礼佛笃诚，90 示寂。樊桓上耆宿，诗文书画，桀然高于时人。

家父、伯父与樊年岁相若，游处相好，又同历民国地方时政，相识相知，知交颇深。20 世纪 80 年代，共参编武都政协文史资料，博采搜求，竭尽心力，去伪存真，所辑资料，信而可证。

曩岁，余曾随武都地区文教局张秉忠局长去岷县文化馆，由馆长於奇带领检视鲁大昌移交馆藏书画珍品，览过唐寅、文徵明、董其昌、王铎、王了望、王翬、王原祁、高其佩、王文治、刘墉、林则徐、徐明福、翁同龢、康有为、张大千、于右任等名人手泽，欣见樊执敬山水画轴存焉。余因就樊老学识、文字功力简要作介。1982 年初，张秉忠局长意欲藉张鸿汀《陇右金石录》择录所载武都、文县、成县、康县、岷县、宕昌碑文，增益辖内新出土碑刻内容，辑成《武都地区金石录》。余力荐樊老抄录、点校碑文。经许可，樊欣然应邀任事，工整抄录，点校精到。余公暇探访，樊以胡纘宗《府城里公馆记》考余释读、断句，以鉴学识。不解处，如“弥节”“埋轮”，曾口授指教。后樊执敬担纲点校清代叶恩沛修、吕震南纂的《阶州直隶州续志》而声名大振。

1981 年起，武都政协组织樊执敬等一批熟谙民国时期武都地方文化、教育、政事的社会贤达，成立了“文史资料征编小组”，搜罗编辑印制《武都文史资料汇刊》50 期。出版《武都文史资料选辑》4 集。抢救补辑了继《阶州直隶州续志》后，百二十年间散佚的武都文史资料。

樊、刘两家世交，樊老深知余曾祖父刘允升举人任阶州高等小学堂教习，“道德文章，为吾邑之冠”。因假余借阅《刘允升诗抄手稿》，称“天年笔存着寥寥，吉光片羽，学者珍之。”1997 年 10 月樊老弥留之际，家父携余探视，樊老尚能应答辨识，辞别不久，旋长逝矣。秋云黯黯，怀想难释。

时逾樊老长逝六载，得悉其长子讯璘处，存有樊老生前诗作，登门往求，蒙允借观，烛剪开读，足慰渴想。

余涉地方文史，概识与家父有旧者，诸前贤才华诗文，各有千秋，然比肩而企于樊老

者寡矣。樊老青年时求学天水师范，聪颖能诗，功底深厚。返里任教，多受教举人郭维城。广涉典籍，远袭《诗经》，唐人流韵，近接环山风雅。心慕手追，诗文益进，骚人情怀，颇近环山。思维敏捷，扬手文飞。感时怀古，忧国恋乡，心有所寄，喟吊歔歔，杖履泉林，登临惆怅，啾唔占毕，半储奚囊。生还偶遂，幸不防鸚鵡，亲骚雅于丛残，朝夕追忆手抄。有生之年，劳役口占者阙如外，幸存诗稿盈千，读之，概见平生。

纵观《未是斋吟草》诗词千余首，逐一抄录耗时过长，恐违约期，择录又虑遗珠，遂持币付诸复印装订。后示张君国元，同生异日付梓之预想。

余不忍樊诗覆瓿抹几，湮没无闻，岁在2004年4月，余评点樊执敬一组爱情诗，文以《深情隽永 魅力独具》首刊《陇南诗词》。在兰见林家英先生赞许：“樊老爱情诗好，你也点评的好。”2014年余参与武都佛堂寺文化建设，曾与杨君全社友商榷，选樊执敬、陆开华、樊忠英、刘可通咏佛堂寺诗各一首，分别邀秦理斌、王青彦、赵元鹏、汪廷湖书丹，刻成六尺诗碑。

樊执敬《山寺》两首选一，俾世人窥见一斑：

画殿晨光满，披衣觉露滋。
 卷帘共结想，倚槛自移时。
 林静莺鸣早，山深雁过迟。
 胭脂红点点，开遍牡丹枝。

近十余年，余倾力《武都文史》与孙君林利友情默契。因引荐其读余遴选之《未是斋吟草》简编，冀武都政协文史委刊印梓行。孙持《未是斋吟草》申报区政协领导，贾周云主席高度重视，召开《未是斋吟草》编委会议，就诗全稿整理、排版、印量及版权诸事达成共识。文史委两易寒暑，整理、点校《未是斋吟草》全集成清样。2018年5月初，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甘肃省诗词学会副会长王传明文史考察来武。先生深通诗律，长于鉴评。2001年4月20日，袁第锐先生偕传明教授来武讲学，因能相识，多年来情谊深厚，余极举王教授为《未是斋吟草》作序。嗣后，原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刘醒初见打印诗稿，言及樊老先生亦与旧识，诗作不独载个人鸿迹，应作地方史诗看。区政协整理出版诗集，功德无量。提议再请陇南籍赵逵夫先生作序。余深表赞同，赵先生西北师大资深教授，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德望学识名噪海内，尊崇前贤，家国情深，请其作序正得其宜。2018年10月16日，区政协主席贾周云带文史委主任孙林利、副主任袁长流并余一行，冒雪冲寒，赴兰拜谒逵夫、礼见传明，呈览吟草诗稿，二位教授允诺作序。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文人，陇南山水清气孕育一方文人灵气。樊执敬先生吟咏风物，或隽永婉丽，寓凄婉感伤，或豁达壮美，不甘平庸，金石铮铮，风骨豪迈。诗词透出情辞兼美的感染力，强烈地撼人心魄。诗承民国以来陇南文学发展史上一抹余晖，独领风骚，而雄踞文坛。

《未是斋吟草》虽志樊老鸿爪，但真切淳朴的社会叙事诗，抗倭题画诗，是奉献给那些没有经历过民国时段的地方文史探究者和社会的一份厚礼。基此认知，武都政协结集出版了《未是斋吟草》。

此书力勤点校，朱墨双色套版，装帧印刷精美。武都政协文史委、中国文史出版社，亦颇尽力矣。

《古代文化论丛》前言

张崇琛

【作者简介】

张崇琛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兰州大学教授

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最难忘的还是故乡。我也是同样。我现在虽已是“东西南北之人”了,但故乡的影子,还有那伴随着影子的忆念,却永远都不曾消失。

我的故乡是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小乡村,那里背靠着一座无名的小山丘,村里人管它叫西岭;前面还有一条大河,即《水经》上曾著录过的潍水。先辈们传说,当年立村的时候,这里还是杂草丛生之地,尤其到了秋天,野草都开满了白花,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好似雪中的庄稼一般,于是村子便取名雪稼庄。但后来不知怎的,竟被讹称为薛家庄了,其实从古至今,村里连一户姓薛的人家都没有过。到了清朝的康熙年间,我的四位祖先即被县志称为“张氏四逸”的,为了过隐居生活,又在此修建了一处园林,并取名“四逸园”,于是一时来访的名人渐多,这里与张姓的另一处园林即放鹤园,又成为清初远近闻名的遗民汇聚之地了。象江南的洪名(嘉植),山东的李象先、杨水心、王鲁珍、李之藻(后来又成为蒲松龄的老朋友),以及县内的李澄中、刘冀明等,都曾来过这里。

至于薛家庄周边,则出过的文化名人就更多了。就在村东南不远处的潍河岸边,至今还留有一片地势稍高的开阔地,地名叫葛陂,祖辈相传,那里便是诸葛亮的祖居地。传说诸葛氏原本姓葛,就住在与诸县隔河相对的葛陂,后来他们举家迁到了阳都(今沂南县境),因当地也有姓葛的,为相区别,才复姓诸葛(即诸县葛氏)。此虽系传说,倒也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松之注所引的韦昭《吴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诸葛瑾)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由葛陂往西北二十余里,则是孔子弟子又是女婿的公冶长故里。村子原名公冶场,后改名先进村,公冶长的墓地就在村子旁边,村中至今还住着数十户姓公冶的人家。再由葛陂往东二十余里,位于县城的西郊,又有村名岔道口,便是宋代大画家、《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的故里了。而宋代金石大家赵明诚的故里,也就在岔道口南面不远处的兰家村。再加上宋代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九年(1076),苏轼又曾在此地任过两年多的密州太守(治所就在诸城),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带的文风一直是很盛的。诚如苏轼弟苏辙所说:“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而我的青少年时代就生活在这一地区,并

目睹着先贤的遗迹,是听着他们的遗闻轶事长大的。

犹记夏日傍晚的打麦场上,还有冬夜编织草鞋的地屋中,都曾是先辈们讲论乡贤的场所,而于我则是学习乡土文化最早的课堂。我们家在我出生时虽已成为贫下中农,但家族的文化传统一直在延续着。我至今还记得,在田间地头的辍耕之际,父亲曾为我讲述过的许多文史典故及乡园旧事;也记得我们家祠堂大门上的那副对联:“大河以上无地不耕,宜麦、宜粱、宜菽;片碣之前有经可读,学诗、学易、学书。”而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初兴趣,便是从那时起开始培养起来的。

中学毕业后(我们的中学就在张择端故里旁边),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的1962年,听说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在山东招生,还吃饭不要钱,班主任老师便自作主张地给我填报了这一志愿。不过报到后发现,学校倒也名不虚传。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八所高校合并而成的一所新校。校园是高度园林化了的,随处可见小桥流水、绿柳草坪。一条丽娃河从中间穿过,将校区分为河东、河西两个部分,而中文系所在的河东,便是当年大夏大学的旧址。我们所住的宿舍楼,上课的文史楼,还有听报告的礼堂,也都是当年大夏大学的老式建筑。在这里,我们聆听了许杰、钱谷融、徐震堃、万云骏、叶百丰等名师的教诲,也掌握了查资料、做卡片、写读书札记等初步的学习方法。有些老师,如《诗经》研究名家程俊英,六朝文学研究大家郝昺衡,还有当时尚在资料室工作的施蛰存老师,以及历史系的吕思勉、束世徽等先生,虽未给我们上过课,但他们的大名也是早就闻知的,并多次到图书馆借阅过他们的著作。

华东师大的学制是五年,但实际上我在学校待了整整六年,而真正上课的时间却只有两年。从1964年9月起,我们便随华东局赴安徽参加“四清”,两年后返校,又遇上了“文革”,所以直到1968年的9月才开始分配工作。当时的口号是“四个面向”,于是我被分配到了大西北的兰州,在一家大型的国有建筑企业干了足足十年。1978年我调入兰州大学,第二年又参加了教育部委托杭州大学举办的“楚辞班”,始得有幸跟随姜亮夫先生学习。

姜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治学的面很广,在音韵学、古史学、楚辞学、敦煌学及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我们跟随姜先生学习,真如久旱之遇甘霖,点点滴滴都舍不得放过。姜先生对我们这个十二人的楚辞班也充满深情,常说这是他晚年“结的一个大瓜”。而外界也戏称我们是姜先生的“十二门徒”。当时高校正在调整工资和分配住房,而我们这些人则全然不顾,都一心一意跟上姜先生学。每堂课都有录音,课后认真整理,并查阅相关的资料。姜先生的《楚辞今译讲录》就是这样形成的。

教学的内容自然也不限于楚辞,在音韵学、古史学及古代文化方面,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也很多。我还记得,班上规定,每天傍晚要有两名同学陪护姜先生散步,自杭大家属院一直走到黄龙洞,然后再走回来,时间大约是一小时。而就在这一小时内,我们听姜先生所讲过的文坛轶事、师长佳话(主要是有关太炎、静安两位师爷的)尤其是治学门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楚辞班至1980年7月结束,我提交的结业论文《一个值得重视的〈楚辞〉注本——读刘梦鹏〈屈子章句〉》,很得姜先生嘉许。此文后来发表于《文献》杂志,经压缩后又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先秦文学卷》的一个词条。听江林昌兄说,姜先生后来在指导博士生

写读书报告时,还曾以这篇文章作为范文。这当然是姜先生教导的结果了。而且不仅如此,我在姜先生那里还首次知道了王静安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也懂得了姜先生“综合研究法”的要义。姜先生在给我所写的结业鉴定中,还专门就综合研究的方法做过阐述:博涉群书是一个最主要的读书方法。专门只搞一二门,自然容易为功,但成就必然有限。由博返约,然后能切实掌握所要掌握的东西,这即是近年来所盛传的综合研究的基本要素。

我后来在指导研究生时所倡导的“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是受静安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和姜亮夫先生“综合研究法”的启迪而提出来的。

所谓“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基于以往的研究方法而言的。纵观几千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就其方法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的类型,或曰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注重训诂、考据、名物的传统研究方法;二是“五四”前后以“疑古”及引进新方法(如唯物史观、实验主义、民俗学方法等)为主要特征的治学方法;三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以强调阶级斗争为主要特征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虽各有其特点与成就,但在充分发掘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全面认识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方面,都不能说是没有缺憾的。因为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作品,大都带有些百科全书式的性质,它们实际上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如《诗经》《楚辞》便是。所以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就不能只停留在单纯文学的层面,而应该从大文化的视角去进行全面审视,如孔夫子当年对《诗经》所作的综合审视,以及姜先生对《楚辞》所作的综合研究那样。这是问题的一个方向。另一方面,对有些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难题,也只有取大文化的视角,并采用若干不同的角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才能得以解决。如对楚骚咏兰意蕴的发明即是如此。几十年来,我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的研究,大体也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在进行的。

收在本书中的三十来篇文章便是这一研究思路的具体体现。具体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来源与特点的总体认知,以及对古代文化与国学研究方法的简要论述。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是多元一体的,我从考古发现、古史传说及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信史等三个方面来加以证明。而“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则是其基本的特征。至其研究方法,我主张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书面文献及出土的新材料,以力求对国学及古代文化的相关内容给以准确的解读;同时也要联系实际,将这种研究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提升国人的道德水准相结合。例如,我对改革开放中如何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便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二是对远古文化的追寻,如有关伏羲、女娲、黄帝、仓颉、蚩尤及舜文化的探源。伏羲族发源于甘肃天水一带,而伏羲文化则是中国原始的和谐文化。这不但有文献的依据,而且也有着大地湾文化的佐证。女娲神话与伏羲时代相近,透过其“补天”与“造人”的神话背景,也能让我们窥见一些上古社会的影子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精神面貌。两者时代虽久,但对我们创建和谐社会及发扬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都是不无借鉴意义的。至于黄帝及舜时代的中华文明状况,前者我通过对《仓颉书》的考释以证明黄帝时代确有文字或文字雏形存在,后者则从《孟子》一书中勾稽舜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文化精神,以

补司马迁《五帝本纪》记载之不足。还有蚩尤这位东夷族的领袖,历来被视为恶魔,但我认为当与炎、黄并列“中华三祖”。

三是对《周易》文化要义的发明以及对后人应用《周易》的个案研究。《周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和中国综合文化之始,对其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如整体意识、变化发展思想、相反相成意识、和谐意识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等,我作了较系统的探讨。对《周易》卦、爻辞与《诗经·小雅》的同源关系,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至于诸葛亮与《周易》的关系,向为学界所忽视。我则从诸葛亮之用兵与治国都十分注重天、地、人的综合考察,以及他的“澹泊”、“宁静”境界与“八阵图”的制作等诸多方面,论证了诸葛亮对《周易》的娴熟运用。还有《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不但精通《周易》,而且还尝试援《易》理而入《聊斋》,《聊斋志异》中的《恒娘》篇,便是据《周易·恒》卦敷演而成的。凡此,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

四是对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及先秦文化的一些重要思想范畴如中庸之道、慎独精神、和谐观念、老学的当代价值、孔子的教学方法等的重新解读,其中有多篇是在高端学术论坛上的讲演稿,曾浪得好评。如释中庸之道为和谐之道,谓中庸之道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和双向调节;释儒家的“慎独”精神是从外在表现、理性自觉及精神境界三个方面来养成完美的人格,并指出其对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从尊重客观规律、关注生态平衡、提升领导艺术、优化经营策略四个方面来论证老子思想的当代价值;从处理教与学、“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学与思、温故与知新、讲授与答疑、言传与身教等六个方面的关系来探析孔子的教学方法等,都对先秦的一些重要思想范畴作出了新的解读,并揭示出了它们的当代价值。

五是对地域文化及方言、方俗的关注与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地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而在中国的地域文化中,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琅邪文化,无疑又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我对琅邪文化的形成、特征及其演变所作的较为系统的论述,以及我指导编写的四卷本《琅邪文化史略》(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出版),可算是这方面研究的一种大胆尝试。收在本书中的《论琅邪文化》一篇,便是《琅邪文化史略》一书的导言。还有受过琅邪文化熏陶的一些历史文化名人以及发生在琅邪地区的一些文化现象,也都很值得研究,但限于篇幅,前者我仅选取了曾知密州的苏轼,后者则选取了赵明诚(诸城人)夫人李清照画像流传始末作为研究对象。苏轼“格高千古”的中秋词诞生于诸城超然台上,从文化背景来说,其与琅邪文化的浓重氛围是分不开的。现存比较可信的李清照画像,也是在琅邪文化的核心地区诸城一带流传的。对此,我都进行了精心的考证和论述。而与琅邪文化不同的是,宋文化则一直遭遇到人们的偏见,并导致了今日社会对河南人的歧视。我从对先秦寓言中“宋人”现象的解析入手,并联系周灭商的历史背景,也力图从文化上解开形成这一谜团的原因,并指出只有消除了文化上的地域偏见,社会才能真正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另外,天水的古战场文化,历来少有人系统研究,我对此也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并为开发和弘扬这一文化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至于对地域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与方俗,我仅选取了琅邪文化核心地区的诸城方言及以桐城张氏为代表的“六尺巷”故事两个个案进行考察,当然也只是尝试性的。不过我认为,由于不少地区的方言与方俗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所以对此进行研究,也可以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前转第 66 页)

《人物志译注》前言

伏俊琏

【作者简介】

伏俊琏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人物志》的作者刘邵，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约生于汉灵帝光和年间（180年左右），卒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5年左右）。初为计吏，后迁太子舍人、秘书郎。魏朝建立，任尚书郎、散骑侍郎，出任陈留太守，后回到朝廷担任骑都尉，迁散骑常侍。他曾牵头制定魏法《新律》18篇，并著《律略论》5卷。曾为朝廷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官吏的《都官考课》72条。晚年以执经讲学为主，赐爵关内侯。撰写有《乐论》14篇，《法论》10卷，《孝经注》1卷，《人物志》3卷。《三国志》卷21有传。

刘邵对历代的法律制度、人才管理制度，以及法律思想和人才理论做过深入研究，并结合丰富的实践认真加以探讨，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吏制管理思想和人才学思想。

《人物志》主要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通过“九质”探索“性情”

《人物志》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才的鉴识与任用，书名“人物”就是“辨析人材”的意思。全书第一句话“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是说鉴识人才的根本，在于了解其情性。所以，研究情性，是本书的出发点。那么，什么是性情呢？刘邵以为，人“禀阴阳以立性”，“阴”“阳”指元气所具有的两种根本属性，“性情”则是人禀赋了阴阳之气而出现的正派与佞邪、聪明与愚蠢、勇敢与怯懦、刚强与软弱、焦躁与安静、伤感与愉悦、衰颓与庄重、意态与气度、缓慢与急迫等相对相依的性格特点以及心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其



【图解】

《人物志译注》书影

中包括仁、义、礼、信、智五种永恒的道德(“五德”或“五常”)。

怎样探究性情呢?刘邵认为,人的性情是可以通过五行学说探索的。这是因为大自然借助五行而赋予人以形体(《九征》:“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骨、筋、气、肌、血这五种生理体质叫“五质”;五行本身含有仁、义、礼、信、智五种永恒的道德属性,所以称为“五常”。它们的对应关系是:木—骨—仁,金—筋—义,火—气—礼,土—肌—信,水—血—智。由于人体的“五质”对五行之气的禀受情况有差异,因而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的水平也就不同。五行之气是无形的,而它们所产生的五种生理体质却是有形的。这些生理体质的发育情况是可以了解的,那么,依靠它们所形成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特征(即“性情”)也就可以探求了。

由于和五行对应的五质过于窄狭,刘邵又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九质”概念: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其中肌对应神,血对应色,而精、仪、容、言四者是在“五质”基础上发展的。“九质”现于外表,应于内心,各显性情的特征,称为“九征”。

五质(骨、筋、气、肌、血)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而“精、仪、容、言”则是人类所特有的。因此,人的性情总是表现在容止和言谈上,言谈容止的关键是“态度”即神态气度,而态度的核心在于“眼睛”,所谓“情发于目”。这是性情体现在仪表态度之上。再深入一步,刘邵认为,“仪表态度”是“心气”产生的,而“心气”的表现则是声音。所以“声音”的变化和性情是密切关联的。声音产生于“气”,它和性情互为表里,“声音”和“态度”是融为一体的。

在此基础之上,刘邵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人材鉴识的“八观”(《八观》)“五视”(《效难》)方法。八观五视,就是以对“九质”的观察和心理分析为主,观察一个人所具有的道德品质、智力高低和能力大小。

“九质”之中,“言谈”处于关键地位,因为精(目光)、仪(举止)、容(神色)都是围绕着“言谈”的。因而,《人物志》讲鉴识人材的方法,除了“八观”“五视”等一般方法外,特别强调通过言谈论难鉴识人材。

《材理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有关“言谈论难”的一些问题。《接识篇》则全面描述了同偏材之人交谈的难处,指出容易出现的失误及原因。《释争篇》也从“言谈论难”出发,阐述在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同人交谈时必须遵循的“不伐、不争”的基本原则。

(二)辨析人材的等次类型,根据材质和能力任用官职

为了区分人材类别,《人物志》专门讨论了“材”与“能”的关系。认为,能力是从材质产生的,材为源,能为流;材为本,能为用;能决定于材,材又必须通过能来表现自己。

刘邵以“材能”和“性情”作为划分人材的标准,先把人划分为五个等级:一是兼德之人即“圣人”。二是兼材之人。三是偏材之人。四是依似之人,即似是而非的伪人才。五是间杂之人,就是善恶参浑,心无定是,变化无常的人(《九征》)。这五个等级的人,兼德之人、兼材之人、偏材之人是人材,称为“三度”。兼德之人以中庸为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体别》),“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流业》),所以达到了性情的最高境界:中庸平淡。依似、间杂之人属于伪人材,在辨伪的时候才有参考价值,可以略而不论。

偏材性情理论是刘邵人材思想最辉煌的部分。《体别篇》中,首先分性情为十二类,并指出每类性情的优点和缺点;并把“偏材之人”也对应地分为十二种类型,分析每类人材的缺点和使用得失。这是以性情为标准划分人材。

《流业篇》则侧重于以“材能”为标准划分,刘邵把人的基本材能分为德、法、术,所谓“三材”,以此为衡量的标准,把人材分为皇帝之材和大臣之材两类。大臣之材包括两种兼材(国体、器能)和六种偏材(清节、法、术、臧否、伎俩、智意)。另有四种(文章、儒学、口辩、雄杰)虽不兼三材,但也是偏至之材。这是以材质为标准划分的“十二材”。

《材能篇》分偏材之人的能力为“八能”。能力不同,他们各自所承担的政治职务也应当不同,各自适宜的政治对象及形成的治理局面也各异。这是以能力为标准划分。

刘邵认为,人材中的奇材最难鉴识,所以提出了对“二尤”即特别优异的人材和特别虚假的伪人材的特殊鉴识方法。“英雄”作为“尤妙”之人,在当时有特别意义,因而《人物志》专设《英雄篇》,集中论述“英雄”这种能拨乱反正、创造伟业的人材素质。

《人物志》还对“知人难”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七缪”理论既阐述了鉴识者主观方面的原因,即主观片面性,也分析了被鉴识者方面的原因;既看到了个人的经济条件对人材的影响,也看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对人材的影响。

应当指出,《人物志》用元气、阴阳五行强行比附人的生理体质,把人的道德品质和性格材能说成是天赋的自然本性,反映了一千八百年前人们的认识水平。同时,刘邵的人材学理论本身并不十分严密。如《九征篇》从“五行”谈到“五性”“五德”,又提出“九质”“九征”。“九质”与“五物”“九征”与“五德”是如何配合的,书中没有说明。《体别篇》把“偏材之人”分为十二种类型。《流业篇》分人材十二种,其中两种是兼材,十种是偏材。这中间如何协调,他也没有说明。《材能篇》讲各类人材宜任的官职,与其它各篇矛盾者不少。在具体历史人物分类上出现的偏差,前人已多有指出。

《人物志》的人材品鉴理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找不出第二部这样系统的人才学著作。它是汉末以来崇尚人物品藻思潮的产物,同时又开了魏晋名理玄谈的风气,反映了从汉到魏思想的新变化。

二

现在所传最早的《人物志》刊本和抄本前都有阮逸序,后有文宽夫跋。阮逸是北宋初期著名音乐家,文氏(1006—1091)名彦博,宽夫是他的字,仁宗时进士,累官到太师。文氏跋说:“今合官私书校之,去其重复附益之文,为定本。”则阮氏“序而传之”的《人物志》就是文氏合校的本子。但文宽夫的这个校本,现在已看不到了。

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人物志》刻本是明正德本(1506—1521),现藏国家图书馆。傅增湘、王重民有考证。隆庆六年(1572)郑旻据正德本重刊,此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万历十二年(1584)刘用霖据隆庆本翻刻,此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此后,汉魏丛书本(明万历二十年 1592 程荣校刊本)、广汉魏丛书本(明万历二十年 1592 何允中刊本)、墨海金壶本(嘉庆十四年 1809 张海鹏校刻本)都据万历本翻刻。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乾隆四十一年 1776)也是据万历本抄写的。增订汉魏丛书本(清乾隆五十六年 1791 王谟刊刻)据何允中本刊刻。守山阁丛书本(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 钱熙祚校刊本)据墨海金壶本刊刻,畿辅丛书本(清光绪五年 1879 王灏谦德堂刊本)和龙溪精舍丛书本(民国六年 1917 郑国勋刊本)又据守山阁丛书本刊刻。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 1921 据函芬楼藏明刊本景印)所据为隆庆本。

嘉靖八年(1529)顾定芳根据从俨山伯氏处借得的抄本刊刻了《人物志》。伯氏抄本

今不见,顾氏本今藏南京图书馆。万历五年(1577)李芮思益轩本即据顾氏本刻成,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两京遗编本(明万历十年 1582 胡维新刻本)异文多与李氏思益轩本同,当是从李氏本翻刻者。四部备要本(民国二十五年 1936 上海中华书局校刊)据金台本校刊。金台本没有刻书年代,避清讳,当为清初刻本;其异文墨钉多与两京遗编本同,则金台本是从两京遗编本来的。

以上两个系统的《人物志》版本,正德本系统的本子,刘邵原文、刘昞注都完整。从顾氏本来的本子缺残多,尤其是刘昞注墨钉很多,甚至删节了刘注,所以这个系统的本子不如正德本好。

三

《人物志》是刘邵的著作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它所以能保存到现在,同五凉时期敦煌人刘昞(365?—440)给它作注是分不开的。刘昞也是一个著作很多的人,但也只有这一部《人物志注》流传至今。《四库提要》说:“昞注不涉训诂,惟疏通大意,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云:“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难以窥见其一斑矣。”

刘昞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物志》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唐代,虽然有人认为《人物志》“能有兼偏,知有长短”理论,“索隐精微,研几玄妙”(李德裕《人物志论》),如果“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刘知几《史通·自序》),但由于“品其人物,往往不伦”(《人物志论》),所以批评指责者多。李翱《答朱载言书》就认为“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宋明以来,刻本传世者增多,学者关注的也就增多,但评论只限于简明的提要勾玄而已。清代学者臧琳尝以《人物志》与《文心雕龙》《史通》并称,谓之“三刘之书”,“千古绝作”,“学者不可不读之书”(《经义杂记》)。二十世纪以来,《人物志》受到了很大的重视。章太炎认为“后汉书书册兴,讫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过事理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体差可以攀晚周,其余虽娴雅,悉腐谈也。”(《国故论衡》)此后,各种《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及有关魏晋清谈玄学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人物志》,校勘、注释、白话翻译等方面也出版了多部专著,发表的专题论文在 40 篇以上。《人物志》的哲学思想、心理学思想、美学思想、人才学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掘。

《人物志》在国外汉学界也很受重视。在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就性与才的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四十年代末,黑田亮、佐藤幸治则分析论证过《人物志》中的心理学思想。五十年代,金子泰三、关正郎、清水洁有全面论述《人物志》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的论文。七十年代,多田狷介把《人物志》译为日文出版。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冈村繁,他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研究东汉以来的人物评论,并在此后数十年间沉潜其中,发表了一批系统成果。其《人物志》研究从文本校笺做起,从第一手材料的辨析入手,立论新颖,论证审慎,颇具中国清代乾嘉学者的遗风。

在欧美,《人物志》一书也很早受到学者的关注。1937 年,美国心理学家施赖奥克(J. K. Shryock)出版了 THE STUDY OF HUMAN ABILITIES(《人类能力的研究》),这是西方学者最早最系统地研究《人物志》的著作。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导言,涉及到《人物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刘邵的生平事迹,《人物志》的文本特征,刘邵(前转第 62 页)

【作者简介】

杜播升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甘肃省台联副会长

序言二则

杜播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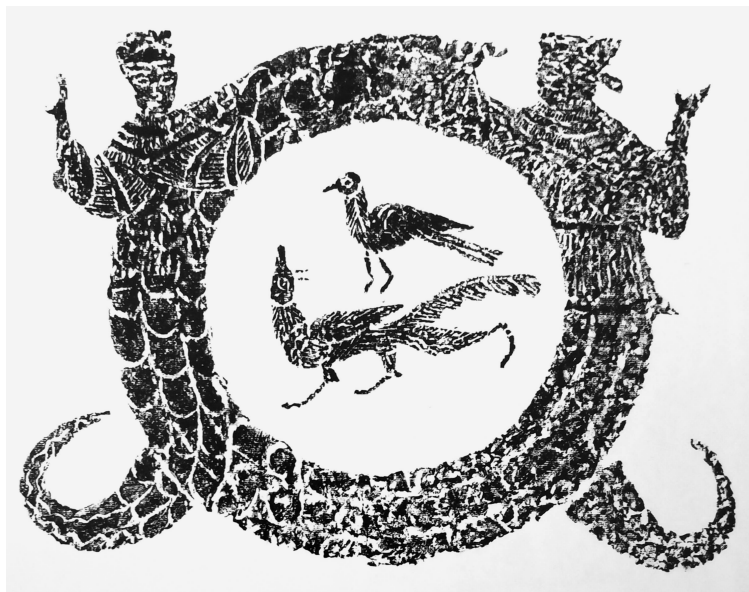
之一：《2019年中国·秦安女娲文化金石拓片邀请展》序

女娲是创造人类的伟大母亲。秦安作为传说中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女娲文化积淀深厚，遗存遗迹遍布，享誉世界的大地湾文化蕴藏大量女娲遗踪。2019(己亥)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暨第三十届中国天水伏羲文化旅游节将有多项活动在秦安举行，其中2019年中国·秦安女娲文化金石拓片邀请展将是其中最重要一项，展现出秦安县相关部门开放发展的眼光、眼界以及推动女娲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决心。

自古至今，金石拓片始终饱含中国读书人的情怀。通过传拓技艺将历史文字、文物遗存进行保存、展示、推广，用于研读和收藏。而最为独特的魅力是通过金石拓片用题跋形式让今天的我们与古代传统文化进行沟通、对话，并转化成为当代文化名人和书画大家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一领域历史上群星璀璨。如，欧阳修、李清照、董其昌、赵颀、王铎、金冬心、翁方纲、包世臣、陈介祺、端方、杨守敬、罗振玉、康有为、张伯英、朱文钧、周肇祥、鲁迅、于右任等等。

如何

如何将传统金石拓片技艺与地方文化结合地更加紧密，让这朵来自远古的艺术奇葩熠熠生辉，发挥其完美的功能和作用，就全国来讲，天水运用金石拓片的独特魅力，服务地方经济文化旅游发展，远远走在了前



【图解】

伏羲女娲捧月图

面。2019年中国·秦安女娲文化金石拓片邀请展就是明证。凭借天水深厚的人文底蕴,今日的天水正在唤醒并绽放金石之魅力、拓片之精髓。创造性把金石拓片运用于节会,服务于群众,这是一种创造。从出现、发掘,到保护、利用,一路走来,得到了天水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展现了



【图解】

伏羲女娲持矩占卜图

天水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弘扬地方文化资源,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积极态度和作为,这势必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动力源泉。

仰望远古,向往未来。天水市金石拓片文化研究会作为中国西北首个金石拓片研究推广机构,立足天水,面向一带一路,首先发现并看到了金石拓片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表现手法,不遗余力在传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和日渐稀缺的文化资源上深耕细作,在伏羲女娲文化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抢救性工作,收集整理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旧拓珍品,各项工作风生水起。成功举办了首届羲皇故里全国金石拓片邀请展等一系列专业展会活动,先后有10数万人参观,充分发挥了天水独具特色的地方资源魅力,成为宣传天水厚重文化的一张名片,引发全国拓片艺术界的广泛关注,激发了人们宣传天水的自发动力,人们聚焦天水,关注天水。

2019年中国·秦安女娲文化金石拓片邀请展,自5月20日开始面向全国征稿,从目前已收到的数百件金石拓片看,精选出能突出展示女娲文化的百幅作品,尤其征集到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稀少珍贵作品,非常不易。其重要的文物、考古、文献等价值不言而喻,势必在激发人们对女娲文化和金石传拓技艺热爱的同时,增加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通过远古探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产生无尽的文化自豪、文化自信。在弘扬伏羲女娲文化、发扬女娲精神、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方面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资深金石拓片收藏爱好者,今天能有机会站在水天市金石拓片传承交流平台上,感谢天水,感恩秦安。祝愿秦安,让女娲文化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芒。同时,祝愿为本次展出付出努力的秦安县大地湾印象酒店等一大批秦安民营企业茁壮成长。

金石拓片必将在秦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熠熠生辉。

之二:《羲皇故里全国金石拓片邀请展典藏》序言

甘肃素有“羲轩桑梓”之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发掘用好丰厚的古代文化遗存,对贯彻《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实现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文化强省目标任务意义重大。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近年来的实践出发,我们仍然需要解决好资源的转化问题,尤其如金石拓片,作为远古至今的中华文明奇珍,这个名自商周始于秦的金石文化,这个产生于隋成于两宋的传拓艺术。对于甘肃,金石拓片研究开发利用还很薄弱,亟待挖掘它的参与性强、互动性高、“叫好又叫座”的潜质,而天水正朝这个方向走来,相关探索很有价值。

“羲皇故里”全国金石拓片邀请展,作为“2017(丁酉)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暨第28届中国天水伏羲文化旅游节”重要活动之一,是天水市首次举办的全国金石拓片展览。从展览引发的社会反响及其号召力来看,足以证明,近年来,天水在这块全省尚处于处女地领域里所做的有益尝试和开拓性工作已经走在了前面。从确定展出的80多幅作品看,以伏羲、女娲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及碑刻、瓦当、造像等为表现内容的拓片专题展在国内外还不多见,一些稀缺的铭文更会让观者耳目一新。这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金石拓片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审美价值和独特的开发价值,对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途径。

对此,作为金石拓片鉴赏爱好者,我想通过《天水金石——伏羲特刊》,祝愿“羲皇故里”全国金石拓片邀请展取得新收获,期待天水金石拓片研究立足甘肃特色,把握论证其内涵、定位和发展方向,延伸其实证功能,不仅把它“用”起来,更让它“活”起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服务,为甘肃文化代言。在促进甘肃金石学及其金石拓片文化发展的同时,推动“互联网+”元素和数据库建设,向数字化发展。让更多的人畅游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了解历史,了解艺术,热爱艺术,传承文化,共同鉴赏、感受中华金石拓片文化的独特魅力。

相信,天水金石拓片文化伴随着伏羲文化的影响力,将从这里出发,从今天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夏至时节,写在《羲皇故里全国金石拓片邀请展典藏》出版之前。

(前接第56页)劳动,一般不中途退场。记得还陪同周总理在兰州观看过省七一秦剧团的演出,具体剧名记不清了,结束后上台接见了演员并合影。

张:今天的交谈就进行到这,王老,您还有啥事要交代的?

王:(动情地说)我今生有幸,抗日战争开始参军,在邓身边工作几十年,从一个普通士兵走向革命、走向光明,特别是多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经历了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晚年,政府给予了我很大荣誉,很知足。时间虽隔了半个多世纪,但我亲身经历的事至今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你们年轻的同志要好好总结一下这一段历史,用史实教育好下一代,多做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有意义。

最后对王老说了些感谢祝福的话,准备辞别时,王老让子女找出了几年前他为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写的一首诗交给我,诗的内容是:

欣逢建党九十年,党的关怀记心间。
八年抗战曾亲历,北平和谈犹艰险。
来兰工作随邓公,改革开放沐春风。
年逾九旬体尚健,心情舒畅享晚年。

落款是:2011年7月,王焕文。

张文轩诗选

喷雾式电动洒水车

时闻仙乐绕街巷，尊驾辛劳上路忙。
餐洁无由生浊气，启唇当即做龙王。
彩虹有意随身后，嘉木蒙恩沐道旁。
涤得九衢尘垢尽，人欢马叫颂陶唐。

农友海君农家书屋

深耕勤耨鬓飞霜，崧谷翻新满院房。
自处蜗庐簞食乐，书陈华屋案几香。
门开邻里争虚座，人获智能明宪章。
耕读传家遵祖训，一家传统惠全乡。

祝迭部益哇林场养殖鸵鸟成功

添翼明驼走大荒，非洲神鸟世家长。
如瓜玉卵遗沙碛，似凤金翎耀赤阳。
远至迭山初作客，乐棲藏宅不思乡。
卜居但重人情厚，何计天高地气凉！

赞通渭县

誉获农民书画乡，淑嘉桑梓古平襄。
置锄沐手操觚笔，借月偷闲绘汉唐。
翰墨飘香颜子宅，丹青炳蔚辋川墙。
世人莫叹陇中苦，寒苦松梅善吐芳。

焦玉洁诗词选

金城传舍偶吟

细雨疏疏洗远尘，传舍梦迴倚薄衾。
半生荒斋苦翻卷，一朝河畔作闲吟。
壮怀常羨班定远，胸襟终愧林和靖。
当时夜阑人尽散，华发苍颜泪霑襟。

点绛唇三阙

之一：记春

暮雨轻飏，潇潇河上送春寒。料峭
堤边，残红暗长川。

劳燕初归，晚烟绕群山。待清晓，

雾掩云遮，山外有洞天。

之二：记事

随云骤来，疑是天外行散雨。小驻
芳程，飘然独归去。

愁肠百结，诉尽当年事。漫人间，
知音难觅，何时逐君去。

之三：记梦

暮雨送寒，残红冷落春归去。寂寞
芳洲，空忆繁华事。

轻掖薄衾，谁伴江郎宿。晓寒紧，
一枕残梦，诉与何人知。

楚风草堂赋

陶劲涛

不亦快哉，草堂择其名曰楚风者，
惟楚有材，慕楚有材，跻楚所由也。放
眼楚天阔，纵笔数风流。四羊鼎文，国
基耀首。仰天湖竹筒，奇诡纵横；马王堆
帛书，语事春秋。贾谊悲仁人，大汉铭
节风云积久。怀素舞狂龙，草圣独步无
出其右。屈平原上下求索，哀忠君之多
忧；辛稼轩挑灯看剑，报梦绕之神州。千
古楚邦，百家争鸣，斯文帛筒，挥斥方
遒。

楚风草堂之主人，南阳方城赵山
亭。降生于农耕之家，沐勤于朴厚寒
景，幼发青云之志，身处清凉之境。岁
值韶年，风华正茂，投笔戎马，心骛匡
拯。驾长车驰骋贺兰山闕，破冰魂徜徉
翰墨军营。牛首山下，炼意励志，志存
高远；黄河陇上，龙腾虎跃，跃马征尘。
无悔黄沙应战事，苦耕书山朔漠冷。励
就凛然风骨，养成不阿情性，为学锲而
不舍，孜孜不倦；为人平和无华，含蓄真
诚。每浮大白，竹林意气，吞云吐烟而
相顷；醉心论道，悬河无拘，飞觞酩酊而
尽情。秉仰物华之吐灿，含簸心灵之澄

【作者简介】

张文轩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陶劲涛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中国书协会员

焦玉洁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泓。岁月溢彩，石墨著魂。立雪西夏胡公石、柴建方书法之名门，拔迷启津；转益中州张海、李刚田之方家，知听师尊。寄情砚海，醉心楚程。春风桃李翰墨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贞守天时地利人和，博涉鳞只钟鼎楚风。卜辞烟雨浸润，鸟迹兽纹开竞，龟甲刻画，楚卷立名。挥写万卷书法，乐行万里征程。更上层楼，投贤燕京，效法古人，虔心仰承，问道朱乃正、沈鹏之大匠，广开真见识，相辅而相成。可谓山积其高，学积其炳，人跻其名，法积其乘者也。

幸哉山亭，墨虐笔淫。探隶变之式微，发审美之趣向，析节奏之动静，辨书丹之疑象。去甲金空间构成之衡式，存古拙天真奇诡之心相，取纵肆峻峭之抗劲，承痛快清隽之剑爽。收敛惬意，欹斜不囿，率性挥写，体势开张。结体严谨而富变异，探微发隐而析形象。极文字之简化，尽笔势之夸张。风格独具而呈典雅，笔性流意而致粗犷。悠邈之心，绍于春秋政治之纷披；奥玄之旨，格于战国逐鹿之豪放。借文字功底而奔逸，藉书写技巧而竞芳。凝情感、性格、思愫于毫端，聚抽象、提炼、激动于琳琅。钦敬远古，襟浪漫而简约，崇尊时贤，臻飘逸而正刚。搜罗异字，笔墨抑扬。猎南北拾遗，融魏晋汉唐。含蓄而化拙，纳巧而独往。佳作纷呈，剑露绮芒。是以集雅字而成妙联，研嘉铭而书锦章。拔萃书坛之逸群，翰逸神飞；抢魁国展之金奖，藉名春榜。

夫惟楚风，不拘楚风。慧质天成，匠石运斤。陶荆楚文明之灵化，秉中州文踪之厚积。创楚风之艺涯，开楚风之蹊径。龟金楚篆，分隶季孟。灵通大草，渐入狂境。可谓挥云龙飞砚，刻楚铁化金。椽笔书翰之间，尤耽铁笔刻鹄，妙

心方寸之地，更得大千之胜。楚剑雕虫，睿思琢玉，游刃有术，金刀清冷。三更灯火摹古，五夜钟鸣敌秦。诗情书意，臻妙丹青。秦玺汉钮，熔古今于顽石之中；楚篆入印，罗智性于冲切之锋。六书播九州，一刻誉三陇。撷芳耀目，印花簇锦。甲午大作，“甘肃信合”八字巨鼎，信当前无古人。汉风古刀，高照精神，有幸观之者，皆拍案心形，神荡汗漫，感慨凝胸。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印也。

若夫，三千年中国书法，赖继前贤之遗丛，传承百代之墨韵。浩浩经典，熠熠懿风，碑简藏奥，茧帖流芬。竹素芸编之绝唱，金题玉躞之昭颖。文质瑰宝，汗牛充栋。文心赅续，民德陶钧。

然则明珠在渊，灿然可望，操之弥深；璞玉在石，温润滋心，卞氏难逢。多使金卷走蠹，云秩蒙尘。非披罗剔抉，淘沙拣金而得之也。尝言书法之有法矣，追古贤之毕生，寒窗冰砚，退笔如山，银钩铁画，舞鹤飞鸿。或曰书法之无法乎？看时辈之逐名，庸才示腴，裸胆效颦，垃圾悬厅，缭乱红粉。不知学问修养，万卷盈胸，惶论投机劳形，复制克隆。君不见当下书家如蝇，笔无馥功，俗书陋迹，火箭升空。人心逐利，浮躁失真，犹不见大师如云，究之无根，如笔涂狂怪，似塑花在瓶。呆形寡相，内容抄空，五经扫地，尽辱斯文也。

喜哉山亭，寥寥楚立，亭亭草堂；内蕴邹风，外修簧藏，秃笔凝雪，砚池飞觞。弹指奇骨，磨励开光，正知天命，激情昂扬。智重运笔，楮迹浸芳。倘使古墓昭阳，千年木乃伊生血动魄；帛简逢春，一壑楚文字摇曳还魂。

或曰，楚道亦难哉，犹呵冻啖霜；书艺幽邃兮，路漫漫其修长；翰墨翹楚

兮，乐其中而未央。

意犹未尽，继之诗云：

锦瑟有柱赖心弹，笔奥难寻蚌吐丹。

精意环中超象外，传灯古墓通幽兰。

又云：

楚风草篆蜕元形，墨韵寄情御性灵。

秋实无华馨灿漫，潇然独醉在山亭。

贵州行(五首)

马天彩

梵净山

梵净仙山久慕名，为还宿愿千里行。

古墓森森珍兽奔，奇花异草百鸟鸣。

蘑菇山岩天生成，鬼斧神工世人惊。

红云金顶祥云笼，梵音袅袅净心身。

四面山

四面奇山跨三省，幽险雄秀获殊荣。

杪椏红豆随处见，猕猴嬉戏碧树动。

丹霞赤壁画卷灿，多姿多彩撼世人。

高山银练舞当空，千瀑之乡不虚名。

荔波大小七孔

古色古香小七孔，虬枝藤蔓送浓荫。

虎头壁悬万鸟洞，山燕结队戏东风。

雄伟壮丽大七孔，人称东方凯旋门。

峡谷伏流洞中洞，碧湖荡漾映星辰。

茂兰万亩梅园

茂兰自古梅花妍，王母播种万亩园。

层层叠叠透深浅，浓浓淡淡似含烟。

疏影横斜迷人眼，彩蝶华蜂有深缘。

暗香浮动送馨远，徘徊花中乐似仙。

青岩古镇

城墙蜿蜒阁坊青，状元故居仰紫辰。

庭院深深迎宾客，青石路曲净无尘。

小吃荟萃蕴馨色，特产琳琅样样珍。

莫道繁华常如此，不时更换往来人。

天水赋

薛林荣

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屹为重镇；处南北分界，居东西交汇，乃为枢纽。陇坻亘于东，朱圉雄于西，蟠冢屏于前，崆峒望于后——天水者，陇右要冲，关西首障，乃祖国腹地之中心，系历史文化之名城。

羲皇故里，人杰地灵。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阴阳五行定纲纪；旷代不遇，石破天惊，天河注水扬美名。察变迁之史，波澜壮阔；数风流人物，灿若星宿。清水河畔，有大地湾文化之遗存，肇启文明八千年；卦台山上，乃伏羲氏画卦之故址，薪火相传数成纪。大哉羲皇，开物成务；混沌初开，准天立极。画八卦而造书契，作网罟兮平水土；取火种而造甲历，创礼乐兮制婚娶。千秋之明德惟馨，旷代之隆仪备举。非子牧马于犬丘，大唱秦风，嬴秦由是发迹，终成始皇之帝制；武公西征于边陲，初设县制，圭卩冀于此肇创，毕竟集权之功力。老子西游，紫气东来。尹喜守关，经书乃传。华章九篇入百子，经文五千颂道德。李广抗击匈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呜呼白首难封，引无数英雄落泪；充国屯田戍边，寓兵于农，亦绍厥后，嗟夫千古之策，博一代伟人赞誉。赵壹者，美须豪眉，有《刺世疾邪赋》；苏惠者，仪容秀丽，作《回文璇玑图》。西州大将隗嚣割据陇上，无奈叹渭河；大秦天王苻坚统一江北，失意唱淝水。三国争霸，姜维出焉，心存汉室，九伐中原。继孔明之遗志，捧出肝心，披开大胆；践未竟之遗愿，虚怀远

薛林荣

中国作协会员

马天彩

原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巡视员

中国作协会员

志，空寄当归。李氏郡望，成纪在焉，李世民抚民以静，发贞观之治；礼部尚书，秦州乡贤，门克新直言无隐，得皇帝亲祭。近代以降，陇上铁汉安维峻，冒死请诛李鸿章；百年而外，陇南文宗任其昌，因材诱掖文脉壮。求名当求万世名，甘凉俊才冯国瑞，唤醒麦积山于草堂春睡；计利当计天下利，和平将军邓宝珊，保全老北平于战火纷飞。龙风之俦，济济如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古邑秦州，山川毓秀。陇右名镇，旅游胜地。地跨长江黄河，风兼南北之长。行经千折水，可看六朝山。北跨清渭，麦积通天棧；南渐两当，悬崖势倒垂。俯临渭水群山小，秦岭团烟落日低。石胎泥塑，称作西土佛陀极乐天；艺术臻妙，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馆。仙人崖，大像山，水帘洞，拉梢寺，渭河两岸，次第展开。百里石窟，千佛扶持。贝叶梵音开净土，慈航梦里菩提因。天水旧治，五城相连。历史久远，两千余载。莺花古巷秦州陌，云是明清旧时宅。西关古巷幽深，民居有南北宅子；南山老树空庭，泰斗数汉唐古槐。名泉北流忆故人，石池清水是吾心。三国争雄，遗迹秦州。天水关姜维归蜀，诸葛托付北伐事。木门道张郃扼腕，魏帝喟叹蜀未平。街亭失于马谡手，孔明挥泪斩爱将。渭河浪卷英雄去，剩有塞云自往还。藉河岸边，良田负郭，静夜无邻，送老白云边，倘许蜉蝣寄我；濠水之畔，木杪斜阳，源头活水，得闲多事外，尽随鸥鹭忘机。陇上江南，人居最佳。老柳近莲塘，炊烟百尺暝。物阜民富大都会，河声岳色大文章。

陇上江南，物华天宝。漆器重光焕彩，脊兽抟土成金，丝毯锦绣乾坤，根艺神功天成。麻履不舟，竞飘洋过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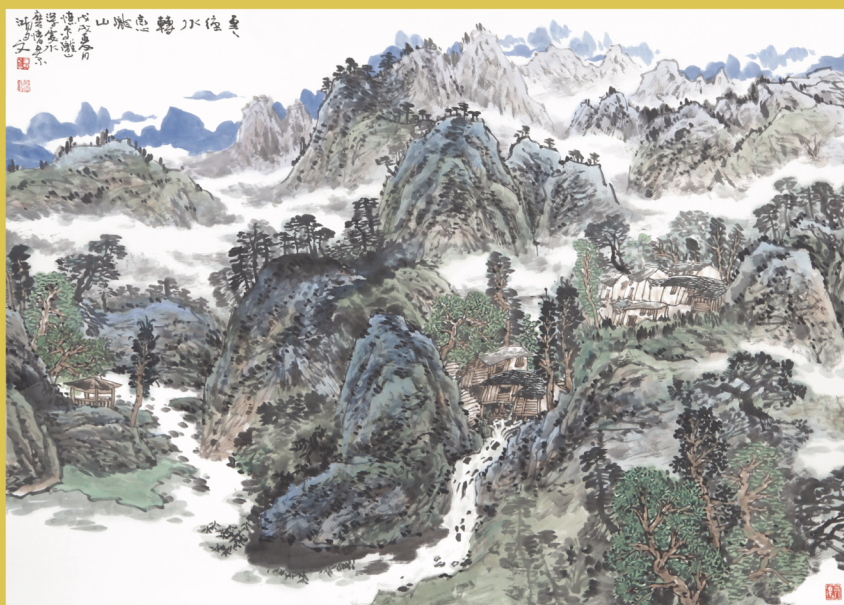
沙弥无声，然笑倾环球。品牌因时势而铸就，工业随国运而崇隆。三线国企浴火重生，民营科技重光焕彩。装备制造重振雄风，电子电器雄踞一方。星火机床，天下燎原，占行业鳌头；华天电子，深圳上市，展腾飞雄姿；长城电工，三峡建功，令世界惊叹；海林轴承，科技领先，树创新标尺。高新农业，藤接中外奇茎；果珍李蔡，味聚东南之美。秦安齐桃，喜宴奥运健儿；“花牛”苹果，曾传领袖佳话；渭川芥姜，频伴神舟凌空。玉自不言，宁远峡谷栖鸳鸯；石亦无价，清水山峦隐庞公。一锅老汤，汉三杰闻香下马；两碗佳肴，周八士知味停车。千峰叠翠，万壑披绿，藉河沿岸，又见水天一色；温饱无虞，小康在望，邽山脚下，重睹昔日风采。步行街流光溢彩，城市如此多娇；小江南阔步向前，风景这边独好！执政爱民始终不倦，躬身政事著于一时。体察民情，集中民智，筑牢执政之基；发展经济，奔向小康，树立为官之道。以人为本，共建和谐。发挥比较优势，抢占发展高地，长吟自然之道，绘就发展蓝图。工业强市、农业稳市、科教兴市、商贸活市、旅游富市，倡和谐兮万民幸矣，谋发展兮福祉无穷。

噫吁戏！大象无形，天水无涯。浩荡乾坤包不住，拈来尽在一毫端。昔者闾阎相望，桑麻翳野，今朝高楼林立，烟井万家。凭栏处：叶脉差池翻翠羽，花须危颤唾红绒。古巷里：幽径谁寻车马静，午阴贪坐薜萝新。关山下：陇坂真是春归路，桃李无言始满蹊。龙的家乡，笙簧并奏，唱尽千古风流；羲皇故里，少长争先，开启时代新风。物润时雨，瑞霭缤纷；暖送薰风，大地欢腾。卦台巍巍，渭水汤汤，歌赋一阙，兴会无前！

张惠中书法作品欣赏

张慧中，字大华，1963年生于陇右农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白银市第三、四届书协主席，曾被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国书协「书法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获甘肃省委省政府第六届敦煌文艺奖。





崔鸿文·国画